

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4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4
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条件	9
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斗争	14
《共产党宣言》——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战斗纲领	19
二、1848 年欧洲革命风暴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24
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	25
德国三月革命	29
马克思、恩格斯战斗在 1848 年革命风暴中	32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34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总结	37
三、第一国际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41
六十年代初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	41
第一国际的建立	43
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46
反对英国工联主义的斗争	49
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52
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斗争	54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	58
马克思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	59
3 月 18 日起义和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	61
捍卫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	65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68
五、马克思、恩格斯在欧美各国建党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72
德国统一工人政党建立过程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73
《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内容	77
马克思、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	80
马克思、恩格斯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揭露和批判	84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法英等国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	87
马克思的逝世	89
六、恩格斯为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斗争	91
恩格斯为实现无产阶级新的国际联合而斗争	92
第二国际前期恩格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96
在农民问题上恩格斯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	102
恩格斯的逝世	106
七、列宁主义的诞生	108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108
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	111
列宁的早期革命活动	114
第二国际各国党内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泛滥	117
列宁和各国左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121
列宁主义在斗争中诞生	123
八、列宁为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斗争	124
列宁反对经济派的斗争	124

《怎么办?》一书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	127
布尔什维克党在斗争中建立	131
列宁为保持布尔什维克党的独立和纯洁而斗争	136
九、 列宁在俄国 1905 年革命期间和革命低潮时期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138
革命的爆发和俄国党内两条对立的路线	139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发表	142
革命的高潮和对待武装起义的两种不同态度	147
革命低潮时期列宁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的斗争	151
十、 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156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形成	157
列宁对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批判	158
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两种不同态度	161
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纲领	164
十一、 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	167
战争危机年代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167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171
列宁团结各国左派为建立新的国际而斗争	175
列宁对社会和平主义和“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	177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181
十二、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182
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和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183
列宁的《四月提纲》	186

布尔什维克党确立武装起义的方针189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辉文献 192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

十月革命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198

列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202

后记 211

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马克思主义诞生了。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它阐明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出了谋求解放的正确道路，引导他们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所以，它又被称作科学的社会主义或科学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从此，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自己的英勇战斗，谱写出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战无不胜的。今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旧世界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647 页(见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下同)。]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毛主席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275 页。]毛主席的这段话，精辟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

十九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西欧一些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国家。到四十年代，英国已基本完成了产业革命，法国产业革命的进展也很迅速。与英法两国相比，德国较为落后，但资本主义也有很大发展，机器工业已经出现，毗邻法国的莱茵地区已成为工业发达的区域。产业革命最重要的社会后果之一是产业无产阶级队伍的形成。随着机器生产的迅速发展，大工厂的成批建立，这支产业大军也迅速地集中和壮大起来。

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不但引起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引起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越是发展，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就越是残酷，无产阶级也就越来越贫困化。1825 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从此以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各国连绵不绝，一次比一次严重。资本家把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工人和劳动人民身上，进一步加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

无产阶级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就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然而，在初期，他们还处在毁坏机器、反对个别资产者的自发斗争阶段，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也不断提高。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法国里昂的两次工人武装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些斗争震撼了欧洲，表明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831年11月，法国里昂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里昂是法国丝织业的中心，广大工人受到工厂主和包买商的残酷剥削，每天被迫劳动十五——十八小时，所得的工资只够买一磅面包。年轻力壮的工人，因过重的劳动都累得骨瘦如柴，患有各种疾病。他们的儿女生活更加悲惨，每年都有大批婴儿夭折，童工大都不到十岁就被活活折磨死了。工人们实在生活不下去了，10月间，六千织工迫使厂商同意增加工资，但后来厂商拒不执行，激起广大工人的愤怒，遂于11月21日举行罢工示威，又遭到军警的袭击。工人们忍无可忍，立刻拿起武器，举行起义，回击反动军警和资本家的挑衅。起义工人在旗帜上写道：“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这一战斗的誓言，鼓舞着起义工人同敌人英勇作战。经过三天浴血奋战，起义工人攻占了市政厅。当时，工人们由于受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没有认识到掌握政权的极端重要性，竟让反动省长继续任职，其他旧政府官吏也没有撤换，只成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监督市政府的行动。结果，反动派得到喘息的时机，急忙从巴黎调来军队，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

1834年4月，为了反对政府禁止工人集会和结社的反动法令，为了营救被捕的罢工领袖，里昂工人再次举行起义，和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战斗。这次起义中，工人们提出了争取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使起义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资产阶级政府对这次工人起义早就作了防备，面对数量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敌人，工人们战斗十分英勇。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工人队伍被迫退却，直至守卫最后一个阵地的工人全部英勇牺牲。第二次里昂工人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开始居于社会斗争的前列，标志着法国工人已开始走上独立政治运动的道路。

继里昂工人起义之后，英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1836年6月，一部分工人和手工业者在伦敦创立了“伦敦工人协会”。次年6月，协会拟定了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文件，提出了六点要求。1838年5月，这个文件被命名为“人民宪章”，正式公布。从此，这个为争取实现普选权为中心内容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被称为宪章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就叫宪章派。宪章运动先后在1839、1842、1848年出现三次高潮，运动遍及全国各地，格拉斯哥工人在“不给面包就革命”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地工人还举行抗暴大示威。宪章运动从三十年代中期持续到1848年，前后坚持了十多年，成百万工人参加了这个运动。最后，由于宪章运动领导人的动摇，政府下令解散了宪章派组织。

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英国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斗争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宪章运动不再是个别工厂、个别部门的工人反对某个资本家的斗争，也不仅仅限于提出某些经济要求，而是英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的政治斗争，所以列宁称它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276页。]。

在英国宪章运动期间，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也爆发了反对工厂主的武装起义。西里西亚当时在普鲁士王国版图内，是全德纺织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主要从事麻织品和棉织品的生产。那里的织工不但受到工厂主和包买商的剥削，而且还要向地主缴纳一种特别的纺织捐，受到地主和资本家的双重盘剥。当地企业主为了同英国商品竞争，拼命压低工资，使工人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起义前不久，当地三万六千织工中，就有六千人因饥饿而死亡。工人们在《血腥的屠杀》这首自编歌曲中，愤怒地控诉了吸血鬼们“榨尽穷人血汗”和“剥掉穷人最后一件衬衣”的罪行，马克思称这首歌是“**一个勇敢的斗争的呼声**”[《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88页。]。6月4日，工人们唱着这首歌经过大工厂主茨文兹格尔的住宅时，遭到了资本家和军警的毒打，有的被拘留，工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当天，

起义工人捣毁了茨文兹格尔的住宅，第二天，三千多工人聚集起来，捣毁工厂，烧毁资本家的账册和财产契据，并和派来镇压起义的军警展开了血战。工人们用斧子、棍棒、石头作武器，打得军警狼狈而逃。6月6日，普鲁士政府又调来大批军队，残酷地镇压了工人起义。

这次起义虽然是自发的，但工人们团结一致，把斗争矛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们“**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评“普鲁士人”的<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83页。]。这次起义表现出来的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德国各地的工人斗争。

上述几次工人的起义斗争，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标志着欧洲工人运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政治上，这个时候的无产阶级已不再是作为资产阶级助手，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昂首阔步地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从觉悟水平上看，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且开始了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在斗争形式来看，已由早期破坏机器和反对个别资本家的斗争发展到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发展到武装起义。从组织形式来看，工人阶级队伍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并出现了工人阶级最初的独立政治组织。

四十年代欧洲三次工人运动被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下去的事实表明，无产阶级要斗争，要革命，迫切需要有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迫切需要一个由正确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可是，当时在工人运动中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不但不能给无产阶级指明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反而把工人运动引向歧途。在这种情形下，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并使它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是当时工人运动的迫切需要，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提出的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历史发展提出的重大任务。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3--264页。]正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欧洲许多国家资本主义有了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加剧，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工人运动蓬勃兴起，表明无产阶级已成为历史发展最伟大的动力，加上当时社会的科学文化都发展到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在自然科学方面，有著名的三大发现(能量转化定律，细胞的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社会科学方面，哲学、历史、经济等许多领域也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和发展。所有这些都表明，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既是时代的迫切需要，而时代的发展，又为这种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物质的和理论的前提。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条件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是，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能够创立这一理论呢？这主要的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并在革命实践中自觉改造世界观，从一个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才能担当起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正如毛主席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同上书，第264页。]

卡尔·马克思(1818-1883)，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工业较发达的特利尔城。父亲是个律师，马克思的家庭，是一个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家庭。

1835年中学毕业后，马克思先入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研究法律、历史和哲学。柏林大学是黑格尔生前讲学的地方，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在当时的欧洲影响很大。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以

后，接触了黑格尔的著作，并且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左派)。这一派在政治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立场上，批判封建专制国家和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基督教。他们从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出无神论和革命的结论，主张实行资产阶级的改革。

年轻的马克思，是一个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勇于批判旧世界的反潮流的伟大战士。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被聘为该报主编。马克思以报纸为工具，进一步开展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斗争。《莱茵报》在马克思主持下，办得生气勃勃，革命的民主主义色彩越来越鲜明。办报使马克思深入社会，广泛地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了解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当时在普鲁士，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地主利用国家政权疯狂地强占农民土地、山林。有的贫苦农民世代代生活在山林中，以砍伐林木为生，现在被夺去了上山砍柴的权利。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继续伐木，贪得无厌的大地主反诬农民为“盗窃林木”。1836年普鲁士二十多万件刑事案件中，有十五万件以上是关于所谓“私伐林木，盗捕鱼、鸟”的。为了维护大地主利益，莱茵省议会还专门通过了所谓“林木盗窃法案”。马克思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了事实真相，坚决站在劳动农民一边，竭力维护劳动农民的利益，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莱茵报》上发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无情地抨击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制度，揭露了当时的国家机关都成了“**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60页。]。马克思的揭露，引起了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恐慌和恼怒，他们先是对《莱茵报》设置严格的检查制度，继而竟下令查封《莱茵报》。报纸的股东也要马克思改变态度，向政府妥协。面对着反动政府的迫害，马克思不畏强暴，断然拒绝。1843年3月，毅然辞去《莱茵报》主编职务。不久，《莱茵报》也被查封。

在实际斗争中，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破绽百出。这个哲学把国家和法律看成是超阶级的“理性”的表现。但是，现实的阶级斗争证明并非如此，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和法律都是用来维护他们反动统治的工具。这样就促使马克思起来批判黑格尔的哲学。

正当马克思开始清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时候，费尔巴哈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等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重要著作，这对马克思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正像恩格斯所说：“**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8页(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

与此同时，在斗争实践中，由于接触到大量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也推动马克思去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对恩格斯说过，**正是对林木盗窃法的研究和对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状况的考察，促使他从纯粹研究政治转而研究经济关系，从而研究社会主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说明。]

1843年秋天，马克思到了巴黎。巴黎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比较发达的地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都比较激烈。马克思一到巴黎，就投入了沸腾的斗争生活。

在巴黎，马克思住在工人住宅区，了解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状况，同法德两国工人秘密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参加他们的集会和发表演说。工人们成了马克思家里的常客，经常畅谈到深夜。工人们向马克思诉说了自己所遭受的剥削、自己的斗争和希望。工人们的高贵品质和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战斗的事实，使马克思深受启发，进一步认识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作用。

在巴黎，马克思继续进行巨大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研究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着手系统地研究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此外，还研究了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学说。

投身于火热的阶级斗争，了解工人，熟悉工人，与工人相结合，使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能够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需要，也推动了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1844年初，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阐明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第一次指出无产阶级是实行社会革命的社会力量。其中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同上，第15页。]。这时，马克思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明确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特别主张进行武器的批判，主张依靠群众，依靠无产阶级，为推翻旧制度而斗争。因此，列宁认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77页(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巴门市。父亲是个大工厂主，虔信宗教，保守而又专断。年幼的恩格斯对这样的家庭极为反感，而他父亲对他也非常不满。

1838年，恩格斯还没有读完中学就被他父亲送到不莱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但这并不能阻挡年青的恩格斯投身于当时的社会阶级斗争，也无法阻碍他对科学和政治的研究。

巴门是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恩格斯在巴门和不莱梅都注意考察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亲自看到了工厂主残酷压榨工人而大发横财，工人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流血流汗，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恩格斯对工厂主们的胡作非为十分气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处境深表同情，他在十九岁的时候，给杂志寄去了自己的政治论文《乌培河谷来信》，无情地揭露了这个吃人的社会。在纪念法国七月革命九周年的时候，恩格斯在一首诗中指出：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国王的宝座已摇摇欲坠。他怀着仇恨和鄙视的心情描写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是最无用、最可恶、最该死的国王。所有这些都表明，青年恩格斯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1 年，恩格斯到柏林炮兵队服兵役，以旁听生资格到柏林大学听课，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当时，柏林正在进行一场剧烈的哲学论战，恩格斯在论战中把锋芒直接指向普鲁士君主政体。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他开始转向唯物主义。

1842 年 10 月服役期满，恩格斯前往英国的曼彻斯特，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纱厂中工作。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曼彻斯特不但是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宪章运动的坚强堡垒。在这个环境中，恩格斯和工人们一起战斗，成了工人的知心朋友，同时也使恩格斯进一步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认识了新兴的无产阶级，使他最终地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英国居住期间，恩格斯常常深入到工人居住的贫民窟去，访问工人，亲自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这正像他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中所写的，**“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273 页。]为了了解工人阶级的状况，他还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和一切官方文件。与此同时，恩格斯又积极参加了工人运动。

在英国期间，恩格斯走访了三十多个城市，作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他出席宪章派各种会议，和宪章派的左翼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并为《北极星报》写稿，支持宪章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恩格斯写了许多文章，其中包括 1844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这些著作中，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产生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根源，等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上，得出了和马克思完全相同的结论。这表明，恩格斯在英国期间，最终地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所以列宁说：“**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90 页。]

1844 年 8 月底，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回国，途中特意到巴黎去会见马克思，他们在一起畅谈了十天。从此，这两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结成最亲密最伟大的革命友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

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于 1844 年 8 月在巴黎会面以后，到 1848 年初这一段时期里，他们一方面投身于当时工人运动的实践，批判各种危害工人运动的错误思潮，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另一方面，他们不断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从事大量的艰苦的科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并加以革命的改造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441-442 页。]。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有三个来源，就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这些理论——加以审查，并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重新加以检验，进行新的探讨和批判，对于其中一些合理的因素，进行革命的改造，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是从康德开始的，其著名代表是黑格尔(1770—1831)和费尔巴哈(1804—1872)，通常说的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指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黑格尔阐述了关于发展的思想，揭示了世界是一个不断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运动过程中，并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基础。黑格尔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但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世界是一种神秘的“绝对精神”创造的。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精神”，就是上帝的别名。由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他的辩证法也是很彻底的。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地位。他坚持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是精神决定物质。然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和不彻底的，在解释社会现象时，也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部分，扬弃了其中的错误部分，并加以革命的改造，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创造的，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这些学说的同时，吸收了他们的劳动价值论的合理部分，仔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特点，揭示出隐藏在商品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科学地证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形式上是偿付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只是工人劳动所创造

的价值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则是工人创造而资本家不付报酬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彻底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础。

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生活在十九世纪初期,目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他们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世界”。他们企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曾提出过一些诸如人人参加劳动,消灭城乡差别等积极的主张。他们也主观编造出了一些使工人解脱剥削和改革社会的方案。但是,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而把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幻想依靠贵族、资本家的帮助实现他们的“理想社会”,这当然是十足的空想,因此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马克思、恩格斯能够更好地批判和改造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创立,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将三个理论来源简单地继承和凑合,而是对它们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改造;同时,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78-299页。]。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19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过程,也就是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正面临着巨大的革命风暴。无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在当时的工人运

动中，流行着各种错误的思潮，如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严重地危害着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了使工人运动更好地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同这些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魏特林(180—1871)，原是德国的一个裁缝工人，1836年加入正义者同盟，成为同盟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他曾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主张用暴力推翻旧制度。但是，他根本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要达到“共有共享的社会”，不是靠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而是靠乞丐、罪犯等流氓无产者，靠少数人的密谋暴动。他把革命看作是自发的，反对有组织的群众阶级斗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很清楚，魏特林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只能把工人运动引上毁灭的道路。最初，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寄予很大的希望，曾多次耐心的帮助他，希望他改正错误，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但是，魏特林始终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和宗派立场，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公开声明同他决裂，以便教育无产阶级。后来，魏特林到了美国，脱离了工人运动。

在反对魏特林斗争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赫斯、克利盖、格律恩等人。他们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公开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用什么“博爱”、“人道”、“永恒的正义”等抽象词句，诱使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跟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去讲“爱”，实现一种以“爱”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假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企图掩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维护危机重重的普鲁士王朝。马克思、恩格斯一起写了《反克利盖的通告》，这一文件揭穿了克利盖等人关于“爱”的胡言乱语。《通告》的传播，使克利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846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还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另一头目格律恩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斗争，有一次辩论继续了三个晚上。在辩论中，恩

格斯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共产主义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辩论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蒲鲁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流传很广，严重地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传播。蒲鲁东(1809—1865)，出生在法国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本人做过排字工人，后来又开办过一个小印刷所。四十年代初，他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提出“财产就是盗窃”这一论断而出了名。1846年，他写成并出版了《贫困的哲学》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他反对资本主义大私有制，却幻想小私有制永世长存。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社会改良。他鼓吹以组织各种合作社，开办“交换银行”等办法来摆脱资本主义剥削。他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鼓吹无政府主义，并提出“打倒政党，打倒国家”的荒谬口号，提倡个人“绝对自由”。1847年，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系统地批判了蒲鲁东的政治、哲学和经济观点，揭穿了这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骗子的反动嘴脸。

在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西欧各国工人中间传播，为日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准备了条件。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把创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同各国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系，进行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正义者同盟”的活动。正义者同盟成立于1836年，最初只是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的秘密团体，后来活动范围逐渐扩大，成为当时国际性的一个工人组织。但由于缺乏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并受到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严重影响，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不可能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重任。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同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并不断取得

胜利，使同盟的大多数盟员日益倾向科学社会主义。1847年初，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同盟领导人的邀请，加入了这个组织，以便在内部把同盟改组成为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

1847年6月，在伦敦召开了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并为同盟拟定新的章程。为大会所通过的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572页。]章程的其他条文规定：同盟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铲除从前那种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方式。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过去“人人皆兄弟”的错误口号。从此，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出现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

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同盟的纲领。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原则，并委托他们起草宣言，作为同盟的纲领公布出来。这就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战斗纲领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正式发表。

《宣言》第一次完整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战斗纲领。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578 页。]因此，《宣言》“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442 页。]。

”《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极为丰富，它的主要论述有：

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宣言》一开始就提出：“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50 页。]这就是说，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全部社会历史都是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有时隐蔽，有时公开，但它一直在进行着，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革命改造，就是靠阶级斗争来推动的。千百年来，正是无数次奴隶和农民的斗争和起义，促进了社会的更替，推动着历史前进。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是不可调和的。

《宣言》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60 页。]，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发展为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结局，必然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共产党宣言》以大无畏的气魄向全世界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经历了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长期发展过程。资产阶级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它的政治势力也随之发展起来。这样，**“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同上书，第 256。]资产阶级经过社会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

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初期，生产关系还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固有矛盾就日益暴露出来，集中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在经济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发生；表现在阶级关系方面，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日益加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51 页。]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消灭经济危机，要消灭经济危机，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代之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都抗拒不了的。《宣言》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同上书，第 263 页。]

三、无产阶级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同上书，第 257 页。]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担当起埋葬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首先，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处于**“现今社会的最下层”** [同上书，第 262 页。]，它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深受剥削和压迫，

因此，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其次，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是最有前途、最有远见、最先进的阶级，它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宣言》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61 页。]最后，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它最大公无私。《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同上书，第 262 页。]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它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为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

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

无产阶级怎样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总结了人类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建立和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任何反动统治阶级，都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运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国家政权这个暴力工具，来对付无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85 页。]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宣言》虽然还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科学的概念，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像一条红线贯串于整个《宣

言》中。《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同上书，第272页。]。

《宣言》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权，一步一步地剥夺资产阶级，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以便迅速发展生产力。《宣言》对无产阶级国家下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义：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同上书，第272页。]。列宁认为，所有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的表述。

五、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8页。]。它科学地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纲领、任务和策略原则。

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上代表整个阶级的利益，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是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因此共产党不同于其他工人组织和工人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彻底革命的精神。

关于党的纲领和任务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在政治方面，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剥夺剥夺者，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页。]不仅如此，在思想文化方面，还要同私有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同上书，第271—272页。]只有实行这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

关于党的策略原则,《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同上书,第284页。]这就是说,共产党在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斗争中,必须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统一起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宣言》的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气势磅礴地向全世界宣告: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5-286页。]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给国际无产阶级指明了一条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路线。《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国际工人运动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而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322页。]《宣言》发表已经一百多年了,但**“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一卷,第91页。]。《宣言》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战胜一切反动派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新老修正主义者总是妄图篡改《宣言》的基本原则,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一切妄图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小丑,都必将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二、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刚刚发表，就迎来了 1848 年的欧洲革命大风暴。从巴黎到布达佩斯，从柏林到巴勒莫的广大地区，革命席卷着整个欧洲大陆。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近代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这场革命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清除这些国家封建制度的旧地基，为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扫除障碍。

1848 年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它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较高阶段上发生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它和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不同的特点。特别是新兴的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使这场革命打上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烙印。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和指导了这场革命，坚决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并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了自己的革命理论。

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是 1848 年欧洲各国革命的先锋，它吹响了这次革命风暴的号角。

二月革命前，统治法国的是以路易·菲利浦为国王的七月王朝(1830—1848)。它代表金融大资产阶级利益，实行只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对内对外政策，成了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在全国三千六百万居民中，只有二十万人获得了选举权，不仅工人、农民，而且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工业资产阶级也被剥夺了选举权。随着法国工业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增长，他们对金融贵族独揽政权表示不满。部分议员组成“王朝反对派”，要求实行选举改革。因此，从无产阶级到“王朝反对派”都起来反对七月王朝，当然，各个阶级、各个派别的利益和政治目标是各不相同的。1847 年经济危机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

1847 年 7 月，资产阶级反对派利用经济危机造成的革命形势，在法国各地以“宴会”为名，举行政治性集会，鼓吹选举改革。最大一次宴会准备在 1848 年 2 月 22 日举行。基佐内阁下令禁止，

资产阶级反对派怯懦地退却了。而以工人为主体的巴黎革命群众则依然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基佐！”的口号，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政府随即调兵镇压。当天夜晚，工人们筑起了一千五百多座街垒，发动武装起义。24日，巴黎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占领了巴黎所有的兵营和武器库，工人们高呼“打倒路易·菲力普”、“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向王宫进攻，国王来不及整装，狼狈逃往英国。起义人民把国王的宝座搬到巴士底广场上的烈士纪念碑前烧毁，七月王朝被推翻，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并成立了临时政府。

巴黎的武装工人是二月革命的主力，但由于当时无产阶级还不成熟，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所窃取。从表面上看，临时政府是参加革命的各阶级的联合，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代表无产阶级参加临时政府工作，实际上，他们只得到个空头委员，资产阶级垄断了临时政府的一切重要职位。所以，马克思认为，这个政府只能是根本利益互相敌对的各个不同阶级的妥协。在这种暂时妥协的背后，隐藏着不可调和的新的阶级搏斗。当时由于工人手中拥有武装，临时政府被迫通过了一些和工人阶级利益直接有关的法令。如废除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它宣布实行普选制，许诺工人有“劳动权”，缩短工时等。另外还根据工人提出“组织劳动”成立劳动部的要求，临时政府别有用心地采纳了路易·勃朗的建议，在卢森堡宫设立了“政府劳动委员会”（又称“卢森堡委员会”），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分任正副主席。资产阶级同意设立这个机构，目的是要麻痹和欺骗无产阶级。这个以调解劳资纠纷为名的所谓“政府劳动委员会”，既无实际权力，又无活动经费。马克思讥讽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是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三十年代开始，他在报刊上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宣扬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当时法国工人运动中有一定的影响。他一贯抹煞阶级差别，宣扬阶级调和。他认为，“协调是万物的法则”，“通过一切人的自由协作和他们之间的兄弟团结”，就能使“一切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进行改善”。他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国

家身上。二月革命后，他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完全寄托于临时政府，对资产阶级采取无原则的妥协，竭力阻止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在卢森堡委员会里，他充当了劳资纠纷的仲裁人，喋喋不休地呼吁工人要稳健和忍耐，跟资产阶级合作。列宁指出，“**路易·勃朗在 1848 年革命中是臭名远扬的，.....用‘社会主义’词句装饰起来，而实际上只是帮助资产阶级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路易·勃朗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 14 页。]

正当路易·勃朗之流对工人群众喋喋不休地进行欺骗说教的时候，资产阶级加紧采取各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策划反对无产阶级的罪恶阴谋。

资产阶级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解除工人武装。临时政府通过了改组国民自卫军的决定，接着又招募大批流氓无产者组成了一支二万四千人的别动队，作为它的反动支柱。同时，临时政府还大量起用旧时的达官贵人，纠集反动势力充实官僚机构。

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离间工农关系，临时政府假借满足工人对“劳动权”的要求和实现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计划，设立了“国家工场”，收容了十万名失业工人，把他们按半军事组织编制起来，驱使他们从事笨重而效率极低的手工劳动，每一工作日报酬是二十三个苏。当工人由于工资低，生活非常困难而产生不满情绪时，资产阶级就趁机对工人说：“这就是你们所希望的社会主义呀！这就是劳动权呀！”同时，临时政府为了挑动农民、小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还特意颁布法令，规定四种直接税每一法郎增加四十五生丁[一百生丁合一法郎，五生丁为一苏。]的附加税。这项税收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负担的，当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资产阶级就恶意宣传说，增加附加税是用来维持“国家工场”，养活“游手好闲”的工人的，以此诱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困难遭遇，归罪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通过这些无耻的阴谋诡计，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离间了工农关系，孤立了无产阶级。**“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

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411 页。]

面对着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无产阶级被迫行动起来。1848 年 6 月 21 日，政府下令解散“国家工场”，强令青壮年工人编入军队或到外省垦荒。工人们“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22 日，巴黎工人构筑街垒，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他们没有理睬路易·勃朗的“马上放下武器”的说教。起义者提出了“建立民主的社会共和国”的口号。这就是 1848 年革命中著名的巴黎工人六月起义。

在激烈的街垒战中，四万多名极端缺少武器的起义者，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视死如归，高呼“不战胜，毋宁死”的誓言。而他们的敌人却是二十万装备精良的政府军队。经过了五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在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失败了。接着，资产阶级就对巴黎工人进行血腥的屠杀。在六月起义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有一万一千多人被杀害，二万五千人被判处监禁、流放和各种苦役，资产阶级用“步兵、骑兵、炮兵”代替了他们的“自由、平等、博爱”，完全暴露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对无产阶级实行专制统治的原形。

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次起义，指出：“**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 [《1840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415 页。]六月起义也证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起义者的鲜血，宣告了路易·勃朗之流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破产。于是，无产阶级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同上书，第 417 页。]

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法国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政治舞台。资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统治。然而，政局并没有稳定下来，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进行的争权夺利又表面化了。共和派资产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在制宪国民议会中，通过了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宪法中授予总统各种特权，为建立总统的个人独裁开辟了道路。可是，在 1848 年 12 月的总统选举中，由于小农强烈的“拿破仑观念”和对共和国的不满，资产阶级共和派在选举中失败。法国前皇帝拿破仑的侄儿、政治骗子路易·波拿巴却赢得了农民的绝大部分选票，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路易·波拿巴上台后，玩弄各种阴谋手段，掌握了军队、行政和议会的全部权力，完成了一个拥有五十万军队和五十万官吏的庞大的反动国家机器，并于 1851 年 12 月 2 日发动政变，解散立法国民议会。1852 年 12 月 2 日，他又宣布废除共和制，恢复帝制。路易·波拿巴政权是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后产生的一种反动统治形式。

德国三月革命

法国二月革命的火花，点燃了近邻德意志的三月革命。

革命前夕的德国，是一个非常松散的邦联。当时，德国境内有三十四个邦国、四个自由市。它们在内政、外交、军事上各自为政，币制、度量衡也各不相同，严重地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消灭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实现国家统一，成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

但是，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形成了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并且决定了各阶级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封建贵族仍然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的特权，掌握着政府和军队的一切要职，他们反对一切改革，维护封建和宗教的反动统治，他们是旧生产关系的代表，是革命的死敌。德国资产阶级比英、法资产阶级出世晚，直到四十年代才开始参加政治运动，要求参与国事，改变政治上的无权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由于德国经济比较落后，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而商业资产阶级又同封建

贵族保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由于德国工人运动已经兴起，因此，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的程度，已经超过它对封建势力的不满。这就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十分软弱的，动摇的。农民是德国人口中的主要部分，虽然由于资本主义渗入农村，农民已经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但是，除了一小部分大农(即富农)外，大量的小农、佃农和农奴，仍处于封建专制的沉重奴役下，他们迫切要求消灭封建势力，积极投入反封建的斗争。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大多数人来自农村，与农民血肉相连，他们深受资本家和封建主的双重剥削，最富有革命性，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但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够，还不能使自己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恩格斯在总结 1848 年革命前夜的阶级力量对比时指出：“**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517 页。]。这就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必然背叛人民，而同封建统治阶级妥协。

德国的三月革命，首先是在和法国毗邻的西南部的巴登、巴伐利亚等地爆发了人民的革命运动。3 月 1 日，巴登反动内阁倒台，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参加的新内阁。其他各地的政权也相继转到资产阶级自由派手里。

奥地利和普鲁士是德意志邦联中的两个最大的邦国。3 月中旬，奥地利首府维也纳和普鲁士首府柏林爆发了革命，德国这两个反动统治的堡垒，这时成了革命的中心。3 月 13 日，维也纳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梅特涅!宪政万岁!”的口号。当首相梅特涅调集军队进行镇压时，人民群众迅速筑起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梅特涅见势不妙，男扮女装，仓皇逃往英国。奥皇斐迪南一世被迫宣布改组内阁，同意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

梅特涅政权垮台的消息，促进了普鲁士的革命运动。柏林的工人、市民和大学生也开始了革命行动。但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对群众的革命行动一开始就怕得要命。在革命爆发以前，他们就一再以颤栗而恐惧的声音向工人呼吁说：“田地的收获要靠太阳和及时雨，劳动的收获要靠秩序与和平，可是起义却如同雹灾！”力图把革命纳入“和平改革”的框子。普鲁士国王也企图用虚假的改革诺言来阻止革命。3月13日至16日，柏林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政府调集军队进行镇压，资产阶级竭力劝导工人“保持安静”。3月18日下午，反动军队再次向聚集在王宫外的群众开枪，于是，武装起义开始了，以工人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冲破资产阶级的重重阻挠，同一万四千名反动军队战斗了十小时，取得了柏林三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天早晨，胜利的革命人民涌向王宫，命令普王向起义的阵亡者脱帽致哀，对普王进行了一次严正的审判。3月底，莱茵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康普豪森和汉泽曼接受普王的委任组织内阁。资产阶级依靠人民的起义参加了政权，但是他们上台之后，便立即同保皇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反对革命。这样，就为君主专制势力的反扑准备了条件。

1848年革命风暴还席卷了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意大利、匈牙利、捷克等国都先后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战争，猛烈地冲击了欧洲的旧秩序。在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风暴中，沙皇俄国扮演了绞杀革命的刽子手角色。当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彼得堡时，正在跳舞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惊恐万状，立即杀气腾腾地叫喊：“各位军官准备上马吧，巴黎发生革命啦！”于是，他派十五万大军驻扎普鲁士边界，把十二万军队集中在波兰。正当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巨大胜利之际，尼古拉一世又马上派出十四万侵略军，进行残酷镇压，匈牙利独立战争被沙俄的武装干涉扼杀了。恩格斯指出，从法国二月革命起，“**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运动越是具有整个欧洲的规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参加斗争**”[《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83页。]。

马克思、恩格斯战斗在 1848 年革命风暴中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47 年就预见到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当 1848 年欧洲大陆爆发革命风暴时，他们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满腔热情，立即奔赴革命的第一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共产主义者同盟三百多个成员也分别在欧洲各国积极地参加了这次革命，接受了这次革命的考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恩格斯正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由于比利时反动当局的迫害，同时，为了就近指导革命斗争，马克思于 3 月初到了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人随后也相继到达。他们在巴黎建立了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被选入中央委员会。3 月下旬，恩格斯也到达巴黎，同马克思并肩战斗。

当三月革命在德国各地相继爆发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摆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3 月底，他们亲自主持制定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行动纲领，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德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它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进一步把这些原则性的策略具体化了。它一开始就规定，德国无产阶级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因为在没有清除封建割据局面之前，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轻举妄动。同时，无产阶级决不能把革命停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而应该处处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着想，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了保证革命的胜利以及有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实行普选权，保证工人代表参加议会；建立人民武装，使军队同时成为劳动大军；彻底实行政教分离，普及国民教育，实行免费诉讼；官员薪金一律平等，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等等。这样就把国家的

统一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了。《要求》还提出了把矿山、交通企业、银行、邮局收归国有，并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由国家保障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限制资本的增长等等措施。此外，《要求》还把武装全体人民作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保证。由此可见，《要求》实际上规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斗争纲领和策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所规定的行动纲领和政策、策略，在巴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三、四百名德国工人先后秘密地、分散地回到国内，从事艰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其中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他们散布在德国各地，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了传单，并和《共产党宣言》一起作为指示性的政治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德国工人。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作了关于在德国建立工人组织的指示。

四月初，马克思、恩格斯也离开巴黎回国，到达莱茵河地区的工业、文化中心科伦市，直接参加德国的革命斗争，同盟中央委员会也迁到这里。

为了指导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巴黎的时候，就考虑创办一份大型日报，大造革命舆论。因此，他们一回到德国，就立即着手创办《新莱茵报》。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新莱茵报》于1848年6月1日正式发行。马克思任主编，恩格斯和其他一些著名的盟员都参加了编辑工作。这个报纸虽然标明是革命民主派的机关报，但它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利用该报广泛宣传他们所制定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并通过《新莱茵报》来指导那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盟员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通过报纸同各国的民主派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指导各国工人的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并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共同反对欧洲的反动势力：沙皇俄国、资产阶级的英国和德意志帝国。

《新莱茵报》特别注意教导德国工人阶级随时站在运动的左翼，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并在革命的每一阶段和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作出具体指示。因此，《新莱茵报》的群众基础日益扩大，并对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

德国反动当局对《新莱茵报》极为害怕，千方百计地扼杀它。到 1849 年 5 月，反动势力更加猖狂，悍然强迫《新莱茵报》停刊，强行驱逐马克思出境，编辑部许多工作人员也遭到迫害，革命力量不得不暂时退却。5 月 19 日，《新莱茵报》最后一期用红字刊登了给当地人民的告别信，信中写道，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致科伦工人》，《马克巴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 619 页。] 《新莱茵报》虽然停刊了，但它对教育无产阶级，推进当时的革命斗争所作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离开科伦来到伦敦。恩格斯到德国西南部普法尔茨参加了人民起义，同反动派军队英勇作战。1849 年 7 月，起义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和其他起义者一起，经瑞士来到伦敦同马克思会合。

恩格斯由于亲身参加了武装起义，所以，在起义失败后，就系统地总结了武装起义的原理。他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进行武装起义，以及使起义获得胜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论述军事问题的重要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1848 年德国革命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波尔恩(1824—1898)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他是当时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和“工人兄弟会”的主席。他和各式各样的坏家伙称兄道弟，力图在自己的周围纠集一帮人，大搞宗派活动。在政治上，他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他拒绝参加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的政治斗争，宣扬工人在国家的赞助下建立生产合作团体和信贷机构，实行点滴的改良。他认为只要工人阶级都参加了生产合作团体，就成了“自由的阶级”，而那时资产阶级就会自然“消失”。他甚至无耻地宣称，他的使命就是尽力使无产阶级不“骚动”。恩格斯在痛斥波尔恩的谬论时指出，“**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00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还同哥特沙克(1815—1849)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哥特沙克当时担任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他不顾具体条件，拒绝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胡说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是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提出“为建立工人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他反对无产阶级和民主派联合，甚至反对和农民结成联盟。马克思、恩格斯在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和科伦工人联合会中，对哥特沙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和耐心的教育，但哥特沙克坚持错误、拒不悔改，并声称同盟的章程威胁着他的个人自由，坚持退出同盟。广大同盟盟员和工人联合会会员纷纷谴责哥特沙克的分裂活动，拥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850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了近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势以后认为，1847年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在经济开始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在最近一段时期，新的革命高潮不会马上到来。因

此，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改变同盟斗争策略的主张，这就是把原来准备发动革命的策略，改变为长期积聚力量，以便迎接新的革命的策略。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主张，遭到了同盟中央委员维利希、沙佩尔等人的反对。沙佩尔纠合了一些不坚定的盟员形成一个集团。他们害怕进行艰苦的积聚革命力量的工作，不顾革命暂时低落的事实，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对客观现实的唯物主义分析，企图采用冒险主义的办法，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德国举行新的起义。他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1850年9月15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但是，他们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们非法地另立“中央”。在这样的情况下，同盟中央委员会的驻地由伦敦迁往科伦，并委托科伦支部建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斗争，新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将维利希和沙佩尔等人清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科伦的新中央委员会开展工作后不久，1850年10月，普鲁士反动当局就策划了“科伦共产党人的审判案”，进行迫害。1851年秋天，普鲁士王室派员到巴黎和法国警察当局谈判，要求它协助德国方面迫害侨居法国的盟员。德国警探还利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和同盟中央对立的机会，派遣警察打入他们在法国的组织，并篡夺领导权。在普鲁士当局的迫害下，一些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被判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被捕人员表示深切的关怀，竭力设法营救。在科伦审判案开庭之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运用确凿的证据和材料，对政府的阴谋——加以揭露和驳斥，结果使得审判案件的法庭成为揭露反动政府罪行的场所。科伦审判案表明：真正的罪犯不是科伦的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个伪造罪证、迫害人民的反动政府。

科伦审判案表明，反动派对同盟的迫害加强了。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建立一个更坚强、更成熟的无产阶级组织来领导受到暂时挫折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1852年11月17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同盟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从成立到解散的五年期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积极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竭力把工人运动引向正确的革命道路，在革命运动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证明，它“**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00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总结

1848年欧洲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革命，它把每个阶级、阶层和政党都卷入斗争的浪潮。

伟大的革命实践使马克思主义胜利地经历了第一次巨大的检验，证明它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唯一正确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亲身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斗争实践，而且在革命过程中，总结了革命的历史经验。写出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73页。]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革命原理，主要有：

第一，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不断革命”。

不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 1848 年革命经验中在革命理论方面重大的成就之一。

在 1848 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已有了不断革命的思想，经过 1848 年革命的实践，他们依据德国和法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针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切社会改良主义者对革命所抱的有限目的，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部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85 页。]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92 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应该隔着一个和平发展时期，应该不断革命，即在推翻封建统治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且不停顿地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还要不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479~480 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坚持不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斗到底！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但是还没有具体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关系，以及怎样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问题。根据 1848 年革命实践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说：“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392 页。]

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总结 1848 年革命经验的时候，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科学概念。

随后，1852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著名的信中，又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他写道：“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332—33 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论断，使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

第三、巩固的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根本力量。

1848 年革命前夕，恩格斯在《1847 年的运动》一文中就指出：“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1847 年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511 页。]恩格斯的这段话，明确表达了工农联盟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 1848 年革命的经验时，进一步论述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马克思指出，在革命进程中，如果无产阶级得不到农民的“合唱”，那么，“**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699 页。]。后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又对这一思想作了阐明，他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 年 4 月 16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884 页。]

马克思不仅阐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建立工农联盟的可能性。他详细分析了农民所处的被剥削被压迫地位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下的破产过程，必然会使他们“**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697 页。]。

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就不能打倒资本家，就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农民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能打倒地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工农联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 1848 年革命的经验时，还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一系列革命原理。

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 1848—1849 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 20 页。]他们在这个时期的伟大革命

实践，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在这个时期所总结出的光辉革命理论，永远是国际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

三、第一国际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1848 年的革命风暴，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使资本主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一度出现了所谓的繁荣景象。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英国不仅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且成了“世界工厂”；其他国家也大大加快了工业革命的步伐。机器生产逐步代替了手工业生产，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扩大，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系日益加强。在此期间，工人运动也逐渐由暂时的低潮转入新的高潮。但是，当时的工人运动，受着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严重影响。为了引导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同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六十年代初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迅速壮大。五十年代末，欧洲产业工人已达八百多万人。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只是使资产阶级大发横财，工人群众却愈来愈穷困，同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

1857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产阶级采取种种措施，把危机的恶果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工人大量失业，工资普遍降低，劳动人民生活更加恶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

英国的工人运动，打破了宪章运动失败以来的沉寂局面，又开始活跃起来。1859 年，伦敦建筑工人举行了要求缩短工作日的罢工，各行各业的工人大力支持。在斗争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伦敦职工

会委员会、木工联合会、全英矿工同盟等组织。1860 年，英国出现了各行各业的联合组织——工联伦敦理事会。

法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1863 年，巴黎、马赛建立了互助会、细木工会、炼铁工人联合会。经过一系列的罢工斗争，迫使波拿巴政府宣布废除禁止工人罢工和结社的反动法令。

德国工人也争得了成立工人组织的权利，于 1863 年在莱比锡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

在美国，工人建立了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和全国性工人联合会。南北战争期间，工人群众开展了积极的斗争。

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西班牙、丹麦等国，到了六十年代，工人组织也陆续建立起来，并开展了活动。

为了迎接工人运动的新高潮，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活动。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早在 1848 年以前就开始了。1848 年革命使他的研究工作一度中断。1857 年的经济危机促使马克思加紧这方面的研究。1859 年马克思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在这本书里，《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已大体形成。1861 年至 1863 年间写了二十三本政治经济学的笔记，1863 年至 1865 年底完成了长达二百多万言以上的三卷《资本论》的全部草稿。1867 年，经过马克思精心整理的《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社会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恩格斯在评述《资本论》时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269 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分析商品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穿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指明了道路。

为了支持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工作，从 1850 年到 1869 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整整二十年，以使用自己的薪金资助马克思一家克服困难。在此期间，恩格斯对军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密切注视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他们写了许多政论文章，热情声援了印度、波兰人民的起义和美国的南北战争，揭露了英、法殖民主义的强盗暴行和美国奴隶主的罪恶行径。马克思、恩格斯还十分关注和热情颂扬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战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革命精神，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还以巨大的革命热情，争取、团结和教育各国工人运动领袖，帮助他们摆脱机会主义流派的影响，并注意从实际斗争中培养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作了重要的准备。

第一国际的建立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剥削越来越带有国际性。因此，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日益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六十年代初，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西欧各国之间的工人，联系越来越多了，特别是英、法两国工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1862 年，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法国工人借参观博览会的机会，同英国工人探讨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问题。他们指出，由于没有一个国际的工人联合组织，由于各国工人缺乏

组织联系，资本家常常用招募外国雇工的办法来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为了对付国际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呼吁建立一个国际工人的联合组织。他们说：“为了工人大众的事业，各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为了表达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情谊，英、法工人还特意共同举行群众大会，声援波兰人民反抗沙俄专制统治的正义斗争。

1864年9月28日，英、法、德、意、波及爱尔兰等国的工人，在伦敦圣马丁堂聚会。马克思应邀出席了大会。会上，法国代表提出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倡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到会代表一致赞成这个提议，并通过决议，宣告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简称“国际”，到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改称为“第一国际”），选出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二十一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后来一般称作“总委员会”）。由于大会是在英国举行，英国工联又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工联领袖奥哲尔和克里默分别被选为主席和总书记。马克思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是第一国际的真正领袖。恩格斯说，“**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页。]

第一国际成立以后，专门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制订“国际”的纲领和章程。马克思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上，对于“国际”的性质和任务，出现了好几种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和草案。因此，斗争异常激烈，各方争论不休。最后决定由马克思修定“国际”的纲领和章程。

马克思认为，在“国际”的纲领中，既要坚持《共产党宣言》中确定的基本原则，也要考虑到当时各国工人运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以及机会主义流派统治许多国家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所以在草拟这些文件时，要做到“**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第17页。]，才能实现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才能把工人运动引向革命的轨道。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成立宣言》以朴素的语言和确凿的事实，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造成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得温饱，贫病交加和日益贫困化的真相，从而坚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日趋对抗的思想，批判了阶级调和论。《成立宣言》肯定了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工人斗争取得的两项成就。一项是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取得了十小时工作日的立法。另一项是合作社运动，这一运动证明了大规模生产没有资产阶级同样能够进行。但《成立宣言》紧接着指出，这些斗争并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要解放劳动群众，必须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推翻资本主义统治。

《成立宣言》针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政治斗争的错误路线，明确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马克思在这里庄严地宣布：“**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134 页。]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必须进行革命斗争，并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针对当时西欧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马克思提出了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的任务。

《成立宣言》谴责各国统治阶级的殖民政策和战争政策，号召工人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而斗争，并把这一斗争作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最后，《成立宣言》重申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战斗口号。

《共同章程》规定了“国际”的目的和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群众，消灭阶级压迫、为工人阶级解放而奋斗。《章程》进一步阐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136 页。]。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这个伟大目标，只有通过政治斗争，通过各国无产阶级的合作才能最后实现。《章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规定了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总委员会为常设机构，在大会闭幕期间行使最高权力和主持日常工作。

1864 年 11 月，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同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第一国际创立初期就取得了胜利，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初步树立了领导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路线斗争的结束，第一国际内部的斗争，是以往国际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在新的条件下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复杂了。

在第一国际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第一国际成立起到 1868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止。这一时期的中心活动是反对蒲鲁东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工联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第一国际在这个时期召开了伦敦代表会议(1865 年 9 月 25—28 日)，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 年 9 月 3—8 日)，洛桑代表大会(1867 年 9 月 2—8 日)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 年 9 月 6—13 日)。

第二时期从 1869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起到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止。在这段时期里，出现了英勇的巴黎公社起义，召开了伦敦代表会议(1871 年 9 月 17—23 日)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 年 9 月 2—7 日)。第二时期的主要活动是反对巴枯宁主义和支援巴黎公社。

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内部同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中，第一个回合就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蒲鲁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期在法国流行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蒲鲁东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纷纷破产。他们对资本主义深为不满，但又害怕自己

落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幻想建立一个小私有者与世长存的社会。蒲鲁东主义正是反映了这种日益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和愿望，这就是它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早在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对蒲鲁东主义进行过批判。第一国际建立不久，蒲鲁东死了，但是，他的门徒继承了蒲鲁东的衣钵，继续传播蒲鲁东的一系列机会主义谬论。由他们把持的第一国际的巴黎支部，完全拒绝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力图把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并推行到国际工人运动中去。因此，蒲鲁东主义成了第一国际前期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危险。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的。

关于“国际”领导权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十分害怕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威望日益提高，千方百计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的领导权。在伦敦会议和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一次又一次提出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提案。其罪恶意图是妄想把马克思、恩格斯排挤出“国际”，篡夺“国际”的领导权。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斗争，击败了他们的疯狂进攻，粉碎了他们妄图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

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道路问题。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为“国际”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蒲鲁东主义者竭力反对“国际”的这一条革命路线，反对政治斗争，鼓吹阶级调和，他们甚至反对工人罢工，反对组织工会，反对八小时工作制和妇女参加生产。经过激烈的斗争，洛桑代表大会坚持了正确方向，作出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要彻底解放，要在经济上获得翻身，首先必须参加政治斗争，才能赢得自己的政治权利。大会挫败了蒲鲁东主义者的荒谬主张，避免了工人运动被引向改良主义的邪道。

关于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沙皇俄国“**是西欧整个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根有力支柱**”[《〈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 642 页。]。沙皇俄国对波兰的野蛮殖民统治，激起了波兰人民的强烈反抗。1883 年，波兰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马克思、恩格斯给予热烈赞扬，并且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积极支持波兰的民族独立要求，指出波兰的独立可以削弱沙皇俄国的力量，促进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是，在伦敦代表会议和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把波兰问题列入议程。他们吹捧沙皇俄国是“先进的强国”，胡说波兰起义被镇压是“罪有应得”，反对“国际”讨论波兰问题，攻击“国际”支持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正确立场，极力否定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愤怒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动谬论，深刻地指出这是“**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147 页。]。经过斗争，两次会议都通过了有关支持波兰独立的决议，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沉重打击了蒲鲁东派的机会主义路线。

关于所有制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65 页。]蒲鲁东派从小生产者立场出发，坚持小私有制。在洛桑代表大会上，他们宣扬个人所有制，说什么“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在布鲁塞尔大会上，他们竟鼓吹土地的个人所有制“是幸福和进步的主要前提”，气焰十分嚣张。马克思为了给蒲鲁东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还在布鲁塞尔大会以前，就在国际总委员会上作了专门报告。

在布鲁塞尔大会上，根据马克思的报告，作出了正确的决议。指出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工业生产资料、农业土地以及一切交通手段等，都应当成为公有财产，应当归全社会所有。这个决议是对蒲鲁东主义的一个毁灭性打击，它标志着蒲鲁东主义者企图保存小私有制的整个机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破产。

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不懈的斗争，击退了蒲鲁东主义的猖狂进攻。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才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指南，进一步暴露了蒲鲁东主义的荒谬和反动。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蒲鲁东主义则不断失去市场，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蒲鲁东主义者左翼如瓦尔兰等人，日益接近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和领导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右派逐渐脱离了工人运动，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死敌。最后，在暴风雨般的巴黎公社革命中，蒲鲁东主义终于被彻底埋葬。

反对英国工联主义的斗争

工联主义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头子们所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总称。工联主义者把改善当前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斗争作为无产阶级的唯一要求，反对政治斗争，用经济主义腐蚀工人群众的斗志。他们的口号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他们参加“国际”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国际”变成保护他们目前利益的国际性的工联组织。工联主义者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入邪路，严重地危害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工联主义的斗争中，彻底揭露了英国工联的反动实质。马克思指出：“**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的组织。**”[《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 694 页。]

第一国际成立时，工联是当时英国全国性的工人唯一组织，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和欺骗作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争取英国工联加入“国际”，以便团结教育英国广大工人群众，使他们提高政治觉悟，摆脱工联主义的束缚，推动英国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工联主义产生在英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英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贵族实行收买政策的产物。当时英国是一个大工业发达的国家，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在世界上占着垄断地位。英国资产阶级慑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就力图破坏工人运动，他们把从殖民地榨取来的巨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用来收买

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熟练技术工人，在工人阶级内部培植自己的支柱——一个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是工人运动中出现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工联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在总委员会内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的。

关于对待工会运动的态度问题。工联主义者反对工人争取普遍提高工资的政治罢工斗争，硬说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物价的上涨，他们还散布工会运动“有害”的谬论，认为工人阶级可以不要工会。针对这类谬论，1865年6月，马克思在两次总委员会的会议上与工联主义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马克思在题为《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中，阐明了工会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而斗争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是不断加强对工人的掠夺，平均工资水平不断降低。因此工人阶级当然不能放弃这一斗争，但不应夸大争取提高工资斗争的意义，因为这**“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3页。]。马克思号召：**“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同上书，第203-204页。]

关于无产阶级参加选举改革运动的问题。改变英国不合理的选举制度，长期以来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六十年代掀起的群众性的选举改革运动，发动英国工人群众投入政治斗争，为争取基本的民主权利而斗争。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总委员会决定派出代表(主要是工联领袖)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建立了全国性的选举改革同盟。1867年，由于群众运动汹涌澎湃，英国政府被迫作了让步，通过了选举改革法案。这个法案使资产阶级争得了较多的政治权利，收入较多的工人上层分子也得到了选举权。但广大工人群众依然没有获得选举权。这时，工联领袖竟然和自由资产阶级一起接受了这一选举权改革法案。于是，轰轰烈烈的选举改革运动由于工联领袖的叛

变就半途而废了。马克思揭露了工联领袖的叛卖行为，指出他们已走上同资产阶级妥协而损害工人利益的道路。

关于对待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问题。这是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另一个最突出的问题。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1801 年被正式并入英国。为了争取独立，爱尔兰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六十年代，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英国工联的领袖们在爱尔兰问题上追随资产阶级，采取了沙文主义的立场，反对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不但揭露英国统治阶级镇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暴行，反而指责爱尔兰人民的革命行动。工联领袖甚至无耻吹捧英国首相是一个“诚心诚意地”关心爱尔兰人民的慈善家。他们扮演了殖民主义辩护士的角色，竭力维护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坚决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揭露和批判工联领袖的叛卖立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提出了**“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312 页。]的著名论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阶级在爱尔兰问题上必须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坚决支持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这对英国工人阶级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问题，而是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马克思以大量事实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人民残酷统治的种种暴行，动员各国无产阶级支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在马克思倡议下，总委员会组织了抗议囚禁爱尔兰革命志士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553 页。]。

鉴于工联领袖的多次破坏活动，在 1867 年洛桑大会后，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撤销了工联头子奥哲尔所担任的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反动势力向“国际”猖狂反扑，工联领袖竟然公开诬蔑巴黎公社，攻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并声明退出总委员会和第一国际，走上了公开彻底背叛工人阶级的可耻道路。

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拉萨尔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在德国出现的一个机会主义流派。六十年代初，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工人运动蓬勃兴起，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治组织。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拉萨尔窃踞了联合会主席的职务，拉萨尔主义成为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

拉萨尔(1825—1864)，出身于普鲁士的一个丝绸商家庭。在1848年革命中，他曾与《新莱茵报》建立了联系，认识了马克思。从此他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常常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六十年代初，他混入工人运动，发表了《工人纲领》和《公开答复》等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里，他剽窃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思想和词句，骗取声誉。但是，拉萨尔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一个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内奸和工贼。他向工人兜售了一整套机会主义的理论、纲领和策略。

拉萨尔根本否认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是“教育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的工具”。他断言只要实现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就可以使资产阶级君主国家变成“自由的人民国家”。因此，他鼓吹争取普选权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道路，竭力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恶毒地污蔑工人阶级以外的劳动群众是“反动的一帮”，反对工农联盟，破坏革命事业。他还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推导出所谓“铁的工资规律”，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自然规律支配的，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反对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主张依靠普鲁士国家“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就可以使无产阶级获得经济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62 年拉萨尔到伦敦会见马克思时，马克思就尖锐地指出：“**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 年 2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352 页。]

恩格斯也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 255 页。]。

拉萨尔为了推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投靠普鲁士王朝，无耻吹捧普鲁士容克贵族的代表人物、“铁血宰相”俾斯麦。1863 年起，他经常与俾斯麦通信和密谈，出谋划策，效劳卖命，完全成为一个无耻的内奸和工贼。恩格斯当时就指出：“**这家伙现在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 年 6 月 1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 351 页。]。马克思在一封信中也指出：“**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 年 2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353 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关键在于争取和教育群众。全德工人联合会(简称联合会)从创立时起就在拉萨尔的控制之下，拉萨尔死后，仍然操纵在他的信徒手里。虽然如此，联合会毕竟是当时德国无产阶级唯一的全国性的独立组织，所以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极力争取全德工人联合会参加“国际”，期望通过第一国际来影响德国无产阶级，使德国工人运动摆脱拉萨尔主义的羁绊，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但是，拉萨尔的后继者借口普鲁士政府禁止参加国外组织的法令，千方百计地阻挠联合会加入第一国际。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只好越过联合会的领袖，直接与该组织中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通过他们来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首先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并起来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他们在联合会内展开了巨大的工作，把联合会中的先进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1867 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退出该会。1869 年 8 月，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领导下，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了全德先进

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通称爱森纳赫派。爱森纳赫派按照第一国际的主要原则制定了自己的党纲，宣布自己是第一国际的一个分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拉萨尔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清除，七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同拉萨尔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

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斗争

蒲鲁东主义被击败后，巴枯宁及其党羽跳了出来。他们组织阴谋集团，大搞分裂活动，贩卖巴枯宁主义，严重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成为第一国际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

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他参加过 1848 年布拉格和德累斯顿起义，失败后被捕，1851 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在狱中写过“忏悔书”，称自己为“悔改的罪人”，哀求沙皇赦免，成了可耻的叛徒。1861 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亡，途经日本、美国到达欧洲，1864 年混入第一国际。

巴枯宁是一个极端狂妄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国家本身。他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的财产都是国家恩赐的。他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他主张通过密谋的暴动来“摧毁一切”、“破坏一切”，首先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举消灭一切国家。

巴枯宁认为，社会革命应当从废除继承权开始，实行集产制。他的所谓集产制，就是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组成工业、农业组合，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反对任何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他的集产制，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巴枯宁主张建立一种“自由和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最充分的自由”，每个人、每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不再有任何权威。流氓无产者和破产的小生产者，是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的主要依靠力量。

总之，巴枯宁主义的要害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破了产的小生产者绝望心理和疯狂情绪。它同蒲鲁东主义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阶级本质是一样的，两者都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巴枯宁主义掺杂了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意识，因此具有比蒲鲁东主义更大的破坏性。

巴枯宁主义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四十年代，巴枯宁受蒲鲁东无政府主义影响很深。六十年代初，他到意大利活动，当时的意大利，还是一个经济上相当落后的国家，小生产占绝对优势，但是，资本主义的逐步兴起，造成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成批破产，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游民无产者阶层。这批人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弄得倾家荡产，因而产生了绝望的心情和破坏一切的倾向。巴枯宁来到意大利后，很快就结识了一批失去了小资产阶级地位的青年和许多在社会上盲目浮动的游民，并生活在他们中间。巴枯宁从那些绝望的、破了产的游民无产者身上，在他們那种破坏一切的盲目情绪中，看到了他所谓“社会革命”的希望，形成了他那一套无政府主义思想。

巴枯宁对工人运动的危害不仅在于他的无政府主义谬论，更主要的在于他的集团的阴谋分裂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马克思致弗·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39 页。]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不但在理论上清算了巴枯宁主义，而且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

1867 年秋，巴枯宁从意大利迁居瑞士后，于 1868 年 10 月组织了一个阴谋集团——“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积极策划将“同盟”打入“国际”。为此，巴枯宁施展江湖骗术，玩弄阴谋手段，他假惺惺地写信给马克思说，“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企图骗取信任，打入“国际”，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觉察到巴枯宁的阴谋和野心，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马克思为总委员会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文件，决定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同时，马克思为总委员会写了《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的信，明确表示：只有在同盟废除其错误纲领和解散其组织以后，才能分别接纳盟员加入“国际”。两个文件击中了巴枯宁的痛处，他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国际”提出的条件，混入了“国际”，但暗地里仍把同盟组织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进行篡权活动。

1869 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巴枯宁阴谋集团采取卑鄙手段，伪造代表资格证件，纠集“代表”的多数，阴谋操纵大会，篡夺总委员会的领导权。针对这一情况，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关于加强总委员会职权的决议”，规定总委员会有权吸收和拒绝新的团体或支部加入“国际”，并且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有权暂时开除支部。当时，巴枯宁集团也“赞成”这项决议，但是，他们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巴枯宁一伙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所以，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巴枯宁本想利用这项决议，在篡权后加强自己的权力。但是代表大会再一次连选了前任的总委员会，巴枯宁没有被选入，巴枯宁集团的篡权阴谋再次成了泡影。

在大会的主要议程上，巴枯宁集团抛出了一个反动的理论纲领，胡诌什么“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在这个关系到革命方向的大问题上，马克思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武器，为总委员会

写了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指出继承权是私有制在法律上的反映，它不是产生私有制的原因，恰恰相反，私有制才是产生继承权的原因，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继承权也就自行消亡了。马克思严正指出，把废除继承权说成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起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285 页。]。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后，巴枯宁集团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公开勾结工联主义分子、拉萨尔分子和残余的蒲鲁东主义右翼分子，打出“支部自治”的旗号，反对“国际”领导，继续大搞分裂破坏活动，肆意攻击马克思是个“独裁者”，恶意中伤总委员会是“权威主义”的“巢穴”，大造反革命舆论，以诋毁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威望。面对巴枯宁之流的疯狂进攻，马克思写了一个《机密通知》，论证了总委员会的正确立场和策略，揭露了巴枯宁的两面派手法和阴谋活动，驳斥了他们的无耻诽谤，又一次给巴枯宁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为了彻底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总委员会决定派出代表到瑞士进行调查，巴枯宁心怀鬼胎，极为惊慌，竟丧心病狂地指使其死党对总委员会的代表进行暗杀活动。但是，巴枯宁的阴谋没有得逞，调查人虽然受了重伤，仍按时完成了任务。

巴枯宁分子的阴谋和分裂活动表明，他们已自绝于“国际”。1872 年 9 月在海牙召开的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报告系统地揭露了巴枯宁及其党徒的一系列破坏活动和他们惯用的两面派伎俩。大会决定把巴枯宁及其死党开除出第一国际，并公布巴枯宁集团阴谋分裂活动的罪行，作为向全世界无产者进行教育的反面教材。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这次路线斗争时说：“**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 372 页。]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战胜分裂主义阴谋集团的宝贵历史经验。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巴枯宁集团的揭露和斗争，巴枯宁的反动理论和路线日益破产，巴枯宁及其死党在工人运动中已彻底孤立，巴枯宁于 1873 年 9 月被迫在《日内瓦报》上发表了“退出斗争舞台”的声明。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就这样被工人运动的革命洪流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变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1876 年，巴枯宁病死于日内瓦，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由于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反动政府的破坏，由于巴枯宁分子继续进行分裂活动，使“国际”不能正常的开展工作。为此，总委员会于 1872 年迁往纽约并基本上停止了活动。这个时期，欧美各国工人运动进入了积聚革命力量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新阶段。“国际”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了，所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于 1876 年 7 月 15 日在美国费城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并通过决议，正式宣告第一国际解散。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在欧洲和北美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第一国际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各国工人，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援，并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作出榜样，第一国际还在组织上为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伟大导师列宁在评价第一国际时写道：“**第一国际(1864—1872 年)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 274 页。]“**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立下了伟大的功绩，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742 页。]。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创立了巴黎公社。这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是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它用鲜血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写下了极为珍贵的革命篇章。当巴黎的战斗尚在激烈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677页。]。“**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12页。]马克思的这个伟大预言，正越来越成为光辉的现实。

马克思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

1870年7月，普鲁士和法国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历史上称之为“普法战争”。这场战争是两同反动统治阶级为争夺欧洲霸权而挑起的王朝战争。

战争爆发以前，统治法国的是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期间，法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路易波拿巴为了维护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军事、警察、官僚机构，对内残酷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对外连年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弱小民族。战争消耗了法国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沉重的军费负担又全部压在劳动人民身上，使劳动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857年经济危机以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不断高涨，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1869年的工人大罢工，更加猛烈地冲击了第二帝国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的波拿巴政府为了转移人民视线，阻挠革命，就想以发动对外战争来摆脱国内的政治危机。正如皇后欧贞尼对她儿子说：“如果没有战争，吾儿将不能做皇帝了！”对谁发动战争呢？对普鲁士。这是法国统治者蓄谋已久的狂妄野心：一方面攫取他们垂涎已久的莱茵地区；另一方面，阻挠德国的统一，以维护自己在欧洲的霸权，所以寻找借口向普鲁士宣战。

长期以来，德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中，封建的割据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竭力想通过各个邦国之间的兼并和战争，实现“自上而下”的统一。1851年，俾斯麦担任普鲁士的宰相，加紧实行对内残杀人民，对外发动战争的“铁血政策”。普奥战争后，1867年，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实现了北德意志各邦的统一。但南德几个邦，由于路易·波拿巴的阻挠，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中。全德意志的统一仍然没有完成。普鲁士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正想同法国打一仗，以便削弱法国，进而夺取矿产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为武力统一德国扫清道路，并进一步称霸欧洲。

这样，普、法两个王朝之间的战争终于在1870年7月19日爆发了。

战争爆发以后，欧洲无产阶级，特别是法德两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这场战争呢？马克思于7月23日发表了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普法两国统治阶级共同挑起的王朝战争；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9页。]，法国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波拿巴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德国方面，暂时还是防御性的，但普鲁士王朝也有掠夺法国领土的野心，因此德国无产阶级必须把战争严格地限于民族防御范围，警惕俾斯麦的侵略阴谋。战争的发展，正如宣言所预见的那样，法国军队屡战屡败，普鲁士军队深入法国本土。9月2日色当一战，波拿巴惨败投降，作了俾斯麦的俘虏。

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群众愤怒如潮。9月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广大工人、群众、士兵纷纷涌上街头，要求废除君主制，实行抗战。革命人民包围了皇宫，冲进了立法团会议厅，占领了市政厅，宣布废除帝制，成立共和国，组织临时政府。第二帝国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了。但是，由于工人们一时还没有看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本质，政权被资产阶级所窃取。路易·波拿巴手下的反动军官特罗胥当了临时政府的首脑，其他政府成员也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骗取

人民群众的信任，他们把临时政府称作“国防政府”。然而，这个国防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政府。它散布亡国论调；四处活动，请求各国政府出面调解，派人同普军秘密勾结，谈判议和；纠合反动武装对付工人，等等。

普法战争在继续着，普军继续向法国本土长驱直入，向巴黎进逼，充分暴露了普鲁士王朝侵吞法国领土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于9月9日发表了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宣言指出战争双方的性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在德国方面，已经完全成为掠夺和奴役法国人民的侵略战争，德国工人阶级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起来反对俾斯麦进行的掠夺战争，使法国获得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马克思还向法国工人指出，你们的处境是极端困难和复杂的，一方面要抗击进犯国土的民族敌人，同时不要忘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另一面对反动的“国防政府”既不能立即推翻它，又要和它的反动政策作坚决的斗争，要利用共和国的自由，积蓄力量，为法国的复兴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马克思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不仅透彻地揭示了战争的起因和性质，科学地预见到战争的进程和后果，而且教育无产阶级要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坚持国际主义，支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把当前的斗争和长远的革命目标结合起来。马克思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不但指导了当时德、法两国工人的斗争，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重要文献。

3月18日起义和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

由于“国防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普军迅速进逼到巴黎城下，情况十分危急。战争教育了人民：**“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468页。]不愿当奴隶的巴黎无产阶级，决心拿起枪杆子武装自己，在很短时间内就迅速成立了一百九十四营的国民自卫军，约有三十万人，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军事领导机构——国民自

卫军中央委员会。他们不仅捍卫自身解放的权利，而且真正保卫着巴黎，保卫着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国防政府”的投敌卖国行为激怒了巴黎人民，1870年10月和1871年1月连续爆发了两次武装起义，虽然遭到镇压，但广大工人并没有放下武器，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还加强了这支武装力量。“国防政府”对此胆战心惊。在他们看来，如果向普鲁士投降，虽然也会使他们受到一些损失，但是他们的统治会保全下来，还可以照样骑在人民头上，而如果让武装工人战胜普鲁士侵略者，他们的反动统治就将彻底完蛋。因此，**“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54页。]1871年1月28日，国防政府和普鲁士签订了投降协定。2月，地主、反动资产阶级、保皇分子拼凑了一个“国民议会”，组成了以卖国贼梯也尔为头子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正式政府”。梯也尔是一个臭名远扬的反革命阴谋家、两面派，是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这个法兰西民族的败类，一生做尽了坏事。马克思深刻地揭露说：**“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兰西难史。”** [同上书，第357页。]梯也尔上台以后，为了尽快地扼杀革命，不惜任何代价缔结了卖国和约，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赔款五十亿法郎，接着，就全力向巴黎无产阶级进攻。

1871年3月18日凌晨，梯也尔命令他的反动军队偷偷地潜入蒙马特尔高地，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解除巴黎工人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摆在巴黎无产阶级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按照梯也尔卖国政府的命令，解除武装，让法国民众覆灭；或者是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把法国从覆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尽管面临着梯也尔反革命军队和普鲁士大炮的威胁，巴黎工人阶级没有片刻的犹豫，英勇无畏地选择了武装起义的道路。上午十时许，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武装的巴黎工人击溃了反革命政府军，开进了蒙马特尔高地。下午，人民武装继续以排山倒海之势占领了巴黎的许多据点，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梯也尔，眼看自己快要完蛋，连家属也来不及通知，如同丧家之人，匆匆忙忙溜出巴黎，狼狈地逃往凡尔赛去了。巴黎的官僚、警察、残兵败将也都尾随着他们的主子逃出了巴黎。傍晚，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市政厅。巴黎无

产阶级利人民群众用枪杆子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升起了第一面革命红旗。**“3月18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66页。]

巴黎无产阶级在用枪杆子推翻反动统治的同时，立即创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新型政权——巴黎公社。这是伟大的历史创举。3月26日，巴黎人民进行公社选举。劳动人民穿上节日的盛装，高举红旗，涌向自己的选区参加投票。当选的公社委员共八十六名。其中，有二十一名资产阶级代表，但几天后他们就退出了。因此，后来公社委员中，就只有工人的代表和工人所拥护的代表了。公社委员中，属第一国际的成员有三十人。在全部委员中布朗基派人数最多，称“多数派”，其次是蒲鲁东派，称“少数派”。被囚禁在监狱中的布朗基也缺席当选。

3月28日，在市政厅广场上隆重举行公社成立大会。整个巴黎都沸腾起来了。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军高举红旗，唱着雄壮的革命歌曲，昂首阔步进入广场。在宣布公社委员名单，宣告公社成立的时候，礼炮齐鸣，掌声雷动，“公社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胜利诞生了！它宣告了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同上书，第378页。]。

公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装。接着，公社取消了旧的警察厅和法院，建立了革命的专政机关。

公社打破了奴役人民的资产阶级官僚机构。公社委员会把立法和行政结合在一起，对国家进行管理。公社废除了虚伪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成立了十个工作委员会。公社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民主讨论，作出决议，贯彻执行。公社委员分别参加各委员会，同时负责本选区的工作，接受选民的监督。可见，公社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机构的雏形。

为了防上国家机关工资人员追名逐利，由社会公仆变成官老爷，公社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第一，公社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向选民负责，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第二，取消高薪制，规定任何公职人员的年薪不得超过六千法郎，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同时适当提高低工资。

公社宣布国家同教会分离，废除宗教预算，没收教会所占有的财产，大力摧毁维护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

公社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措施。它把资本家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合作团体掌管，废除面包房工人夜工制，禁止厂主向工人罚款和克扣工人工资。它下令把劳苦人民抵押在当铺里的物品归还原主，颁发了关于延期交付和免除一部分房租的法令，等等。

公社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吸收他们中间的优秀儿女参加领导工作。公社专门颁布法令，拆毁竖立在巴黎中心的、象征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旺多姆圆柱”。

巴黎人民在极为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运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对旧社会进行大力改造，并在短时间内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巴黎呈现出一片欢乐和充满信心的新气象，巴黎人民过着朝气蓬勃的革命生活。第二帝国时的那个荒淫无耻的巴黎很快消失了。而凡尔赛，在梯也尔的反动统治下，官僚、政客、地主、资本家麇集在一起，宪兵、警察、间谍、暗探布满街头，骗子、流氓、妓女、小偷到处都有。两种阶级的专政，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写照。**“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85页。]

捍卫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

剥削阶级绝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反动派，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活动。但是，老奸巨猾的梯也尔，当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大耍政治骗术，麻痹革命人民，掩盖其反攻倒算的阴谋。他假惺惺地宣称：“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当梯也尔初步得到俾斯麦、沙皇亚历山大帮助的允诺时，他的腔调就有些变了。他威胁说，同公社“缔结和约”是可以的，但公社必须放下武器。当梯也尔接受全部投降条件，俾斯麦答应释放十万俘虏兵来充实他的反动军队，并得到普军的直接援助的保证的时候，梯也尔就杀气腾腾地狂叫，我要“手执法律进入巴黎”，也就是要血腥屠杀巴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了。

5月21日，凡尔赛匪徒得到奸细的内应闯进了巴黎。震撼世界的“五月流血周”的激烈战斗开始了。英勇的巴黎人民面对着凶残的敌人没有丝毫怯懦和动摇。公社军事领导成员、波兰革命家东布罗夫斯基得知消息，立即率兵迎战，亲临前线，指挥杀敌，为公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临终前他嘱咐战友们：“我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你们只是想办法挽救共和国吧”。巴黎人民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奋不顾身，为保卫巴黎革命政权而战斗。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子，每一层楼都成了公社战士防守和杀敌的堡垒。他们在浴血奋战中，表现了无产阶级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豪迈精神。如公社炮艇“长剑号”被敌人打坏了，船员们临危不惧，拒不投降，在“公社万岁！”的口号声中，与炮艇一起沉没。国民自卫军老战士奥古斯·茹隆带领他的三个儿子参战以后，还写信给军事代表要求让他十六岁的最后一个儿子也来参军。十四岁的恩斯特和十七岁的菲里克斯杜南哥儿俩在距离敌人只有一百米的情况下，经受了敌人一个多小时的炮火射击，后来他们和连队一起进行白刃冲锋，占领了街垒。弟弟把营旗插上街垒时壮烈牺牲；哥哥冲上去继续保护营旗又英勇牺牲了。他们的父亲没有流泪，而是更顽强地拿起枪杆子奋勇杀敌，为儿子们报仇！为巴黎人民报仇！第一国际委员、公社著名领导人瓦尔兰在巷战中被俘，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5月27日，一批公社战士退到贝尔-拉雪兹墓地，同超过自己数十倍的敌人作决死的战斗。子弹打尽，就用刺刀和敌人进行搏斗，没有一个人投降，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墓地的一堵墙边。为了纪念不朽的革命烈士，巴黎无产阶级称这堵墙为“公社社员墙”。它永远屹立在巴黎城东，成为无产阶级坚贞不屈的光辉象征。

5月28日，公社在阶级敌人的武力镇压下失败了。巴黎重新陷入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黑暗天地。资产阶级在反革命复辟时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反动派用多管连珠炮成百成干地杀人，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巴黎，约有十万人惨遭枪杀、活埋和流放，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时的情景！但是，反动派的暴戾和残忍并不能使巴黎公社的英雄们屈服。他们正气凛然，宁死不屈。公社委员费烈在法庭上庄严宣布，“我是巴黎公社的委员，现在处在我的战胜者的手掌中。他们要我的头，让他们拿去吧。我永远也不想用卑鄙的行为来拯救自己的生命。”公社女战士路易丝·米歇尔义正词严地斥责反动派说，“有人指责我是公社成员，是的，当然是对的。要知道公社首先要实行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对我是最宝贵的目的，我以此自豪”，“如果你们留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叫喊报仇”。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9页。]在流血周的第二天，巴黎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以满腔的愤怒和沸腾的热血，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巴黎城郊写下了气吞山河的伟大诗篇——《国际歌》，为巴黎公社的英雄们塑造了永垂不朽的纪念碑。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指导和支持

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怀法国工人运动，密切注视着巴黎公社革命的进展。当时马克思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伟大的革命斗争。马克思这种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革

命首创精神，给我们树立了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光辉典范。1870 年秋天，马克思曾经劝告巴黎工人在条件没有成熟的时候，不要过早举行起义。但到了 1871 年 3 月，巴黎无产阶级以冲天的革命气概，拿起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时候，他立即以参加者的姿态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巴黎公社。马克思满怀喜悦的心情赞扬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392 页。]

巴黎公社的诞生，刺痛了国际资产阶级。他们结成反革命的“神圣同盟”，开动了各种宣传机器，编造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谣言，对公社进行恶毒攻击。德国的、美国的、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攻击巴黎公社是“恐怖统治”。沙皇亚历山大口念和平经，往来奔走当掮客，促使梯也尔和俾斯麦作成肮脏的政治交易，以便镇压巴黎公社革命。面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为了支持公社的革命斗争，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马克思、恩格斯一起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联合了一切同情公社的人，大声援公社。他们通过国际总委员会向所属各个支部发出了几百封信，阐述这场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历史意义，号召各国工人支援公社。他们为报刊撰文，介绍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相，驳斥资产阶级对公社的诽谤，揭穿资产阶级的种种谎言。

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密切注视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给予具体的指导与帮助。他派人到巴黎与公社建立联系，传达口头指示，取得直接消息。在斗争策略、军事技术、社会经济措施等方面，马克思都曾给予公社以宝贵的指示。他告诉公社要乘胜追击，一举歼灭在凡尔赛的梯也尔匪帮；建议公社必须在巴黎以外，甚至在其他国家赶快开展工作，以便解除巴黎孤立进行斗争的状况，还告诉公社把革命的影响扩展到农村中去，联合农民并肩作战，特别提出要没收法兰西银行，断绝反动派的经济来源。马克思还把他所得到的关于凡尔赛与普鲁士秘密勾结的重要情报告诉公社的领导人，要公社加强

蒙马特尔高地北面的防务，劝告巴黎不要轻信普鲁士统治者所谓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保持“中立”的谎言，等等。可惜，公社领导没有能执行这些正确的指示。

公社领导主要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的信条是反对任何专政，主张用“仁慈”去“感化”敌人。布朗基主义者则企图以少数人的密谋恐怖活动来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者排斥蒲鲁东主义者，而蒲鲁东主义者则公开发表“宣言”，暴露公社内部分歧。马克思针对公社领导者的弱点和错误，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尽管公社领导犯了许多错误，马克思还是耐心帮助他们，期望公社领导能摆脱机会主义的影响，沿着正确路线前进。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形形色色的敌人跳出来对公社进行恶毒的诬蔑，各国的反动政府对公社成员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时，马克思和第一国际力挽狂澜，决然反击这股逆流，捍卫巴黎公社的光荣业绩。他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就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宣读了《法兰西内战》这部伟大著作，热情地颂扬了巴黎无产阶级的丰功伟绩，全面地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无情地揭露了反动派的阴险残暴，教育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还极力设法帮助公社社员避开警察的追捕，对流亡到欧洲各国的公社战士进行了多方面的帮助。

马克思为捍卫巴黎公社革命原则所作的种种斗争，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统治时代最受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欧洲各国反动政府驱逐他，资产阶级报刊咒骂他、诽谤他。对于这一切，马克思毫不畏惧，依然热情地支持、鼓励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七十二天，但它却给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实践。为了总结公社的经验教训，驳斥各国资产阶级以及某些“社会主义者”对巴黎公社的污蔑和诽谤，为了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马克思在 1871

年4月18日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势”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

马克思接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迅速写出《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随即又着手定稿工作。5月30日,即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就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光辉著作。

马克思在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2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摧毁”和“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得出来的最根本的经验,最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巴黎公社原则。

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必须紧握枪杆子。进行暴力革命,才能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近代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人们:资产阶级攫取政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武装。法国工人曾经多次拿起武器,又多次胜利后放下了武器或被解除武装,结果,胜利果实总是被资产阶级所篡夺。巴黎的工人从血的教训中逐渐意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紧紧掌握革命武装。尽管蒲鲁东主义者提出什么“希望仁爱 and 慈悲”,反对“诉诸暴力和霸道”等等谬论,巴黎工人根本不理这一套,在“武装起来”的口号下,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他们顶住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威胁利诱,拒绝交出武器,狠狠地回击了梯也尔反革命的武装进攻。巴黎公社所以能够产生,所以能够存在七十二天,就是凭借自己手里的革命武装。马克思总结了这一经验,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子手里”**。[《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24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必须用革命武装来保卫胜利果实,并把革命进行到底。马克思指出公社**“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同上书,第369页。]。这也是巴黎工人群众和国民自卫军广大战士的强烈要求。但公社领导者却没有立即组织向凡尔赛的进军,使

敌人获得喘息时机，重新组织反革命力量进行反扑，最后将公社扼杀在血泊之中。这是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行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权，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颁布了一些改革经济的政策，如接管邮电局，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等。但是由于公社领导的错误，专政的职权行使得不彻底，不得力。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没有坚决果断地镇压反革命。公社委员中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用专政手段，说什么“专政”是一个不愉快的字眼，企图用精神感化敌人。结果，隐藏在巴黎的反动分子同凡尔赛匪帮里应外合，对巴黎工人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392—393 页。]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蒲鲁东主义者不但不去没收银行，而且凡尔赛要钱他照给，这样，大批巨款就成了凡尔赛匪帮进攻巴黎的经费，这也是公社失败的一个原因。

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必须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这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十分重要的。公社采取的两项重要的革命措施，不仅体现了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特点，而且可以防止使国家机关的职位成为投机钻营、谋取私利的对象，防止国家机关干部由社会公仆变成官老爷，始终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有着重大而深刻的意义。对于公社采取的这两项重要措施，伟大革命导师都给予高度的评价。恩格斯指出，公社采取的这两个正确的办法，“**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 1891 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335 页。]。列宁也指出，这些措施表明“**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207、208 页。]。

巴黎公社的经验还证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必须与广大城乡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结成联盟。巴黎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并维持政权达两个多月之久，主要是握有武装，但与公社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正确措施，争取和团结了巴黎的小资产阶级的做法也是分不开的。反之，公社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能够取得全国广大农民的支持。巴黎公社曾经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正确政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农民一旦了解这些政策，就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19页。]。但由于敌人对巴黎实行严密封锁，并对公社进行造谣污蔑，使农民未能认识公社胜利对自己的好处。同时，公社领导者开始对联合农民的意义认识不足，后来又遭到敌人的包围和武装进攻，未能有效地向农民宣传和实现自己的纲领，因而各省农民未能及时行动起来。无产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终于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明确提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165页。]巴黎公社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它缺少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一条正确路线的、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当时在公社中居领导地位的主要是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公社委员中几乎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各持一套错误的理论，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一致，不可能形成坚强的领导，不可能制定出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必然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犯错误，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至于公社的许多正确的革命措施，那是汹涌澎湃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创造，是冲破了蒲鲁东和布朗基信徒的错误理论束缚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法

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 1891 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333 页。]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机会主义者有时也扮演过显要的角色,但他们终究是革命的绊脚石。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中就有这样的人。**“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期。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期。”** [同上书,第 384 页。]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在战胜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才能产生和发展正确的路线,引导革命群众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英勇的巴黎公社儿女们,在短短的七十二天中,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永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马克思曾经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 677 页。]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今天,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写的《国际歌》已经响彻全球:“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五、马克思、恩格斯在欧美各国建党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经济仍在较快地发展,并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产阶级走向全面反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指出:**“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

往直前地进展着。”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438-439 页。]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建立自己独立的革命政党，集聚革命力量，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迎接未来的革命高潮。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欧美各国无产阶级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团体。继 1869 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成立以后，荷兰(1870)、丹麦(1871)、美国(1877)、捷克(1878)、法国(1879)、意大利(1882)、比利时(1885)、挪威(1887)、奥地利(1888)、瑞士和瑞典(1889)巴都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此外，1883 年俄国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1884 年英国成立了社会民主联盟。

这些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在宣传社会主义和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上，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它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还不成熟，不同程度地受着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心各国工人政党的建立和发展，热情帮助它们成长，并对这些党所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严肃的批判，希望它们能够沿着正确路线前进，成为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德国统一工人政党建立过程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普法战争后，德国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统一。由于向法国勒索了五十亿法郎的赔款，又夺得了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加上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德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迅速壮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加强，工人运动日益广泛地开展起来。

德国的工人运动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法国，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无产阶级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英国，由于工人贵族的出现和工联主义的干扰，使工人运动处于落后状态；而德国的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当时，恩格斯就指出：“**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

的前列” [《<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01 页。]。

但是，七十年代前后，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派别：革命的爱森纳赫派和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

拉萨尔派就是 1863 年 5 月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它的第一任主席是拉萨尔。1864 年拉萨尔死后，这个组织仍然控制在他的门徒手中，继续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

爱森纳赫派，就是 1869 年 8 月德国的爱森纳赫城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一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左派革命队伍。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党。这个党拥有工人阶级自己的著名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学徒工出身，1885 年加入第一国际并接受马克思的学说。倍倍尔是一个出色的工人活动家、组织家和演说家，他热情地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反动统治阶级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因此，曾多次受到反动当局的放逐和监禁。他始终承认自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不断抨击党内机会主义的倾向，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不是很精通的，因而在一些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批评他，帮助他，使他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参加过 1848 年德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在伦敦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第一国际革命思想最热心的宣传者之一，也是第一国际德国支部的组织者。在对敌斗争中，李卜克内西总的说来是坚决的，因而曾屡遭反动政府的迫害。李卜克内西在为德国工人阶级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犯过不少严重的错误。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李卜克内西常常表现动摇、调和以至丧失原则，因而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多次严肃的批评。在大部分情况下，李卜克内西能改正错误，转而采取革命立场。

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实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爱森纳赫派一开始就参加第一国际，执行第一国际的指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普鲁士王

朝对法国的侵略，支持巴黎公社，声援法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拉萨尔派则反对参加第一国际，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卖力地支持俾斯麦政府的侵法战争，并且同野蛮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相勾结，破坏法国工人斗争。两条路线，两种结果。爱森纳赫派在工人中的威望迅速提高，人数由少到多，组织从小到大，而拉萨尔派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所抛弃，组织濒于瓦解。1869年，拉萨尔派控制的工会会员尚有三万五千人，到1871年只剩下四千二百多人。为了适应斗争的形势的需要和统一工人运动的步伐，爱森纳赫派曾多次建议与拉萨尔派合并，以共同对敌。但每次都遭到拉萨尔派的无理拒绝。可是到了1873年以后，由于拉萨尔派威信扫地，处境困难，实在混不下去了，他们就一反常态，主动提出合并，“团结”的高调唱得比谁都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眼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他们自己找上门来，谋求和解，这就说明他们已经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决不能让他们利用我们党在工人中的威信来重新巩固他们摇摇欲坠的阵地。恩格斯指出：“**不要让‘团结’的呼喊把自己弄糊涂了。**”[《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0页。]

在合并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首先，他们并不反对合并，因为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进而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是必要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合并是要有条件的。“**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7页。]。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告诫德国党的领导人，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合并条件还不成熟，可以先同拉萨尔派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决不要仓促合并。但是由于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首先是李卜克内西，一心迷恋两派的合并，贪图一时的成功，因此不仅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告，而且背着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头目起草了一个浸透拉萨尔机会主义的纲领草案，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草案》，于1875年3月7日分别在两派机关报上同时发表。马克思、恩格斯一看到这份草案，就非常愤慨。他们认为，一个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同上书，第31页。]，是“**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页。]。而这个草案却是一个“极

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同上书，第 3 页。]。它完全违背了《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明的基本观点，违背了巴黎无产阶级在 1871 年的革命实践中所创造的重要原则，所以，恩格斯严厉指出这个纲领草案的出现是“**断然的退步**”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2 页。]。为了迎头痛击拉萨尔主义在党内的同潮，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为了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划清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恩格斯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严肃表示，如果这个草案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31 页。]1875 年 4、5 月间，马克思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对纲领草案逐条进行了剖析，揭露和批判了拉萨尔主义反对革命，主张倒退，维护普鲁士反动王朝的极右实质，并在批判中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光辉记录，是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马克思、恩格斯把它寄给德国党的领导人，希望他们能认识利改正错误，坚持革命原则。但李卜克内西等人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批评。1875 年 5 月，两派在哥达城举行了合并大会。在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拉萨尔派占优势，对纲领草案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改动，就作为两派合并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即《哥达纲领》)被通过了。大会选出的五人中央委员会中，拉萨尔分子就占三个，党的领导权实际上被他们篡夺去了。哥达大会以后，尽管纲领谬误百出，但当时社会上各阶级都没有看出来。工人群众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理解纲领，并对纲领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那些资产阶级蠢驴们，也把它看成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纲领，郑重加以对待。正如恩格斯在给白拉克的信中写到的，这个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对纲领保持“沉默”。恩格斯指出：“**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章这个纲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415 页。]直到 1891 年，由于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需要，经过恩格斯的坚持斗争，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才公开发表。

《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纲领草案进行了批判。

一、批判了拉萨尔派“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改良主义路线，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纲领草案为了给机会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一开头就鼓吹什么“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马克思驳斥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页。]劳动要创造财富和文化，必须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自然物质条件相结合，并且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这就揭穿了拉萨尔主义空谈“劳动”的虚伪说教，离开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个根本问题来谈劳动，目的是为了掩盖阶级剥削，取消阶级斗争，维护私有制，反对无产阶级起来革命。

纲领草案极力鼓吹拉萨尔捏造的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拉萨尔认为，工人工资的平均数，只能限制在维持工人及其家属生活的一个最低水平上来回摆动。如果工资高于这个平均数，工人生活得到改善，人口繁殖率提高，工人人数增加，工资就会下降；反之，工资低于这个平均数，人口繁殖率降低，工人人数减少，工资就会上涨。马克思指出，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论据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根据这个谬论，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却是“铁的工资规律”。显然，这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谰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科学的工资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接受拉萨尔的反动观点，这是令人气愤的倒退！

马克思还痛斥了纲领草案鼓吹“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才能剥夺剥夺者，实现社会主义。宣扬“依靠国家帮助”的谬论，其实质在于使工人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二、批判了拉萨尔争取实现“自由国家”的谬论，坚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拉萨尔从唯心史观出发，无视国家的阶级本质，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说什么国家的根本职能是“使人类发展并获得自由”。纲领草案贩卖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国家观，把建立所谓“自由国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完全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马克思极其愤怒地批判了所谓“自由国家”的谬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本身是一种暴力，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就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21-22 页。]，是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样的国家，以及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都不可能像纲领草案胡说的那样，可以和平地变为“自由国家”。即使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也不可能是什么超阶级的“自由国家”。马克思指出：**“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19 页。]恩格斯在批判纲领草案时指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30 页。]。可见，“自由国家”谬论的要害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纲领草案既没有谈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说明未来的国家会怎样发生变化，而一味的胡吹“自由国家”的口号。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主义国家观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

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21 页。]马克思的这一光辉论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三、批判了拉萨尔主义分配方面的反动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第一次提出和论述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著名论断。

纲领草案宣扬拉萨尔“分配决定论”的滥调，竟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口号写在党纲上，提出什么“按照平等的权利”，“公平分配全部劳动产品”的谬论。关于分配问题，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同上书，第 13 页。] 纲领草案避而不谈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而抽象地谈分配，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并侈谈什么“公平分配”、“平等权利”来欺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他们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反动分配观点的同时，科学地分析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及其分配原则。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10 页。]。这时的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是这种痕迹的表现。分配是按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进行的，可以说是“公平的”，但这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 [同上书，第 11 页。]。它虽然取消了剥削，但却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劳动能力是某种天然特权，即承认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还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

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同上书，第12页。]

马克思深刻地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科学地概括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特征，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此外，马克思还批判了纲领草案中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都看成是“反动的一帮”、狭隘民族主义等机会主义观点。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内容十分丰富，是继《共产党宣言》以后又一部纲领性文献，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是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

德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成立后，推动了当时革命运动的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在合并问题上对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让步，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入了党内，使党在思想上，理论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理论水平降低了。当时在德国党的领导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7页。]。因此，党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严重地泛滥起来。特别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杜林主义在党内扩散开来，严重地阻碍着党的健康发展。

欧根·杜林(1833-1921)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原是律师，后来从事教育。1863年起任柏林大学哲学和经济学讲师。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就放肆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到了七十年代，杜林更加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东拼西凑，先后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

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3 年)和《哲学教程》(1875 年)等著作。杜林狂妄地鼓吹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所谓全面的变革。杜林把自己装扮成“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自吹发现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由于杜林的大吹大擂，以及两派合并后党内本来出现的理论混乱状况，致使杜林的那套反动理论蒙蔽了不少人，甚至连倍倍尔这样的领导人，也一时看不清杜林理论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

特别要指出的是，杜林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危害，不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还表现在组织上。他利用自己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影响，在自己周围纠集了一个包括伯恩斯坦等人在内的小宗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还阴谋组织新党。

鉴于杜林主义的泛滥，摆在党面前的紧迫任务，就是揭穿杜林的反动本质，粉碎杜林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把党内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来。

1876 年 5 月，李卜克内西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反映了革命工人批判杜林的要求。恩格斯把李卜克内西的信转给了马克思，并且写信问他，现在是否正是彻底批判杜林的时候了？马克思立即回信同意对杜林进行彻底的批判。恩格斯为了让马克思集中精力写《资本论》第二、三卷，就毅然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立即着手进行对杜林的反动理论的批判。在马克思的密切合作下，恩格斯于 1876 年 5 月开始写批判杜林的论文，到 1878 年 7 月写成。在 1877 年 1 月至 1878 年 7 月陆续在德国党中央的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1878 年出版了单行本《反杜林论》。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发表，彻底粉碎了杜林的反动思潮，对杜林的折衷主义哲学、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在《哲学》编中，恩格斯着重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杜林偷运康德的形而上学，贩卖黑格尔的唯心论，拼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哲学大杂烩。杜林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之前，就存在着某种先验的“原则”，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都必须按照这些原则来决定。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74 页。]。恩格斯详尽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指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思想是物质的反映，具有相对独立性。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否认矛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阐明了唯物辩证法是关于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提出了“**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同上书，第 181 页。]的著名定义。

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深刻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经济学观点，指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反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详细论证了剩余价值的学说，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杜林却竭力掩盖资产阶级剥削的实质，宣扬唯心主义的“暴力论”，胡说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借助于暴力，而利润就是暴力的产物，所以没有必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只要消灭暴力，取消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恢复在分配上的平等原则，他那所谓理想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实现了。这种谬论，否认了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否认生产决定分配，进而否定剩余价值学说，其反动实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妄图永远保留资本主义。恩格斯指出：“**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202 页。]。只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才彻底揭穿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秘密。无产阶级要取得解放，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决不能像杜林所幻想的那样，只“消灭”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可以达到的。同时恩格斯还批判了

杜林关于暴力绝对坏的反动观点，对暴力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革命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同上书，第 223 页。]。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一种革命暴力。

在《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假社会主义，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和基本原理。杜林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则”基础上的“共同社会”。按照杜林设想的这个社会，普鲁士式的国家依然存在，竞争继续在发展。恩格斯指出，杜林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

杜林在胡诌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还全盘否定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这表明杜林既狂妄，又无知。空想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和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299 页。]。

恩格斯全面评价了十九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既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又批判了他们的根本错误。

恩格斯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经济表现是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造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其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恩格斯指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唯一出路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同上书，第 320 页。]。恩格斯进而指出，杜林妄图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形式，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方案，这是十足的幻想，是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发表，揭穿了杜林所谓“最新的”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撕下了杜林自吹的“改革家”的假面具，粉碎了杜林反党的阴谋；而且，通过批判，教育了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此后，烜赫一时的杜林本人，也销声匿迹了。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反对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共产党宣言》一样，《反杜林论》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2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揭露和批判

德国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指导下，战胜了杜林的反动思潮以后，思想和组织建设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1876年，党拥有二十三种报刊，1877年增加到四十一种，党在1877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近五十万张选票，比1874年增加了36%。

德国反动统治阶级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恐惧，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要扑灭德国工人运动和消灭工人政党。俾斯麦借两次谋刺事件，诬害德国工人政党。1878年10月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即反社会主义的非常法令）。“非常法令”规定：任何团体、报刊以及其他印刷品或集会，如系“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都一律禁止，政府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随意放逐，逮捕被他们认为危及治安的“危险”分子。仅在法律公布后的两个月内，就有五百二十一名社会民主党人被监禁，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被资本家解雇并列入黑名单。在实行“非常法令”的十二年期间，有一千三百多种党的出版物遭到查封，三百三十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九百多人被放逐，一千五百多人被关进监狱。全国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种形势，对工人政党及其每个成员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德国党的领导人由于平时热衷于搞合法斗争，对俾斯麦突如其来的袭击，思想上

和组织上没有准备，一时惊慌失措，不能及时辨明方向，确定新的斗争策略。党中央委员会在某些拉萨尔分子的煽动下，竟发表了自行解放党的声明。广大党员群众和党的基层组织失去了领导，断绝了联系，造成了混乱。那些混进党的不坚定分子，纷纷动摇叛变。流亡在瑞士苏黎世编辑党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等人，被敌人的高压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纠集在一起，结成了臭名昭著的苏黎世三人团，发表宣言，表示自己对反动政府的恭顺，乞求饶恕。他们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应当进行阶级斗争，而应当尽情地和解和博爱；叫嚷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民党”。他们还要党发明“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工人阶级只有服从“有教养的”资产者的领导才能解放等等。总之，他们主张把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党。与此同时，以莫斯特、哈赛尔曼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因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而引起偏急情绪，企图以个人恐怖手段代替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搞冒险行动。正当德国党处于动摇，混乱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挺身而出，坚决支持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和英勇斗争精神，同时热情地帮助党的领导人，分析形势，鼓舞斗志，坚定信心，制订正确的斗争策略。恩格斯指出，“非常法令”的颁布，并不表示敌人的强大，恰恰相反，正表明他们的虚弱，党应该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要像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435 页。]为了斗争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教导党的领导者应该把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党的秘密组织建立了，党的秘密刊物创办起来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利用一些俱乐部和协会等合法机关，开展对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把斗争锋芒集中对准苏黎世三人团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它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

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联名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对“三人团”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愤怒斥责这种鼓吹阶级调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尖锐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4页。]这些人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和假革命，应该清除出党。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坚持原则立场的态度，表现了伟大革命导师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他们不顾斗争形势的变化，拼命鼓吹采取个人恐怖手段，反对一切合法斗争，这只能把整个德国劳工运动拖进泥潭里去。但是，莫斯特等人坚持错误，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879年9月在报刊登了组织新党的声明，走上了公开叛党的道路。

1880年8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瑞士的维登召开党的秘密代表大会。大会删除了《哥达纲领》中“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主义观点，改为“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决定把公开叛党的“左”倾机会主义头目莫斯特等人开除出党。但大会放松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对伯恩斯坦等人进行公开指名的谴责和作出应有的结论，只是撤销了“苏黎世三人团”所担任的党报编辑职务。伯恩斯坦等人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作了点假检讨，隐蔽了下来。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克服了“非常法令”初期的动摇和混乱，贯彻执行了革命路线，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革命力量。恩格斯在回顾德国党在“非常法令”时期所进行的出色活动时指出，“**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89 页。]。德国党在这一时期所获得的成就，进一步加强了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前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法英等国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

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运动一度低落，梯也尔曾得意忘形地宣布，社会主义“长此休矣”。可是，经过短短的五年时间，法国社会主义者又重整旗鼓，积极展开活动。七十年代下半期，工人运动活动家保罗·拉法格以及茹尔·盖德等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 年，法国第一个工人政党——工人在马赛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党的建立予以巨大的支持和指导。1880 年，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参加了法国工人党党纲的起草工作，马克思并亲自为他们口授了理论性的总纲部分。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强调了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要性，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进行社会革命。

法国工人党一成立，党内就出现了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混进党的领导机构的以马隆、布鲁斯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派别，口头上宣称接受党纲，实际上拒绝党纲中规定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他们特别反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的范围内，提出一些在当时情况下可能争得的要求，因此被称为“可能派”。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他们要求每个地方组织有权修改党纲，使它适合当地的情况，这就等于取消党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支持并帮助党的领导人拉法格和当时还站在革命立场上的盖德等人，同可能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随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不断激化，1882年在圣太田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盖德派和可能派终于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在大会上，可能派用阴谋手段，在代表资格证上搞诡计，保证了自己的多数。他们竟然公开跳出来要求修改党纲总纲部分，用机会主义纲领代替马克思主义纲领，妄图使党纳入机会主义邪道。盖德派坚决反对，退出会场，在罗昂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并决定保留法国工人党的名称和党的革命纲领。

而马隆、布鲁斯则把党改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革命原则。

怎样看待法国工人党内部的这种分裂和斗争？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虽然也承认这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指责法国工人党在成立时不应同马隆、布鲁斯讲联合。针对这一倾向，恩格斯指出：**“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1页。]事实果然如此，法国党分裂后，恩格斯在1882年10月28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明确指出，法国工人党内部两派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的问题是原则性问题，即斗争是应当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只要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可能派是主张后一种做法，实际上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性，从而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恩格斯从法德两国党内斗争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4页。]在马克思、恩

格斯的帮助下，当时盖德派基本上采取了马克思主义路线，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开展斗争，它的力量也不断壮大，而可能派很快就彻底完蛋了。

随后，恩格斯又对英国费边社的改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费边社是 1884 年由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伦敦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团体。费边原是公元前三世纪古罗马的一个将军，他在战斗中主张迂回，避免决战。费边社采用这个名称，也是鼓吹避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企图通过细微的改良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标榜“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认为通过民主选出地方政府，逐步掌握自来水、电灯、电车等公用事业，就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费边社是在英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日益深入的情况下出现的。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指出，“**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498 页。]恩格斯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书信，揭露了费边社企图诱使无产阶级离开革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实质。经过批判和斗争，费边社的影响逐渐缩小了。

同时，恩格斯还对英国社会民主同盟和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关怀各国工人政党的成长，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前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的逝世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美广大地区蓬勃地发展起来了。正当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伟大领袖加强指导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卡尔·马

马克思由于长期的、艰苦的、过度劳累的工作和战斗，身患重病，于 1883 年 3 月 14 日下午在自己的工作椅上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五岁。

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各国社会主义者发出了讣电。3 月 17 日，在伦敦郊区的海格特公墓，为马克思举行了隆重而又简朴的葬礼。参加葬仪的有马克思生前的战友、学生和亲属。恩格斯在葬仪上发表了极其深刻的墓前演说，概述了马克思伟大的一生和他对国际无产阶级所作出的无法估量的贡献。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575 页。]从 1842 年起，马克思先后担任了《莱茵报》、《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新莱茵报》、《人民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等革命报刊的编辑、出版和撰稿工作。他参加和指导了 1848 年的欧洲革命；他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实现了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愿望；他以最大的热情关心和指导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他写出了许多总结革命经验的战斗著作。由于反动政府的迫害，马克思一家时常被驱逐，他的生活是贫困不安的。在革命的准备年代，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成长都离不开马克思的指导；就是对早期的中国、波斯、印度等亚洲的民族运动，马克思也给予亲切的关注。斗争成了马克思的一种癖好。他为革命专心工作，常常废寝忘食。阶级敌人的迫害，机会主义者的攻击，生活上的困难和病魔的折磨，都没有使马克思后退一步。他用坚忍不拔的精神，耗费了四十年时间写了《资本论》第一、二、三卷，向全世界宣告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831 页。]直到他逝世前，还在整理着他的《资本论》第三卷的稿子。马克思就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斗争是马克思得心应手的事情。为了使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不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迷失方向，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派、蒲鲁东派、拉萨尔派、工联主义派、巴枯宁派以及杜林派等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流派和思潮进行长期的不懈的斗争。在斗争中发扬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捍卫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纯洁性。

马克思的一生，是伟大革命家的一生。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在科学上的两大发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4页。]前面说的是唯物史观，后面说的是剩余价值学说。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才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使工人运动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又在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的历史地位是永垂不朽的！

在葬仪上，还由沙尔·龙格(法国社会主义者)宣读了俄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者发来的挽词和唁电。最后，由远道赶来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致词。他受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委托，表达党对自己的导师和缔造者的感情。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使社会民主主义从宗派，从流派成为政党，即变成正在胜利进行斗争并将取得胜利的政党”，“我们要全力来早日实现他的教导和他的志向，这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马克思和他的伟大学说将永远铭记在亿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心中，指引他们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胜利前进！

六、恩格斯为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斗争

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后，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全部落在恩格斯肩上。

随着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涨，各国工人政党的普遍建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广泛传播，为建立工人阶级的新的国际联合创造了条件。在恩格斯的直接关怀下，1889年建立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成立后，恩格斯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毅力和斗争精神，迎头痛击了各种机会主义的挑衅，始终不渝地为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斗争。

恩格斯为实现无产阶级新的国际联合而斗争

第一国际解散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仍然铭刻在各国工人的心坎中。八十年代初，曾有人向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建议恢复“国际”的活动，或组织新的“国际”。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时条件还没有成熟。他们始终以无产阶级的觉悟水平和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来考虑建立新的国际的问题。恩格斯认为，如果要成立新的国际，这个国际“**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3页。]。为此，恩格斯在理论上、组织上为成立新的国际进行积极的准备。

马克思逝世后，生前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都由恩格斯继承下来。恩格斯整理了《资本论》第二、三两卷，于1885、1894年相继出版。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恩格斯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1881年间所写的美国科学家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其中有马克思的批注和其他补充材料。恩格斯研究了这些摘要以后，认为摩尔根这本书对历史唯物论又一次提供了证明，感到有必要运用摩尔根的实际材料以及马克思的批语写一部专门著作，这就是1884年恩格斯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这部光辉著作中，恩格斯运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和深刻的理论分析，确凿地证明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对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作了最经典性的说明，进一步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一次有力打击。

为了提高年轻的工人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分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界线，分清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的界线，1886年，恩格斯又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区别，深刻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恩格斯的这些中越的科学理论著作，有力地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

由于恩格斯坚持不懈的战斗，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各国工人要求加强国际团结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八十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的盖德派都提出了在最近时期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建议。

正当革命派着手筹建新的国际的时候，法国的可能派纠合英国的工联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加紧策划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以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888年，他们在伦敦集会，决定委托可能派于次年7月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准备成立受他们控制的国际工人组织，以便推行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是发动群众起来揭露机会主义的反动嘴脸，粉碎他们妄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使国际工人运动沿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发展；还是放弃斗争，听任机会主义者把国际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邪路？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就在这关键时刻，德国党的一些领导人对可能派的阴谋认识不清，采取调和主义态度。他们公然停止了自己原定的筹建工作，去与可能派进行谈判，甚至还主张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同样，法国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种情况反映也很迟钝，行动非常迟缓。

事关路线，事关大局，在这决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命运的紧要关头，恩格斯毫不迟疑地放下其他工作，“**像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00页。]。他一方面领导各国社会主义者无情地揭穿可能派的阴谋及其机会主义本质，同时，又严肃批评了德国党的领导人的调和主义。恩格斯指出，可能派奔走不休，而我们的人却沉睡不醒，“简直想象不到德国人幼稚到何等地步”[《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223页。]。恩格斯还对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法格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劝说他们一定要为建立新的国际作出努力，教导他们不要放弃原则去和可能派联合，并亲自对要去参加可能派大会的代表做说服工作。

在恩格斯的帮助教育下，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法格等很快地改变了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德国年青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也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根据恩格斯的倡议，1889年2月，各国工人党在海牙召开了预备会议，决定在当年7月，即可能派召开大会的同一天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恩格斯的策略是：两个大会同时举行，“**以此向全世界表明，究竟哪里集中代表真正的运动，而哪里只是欺骗**”[同上书，第243页。]。恩格斯确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将获全胜。

1889年7月14日，在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革命派与改良主义可能派在巴黎同时召开了两个对立的代表大会。两个大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能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七拼八凑，总算是开了一个分裂的小会。这个会议，充满着凄凉和冷落的景象。在代表中除了法国可能派的代表外仅有九个国家的代表七十多名，几乎都是工联主义者，在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国际代表性的会议上，当然不可能建立什么新的国际组织。机会主义者想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革命派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开得十分热烈和隆重。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欧美二十二个国家的三百九十三名工人代表，其中很多是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卓越的领袖，具有广泛的国际代表性。会场悬挂着红色旗帜和马克思的画像，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政治上与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口号。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瓦扬、拉法格以及其他各国党的著名领袖都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威·李卜克内西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就在这个大会上，宣布了第二国际的成立。

但是，在革命的代表大会上，也充满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会议一开始，有些代表借口加强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要求大会不惜任何代价去和可能派的大会合并。这个提议受到许多代表坚决反对。威·李卜克内西在发言中正确地指出：“不惜任何代价的合并是错误的，只有另一个大会的代表通过的决议能为我们大会的所有成员所接受，两个大会才有合并的可能和希望。”大会通过了李卜克内西的提案。但是，可能派的大会拒绝了这个条件，反而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这些要求，理所当然地被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所拒绝。机会主义的阴谋没有得逞。

恩格斯因忙于《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工作，未能亲自出席大会，但他对大会整个进程非常关心。当他得知有人主张两个大会无条件合并时立即提出警告说，“**在合理条件下的联合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些人受这种热潮影响，却高喊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联合。**”[《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242页。]当调和主义者合并的计划失败后，恩格斯高兴地写道：“我

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同上书，第245页。]

第二国际巴黎大会通过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为了纪念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英勇斗争，把这个日子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在每年的这一天，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实现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斗争。从此，5月1日这一天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

巴黎代表大会以后，很快就显示了它对工人运动的推动作用，各国无产阶级热烈响应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号召。1890年5月1日，在法、德、意、比、荷、美、瑞典、挪威的许多城市，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七十岁高龄的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英国伦敦工人的“五一”节游行行列。恩格斯在叙述这次示威游行时，豪情满怀地写道：“**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4-245页。]

第二国际的组成成分是复杂的，既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各种改良主义分子，这就决定了第二国际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第二国际前期恩格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二国际的前期，即从成立到1896年，共召开过三次代表大会：1891年8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93年8月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896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初期，积极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巴黎公社失败后，当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大批小资产阶级破产，不断地补充到工人队伍中来，这批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助长了工人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这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有法国的工团主义，德国的“青年派”、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也有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

无政府主义者追求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平等。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主张不顾客观条件随时采用暴力手段来实现革命。他们反对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反对一切合法斗争。

无政府主义的这些主张，对当时处在积蓄革命力量的准备时期的革命运动是很不利的。在武装起义还不成熟时，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利用合法条件进行工作，如果放弃合法斗争，不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就会失去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正如列宁指出的，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219 页。]。

第二国际前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关于要不要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放弃一切形式的经济斗争，认为这些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关于要不要参加议会斗争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不加分析地认为参加议会斗争就是叛卖革命。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对待战争态度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战争。

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都是以反对无政府主义为中心议题的。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议案，提出了基本上正确的议案。到 1896 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第二国际革命派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和取得胜利的时候,却对右倾机会主义丧失了警惕。一些党的领袖也陶醉于合法斗争的成绩,迷恋于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会的多数,他们本身的右倾情绪也不断增长,致使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得以泛滥。

第二国际成立时,恩格斯已经六十九岁了,但是,他仍然以旺盛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不倦地战斗。在斗争中,恩格斯特别重视德国党,并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德国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当时德国党是历史最久、影响最大、也是威信最高的党。它执行什么路线,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极大影响。所以批判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也就是批判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而帮助德国党沿着正确的路线发展,就必然会推动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经受了“非常法令”时期的严峻考验,领导德国工人运动获得了重大的成就。1890年3月,俾斯麦被迫下台,10月,“非常法令”被废除。俾斯麦用高压手段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政策宣告破产。统治阶级为了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就变换手法,推行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政策,如同意星期日休息,禁止学龄儿童做工,规定最大限度劳动日为十一小时,以及允许产妇休假等,他们企图用这种怀柔政策来腐蚀和分化工人阶级队伍。

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和统治阶级策略上的改变,使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猖獗起来,一方面出现“左”倾机会主义的所谓“青年派”,另一方面出现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的同时,对于日益成为德国党内主要倾向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所谓“青年派”,主要是由一些自称是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的大学生和青年作家组成的。他们在“左”的口号下疯狂鼓吹半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观点。他们反对党进行必要的议会斗争,反对党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责备党犯了路线错误。他们粗暴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进

行脱离群众的冒险活动。他们还造谣说，他们的活动原则和恩格斯是一致的。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青年派”这种极端无耻的行为，指出他们的理论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去做，就会使党脱离群众而瓦解，**“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89 页。]。恩格斯还揭露了“青年派”想当领袖的奢望，指出他们只受过“学院式的教育”，没有忠心耿耿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品质，不想把自己列入普通战士的行列。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这批青年知识分子的狂妄行为，指出他们**“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同上书，第 270 页。]。经过恩格斯的批评和帮助，“青年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改正了错误，而那些头目却继续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采取了分裂党的活动，最后被清除出党。从此，“青年派”在德国党内的影响也逐渐消失了。

以福尔马尔为头子的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已成为党内更加危险的一种倾向。格·亨·福尔马尔(1850—1922)，出身于慕尼黑的一个官僚家庭。普法战争时投奔德国军队，1875 年起参加社会民主运动，曾在 1879 年至 1880 年担任党在苏黎世出版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1890 年“非常法令”废除后，福尔马尔为统治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拍手叫好。他美化统治阶级，把统治阶级的策略改变说成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是“按照全体人民利益办事”，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闲双手欢迎统治阶级的“善意”。他还极力鼓吹议会主义，公然反对暴力革命，胡说什么无产阶级“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这是一条背叛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它在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的支持下，不仅没有受到及时的回击和批判，还不断扩大了它的影响，甚至党的领袖威·李卜克内西也受到迷惑，错误地承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谴责暴力革命。这一切表明，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当时的主要危险。

恩格斯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右倾机会主义的全部危害性，因此，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同时，集中主要精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他在 1891 年 1 月到 6 月的半年时间内，以惊人的毅力，高举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采取了三项有力的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

恩格斯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坚持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光辉文献《哥达纲领批判》。

1890 年 10 月，在德国党的哈雷代表大会上，决定拟订一个新的党纲，提交次年在爱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以代替原有的《哥达纲领》。为了使广大党员和群众了解七十年代马克思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实质和意义，彻底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以便制订一个理论上政治上正确的党纲，恩格斯决定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但是，考茨基却百般阻挠《哥达纲领批判》的公开发表。经过恩格斯的坚持和斗争，考茨基才被迫于 1891 年 1 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被埋没了十五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的公开发表，引起了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恐慌，在德国党内也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考茨基之流竟在党的刊物上公然叫嚷，“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看法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德国党议会党团代表也在国会讲坛上声明：社会民主党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甚至连李卜克内西也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必须继续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

恩格斯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在 1891 年 3 月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的时候，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并写了一篇导言。

恩格斯针对党内反对武装夺取政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谬论，在《导言》中指出无产阶级掌握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阶级大搏斗中，统治阶级总是用反革命武装来镇压革命，维持他们的

反动统治。**“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 [《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 1891 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326 页。]因此，无产阶级只有掌握革命武装，用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才能取得胜利。列宁认为，恩格斯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235 页。]。

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这个新的国家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严厉谴责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心理，尖锐地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 1891 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336 页。]

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和再版《法兰西内战》之后，恩格斯不顾身体劳累，抱病投入新的战斗。1891 年 6 月底，采取了第三项措施，写了著名的《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在德国党的哈雷代表大会后，由威·李卜克内西执笔写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准备提交预定在 1891 年 10 月召开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讨论。1891 年 6 月中旬恩格斯收到了这份“草案”以后，认为新的纲领虽然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但是仍然带有不少机会主义的观点。为了打击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使党的纲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恩格斯写了《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一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李卜克内西在接到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后，只采纳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对“草案”略加修改，于 1891 年 7 月 4 日在《前进报》(德国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并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讨论。《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几个负责人，认为公布的“草案”问题很多，于是另拟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经过审查和修改，被一致通过。《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它

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原理，指出为了对社会进行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仍然存在着严重缺点，主要是它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重大问题。所以，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也是对《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由于第二国际各国党把《爱尔福特纲领》称为模范纲领，因而，恩格斯对这个纲领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批判，也就是对整个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倾向的批判。

恩格斯的三项措施，如同三颗炸弹一样，沉重地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第二国际在其前期活动中所以能够基本贯彻马克思主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未能占得上风，首先应当归功于恩格斯对机会主义进行的这些有力的斗争。

在农民问题上恩格斯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

恩格斯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在这个时期里，还激烈地反对了法、德两国党内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出发，历来十分重视农民问题。但是，第二国际各国党对农民问题认识不清，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直到九十年代初，欧美各国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农民大批破产。特别是农村人口比重较大的法、德等国，农民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破产农民对统治者的憎恨与日俱增，农民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第二国际各国党才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着手讨论党的土地纲领。

法、德两国党的领导人，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研究农民问题，而是为了自己在议会选举中增加选票，对农民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政策。法国工人党在 1892 年马赛大会和 1894 年的南特大会上，通过了盖德派的土地纲领，公然提出了保护农民的私有制，保护个体小生产，甚至保护富农剥削的倒退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农民问题上也有着同样的错误观点。1894 年，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

福尔马尔提出了旨在维护富农经济的土地大纲，向个体农民许愿，要采取措施来拯救农民，使他们免遭破产等等。福尔马尔的土地纲领引起了大会的争论。他为了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辩护，还引证了法国党的南特纲领，并无耻地造谣说南特纲领得到了恩格斯的直接赞同。针对这些情况，恩格斯认为必须公开批判南特纲领和福尔马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在寄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声明，福尔马尔所掌握的关于我的消息是完全不可靠的。并明确表示，他不仅没有赞成过南特纲领，而且还谴责过这个纲领。恩格斯认为，福尔马尔提出的农民政策是“**比小资产者的政策还右的农民政策**”[《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512 页。]。

为了揭露和批判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为了教育和帮助欧洲各国工人党，特别是法、德工人党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恩格斯于 1894 年发表了《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的反动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是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还是把争取农民作为增加选票的权宜之计，这是当时在农民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中心问题。恩格斯严厉批判了把农民问题纳入议会主义轨道的错误路线。他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95 页。]，特别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尤其如此。革命政党如果不去发动和组织农民，反动派就会去欺骗和利用农民。1848 年法国革命和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支持，就不能取得胜利。拿破仑第三所以能窃取政权，就是由于他骗取了农民对他的支持。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断给农民许愿，目的也是为了讨好农民，争取选票，为他的机会主义路线服务。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同上书，第 309 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引导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无产

阶级革命，同时，工人阶级也必须把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保证革命取得胜利。为此，恩格斯号召各国党：“**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同上书，第296页。]这样，农民这支“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革命的变动”[同上书，第36页。]。

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还是不分阶级的联合一切农民，这是当时在农民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法、德两党的机会主义者对农村各阶级不作阶级分析，提出了要求“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的错误主张。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地分析了法、德两国当时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为无产阶级政党规定了领导农民应当遵循的阶级路线和基本政策。

恩格斯指出，在德国农村居民中有农业工人、小农、中农、大农等阶层。农业工人是农村无产者，工人政党首先应当团结和依靠他们。

法、德两国的小农（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状况比较低下，而且是一年不如一年。所以，小农是未来的无产者。为了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政党必须把小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恩格斯还分析了德国南部的中农，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随时可以转到小农队伍中来，因而也可以团结他们。至于大农，即富农，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与他们建立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暂时联盟。对于大土地占有者，恩格斯明确指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社会民主党一经掌握国家政权，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

在农民问题上，机会主义者打着团结农村中一切生产成分的招牌，实际上是维护农村中的雇佣剥削制度。

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还是让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当时在农民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法、德两国工人在土地纲领中提出了极其错误的主张。

他们把小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避免自己灭亡而拼命想保持一小块土地的可怜愿望，当作农民的根本利益。他们迁就小农这种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甚至认为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也要保存私有制，保护小生产，甚至保护大农的剥削。这不仅是十分荒谬的，而且是一种倒退，完全违反了党的纲领，违反了社会主义原则，也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原则和私有制、小生产、剥削雇佣劳动是根本对立的。恩格斯指出，今天“**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03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生产必然压垮小生产，就像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所以，企图用保护小农私有制来拯救农民的论调，不仅在理论上是反动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对小农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

那末，出路何在呢？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不能帮助农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避免破产和灭亡，农民只有起来革命，跟着工人阶级一道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人阶级政权的帮助下，把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才能永远摆脱小生产者落后与贫穷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在1886年给倍倍尔的信中就指出过，在向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时候，必须采取合作社生产作为中心环节。

如何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呢？恩格斯认为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和采取示范、帮助的办法。指出，不是用强力剥夺小农，而是将他们私人的生产和私人的所有权变为共

耕社的生产和共耕社的所有权；不是用强迫手段，而是凭借提供范例和国家帮助的办法。这是引导农民走革命的康庄大道，而机会主义者却拉着农民走回头路，使农民走入惨境地的资本主义死胡同。

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沉重地打击了第二国际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指针。

恩格斯的逝世

1894 年以来，恩格斯就经常受到疾病的侵袭。1895 年春，病情恶化，经医生诊断是后期食道癌症。他经常为病痛所折磨，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像往常一样，专心致志，全心全意地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工作着战斗着。他不断地接待来访的同志和战友，不断地通过书信帮助和鼓励他们进行革命斗争。

病情愈来愈恶化，经医治无效，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恩格斯于 1895 年 8 月 5 日，在伦敦与世长辞了。恩格斯病逝的悲痛消息传出以后，引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沉痛的哀悼。

同志们按照遗嘱，举行了庄严朴素的葬仪，参加者有来自各国的无产阶级代表和朋友，其中有德国党的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有法国党的拉法格，有领导英国工人运动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以及比利时、俄国、意大利的一些代表。恩格斯的遗体，遵从遗嘱进行火化后将骨灰瓮抛入他生前喜爱的休息地伊斯特勃海岸附近的海中。

恩格斯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和马克思一起高举共产主义革命的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全世界宣布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他们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指出了一条摆脱资本剥削和统治的革命道路。恩格斯和马克思始终不渝地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们既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又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他和

马克思共同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亲自参加了 1848 年欧洲革命，战斗在武装起义的行列中。他和马克思共同缔造了第一国际，关怀各国工人政党的建立和成长，坚持原则，向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导师，卓越地进行了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欧美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了第二国际，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恩格斯的名字和马克思连在一起，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心目中是革命的象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象征。恩格斯的晚年，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遗著《资本论》第二、三两卷。恩格斯自己给无产阶级留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这些著作都是非常宝贵的理论财富，对传播、捍卫马克思主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在哲学史上开辟了新的领域。他又写了许多军事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对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给以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对殖民主义者以深刻的揭露。恩格斯在世时，热烈地关注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舞。1856 年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痛斥了英帝国主义的海盗行为和欺骗宣传，指出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正义性，恩格斯还无情地揭露老沙皇对中国人民的侵略。这是对中国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

恩格斯学识渊博。马克思曾赞扬他真是一部百科全书。他对国际工人运动也有难以估计的贡献。但他从不因自己的博学和极高的威望而骄傲，相反地，他总是非常朴素和谦逊。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都把他当作自己公认的领袖而尊敬他，关怀他，他总是解释说，主要应归功于马克思。他把自己称作为马克思的“配角”，还说：“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100 页。]。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列宁写道：“**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于 1883 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上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86 页。]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伟大学说和他们的战斗精神，永远铭刻在生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心中，永远激励我们不断革命，胜利前进。

七、列宁主义的诞生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 63 页。]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固有的一切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并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严重泛滥。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伟大的列宁挺身而出，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学说，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同自由资本主义既有直接联系，又有重大区别，它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

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总结了自《资本论》发表后几十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揭示了帝国主

义的产生及其灭亡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883 页]

垄断资本的统治是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垄断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生产集中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就不可避免地要展开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打败自己的对手，就必须不断地改进技术，增加投资，扩大生产，降低成本。这样，就引起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生产日益集中于少数大企业手中。生产高度集中的结果，又必然会引起垄断的发生，出现了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垄断组织的形式，形成了帝国主义的垄断统治。但垄断并不能消灭竞争，无论在垄断组织内部，还是在各垄断组织之间，都存在着剧烈的竞争。在帝国主义阶段，少数金融寡头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利用自己的经济势力，支配着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决定政府的人选，成为国家的最高主宰。金融寡头为了追求最高额的垄断利润，除对本国劳动人民加强剥削外，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压榨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各国垄断集团间为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斗争，直接表现为帝国主义强盗瓜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剧烈斗争。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垄断资本日益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发明创造的应用，造成停滞和腐朽的趋势。在帝国主义时期，虽然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生产在个别部门、个别国家或个别时期仍可能较快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常常是片面的畸形的，例如为战争服务的军火工业就发展得特别快。但总的趋势来说，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已经迟缓下来。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突出的表现在欧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批专靠“剪息票”

为生、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层，还出现专靠剥削海外国家和殖民地为生的食利国。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还表现在政治上走向全面反动。在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不论是共和派还是君主派，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因此，不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反对劳动人民，疯狂掠夺殖民地人民，镇压革命运动，推行强权政治。此外，帝国主义时期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日趋堕落。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都空前激化。

首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激化。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采取各种办法对无产阶级实行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由于军备竞赛，军费开支迅速增长，加重了无产阶级的负担，使他们的生活急剧恶化和贫困。各国工人起来反抗，开展罢工斗争，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由于资产阶级不仅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同时也剥削和压迫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这就使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获得可靠的同盟军。

其次，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大力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输出资本，豢养当地买办阶级，勾结当地封建地主阶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和野蛮的剥削，激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是本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共同敌人，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同盟军。

第三，帝国主义之间矛盾也日益激化。各帝国主义疯狂向外扩张，争夺资本输出场所、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分割完毕，又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就会导致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不但会削弱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而且，战争引起革命，给世界人民反帝斗争提供有利条件，促进无产阶级解放斗争。

帝国主义的垄断统治所引起的矛盾尖锐化和它的日趋腐朽，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所以，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737 页。]

毛主席也指出：“**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1372 页。]

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

二十世纪初，俄国也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当时俄国国内三十多个垄断组织，控制了全国的重要工业部门。银行资本也开始集中，八大银行就控制着全国银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俄国还向巴尔干各国、土耳其、伊朗和中国输出资本。但是，俄国除了具有一般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外，还有它自己的特点，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同封建农奴制残余相结合的统治，掌握政权的是同金融垄断寡头结成最紧密联盟的封建君主。所以，俄国帝国主义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在俄国显得特别尖锐。

第一，无产阶级同垄断资本、沙皇专制制度的矛盾十分尖锐。俄国无产阶级身受资本主义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工人劳动时间长达十五至十六小时，工资极低，工厂主对工人可以随意降低工资、罚款和解雇。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过着牛马般的非人生活。在这种悲惨困苦的生活境地中，工人要争取自由，要摆脱这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就必须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和沙皇专制制度。

第二，农民同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很激烈。俄国农民受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生活极端贫困。一方面，地主的剥削和沙皇的苛捐杂税，无情地榨取农民身上的血汗，另一方面，

由于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使农民产生急剧的两极分化。当时在俄国，占农产总数百分之十五的富农就占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而大多数贫苦农民，则在饥饿线上挣扎。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和工人一样，同样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为了推翻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贫苦农民纷纷起来进行革命，要求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推翻沙皇政府。

第三，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在俄国，占全国居民个数以上的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民，受着沙皇制度残酷的民族压迫。沙皇政府为了巩固和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用最毒辣的手段挑动各民族间的互相残杀，强迫推行反动的“俄罗斯化”政策，使少数民族受着反动民族政策的残酷迫害；不仅如此，少数民族中的劳动人民同时还受到本民族内部的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因此，他们的苦难更加深重，更加迫切要求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统治。

第四，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同沙俄帝国主义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沙皇俄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多次血腥镇压匈牙利和波兰人民的革命，并多次对土耳其、波斯和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十九世纪中期起，沙皇俄国就不断用武力胁迫清朝政府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中国新疆地区大片土地。到十九世纪末，沙皇俄国就侵吞了中国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1900年，沙皇俄国参加了镇压中国义和团的反帝运动。所以，列宁指出，沙俄帝国主义不仅是当时欧洲也是亚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沙俄帝国主义不仅是俄国人民的凶恶敌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凶恶敌人，推翻沙俄帝国主义的统治，必将推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第五，俄国人民同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不可调和。俄国农奴制残余的存在，严重地阻碍了俄国工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俄国在经济上的相对落后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西方帝国主义抓住俄国的这一弱点，通过贷款等方式控制俄国的重要经济部门；而沙皇政府每年要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几亿卢布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缴付利息。同时，沙皇俄国又是西方帝国主义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和

中国的罪恶勾当中的走狗和忠实同盟者。这些都充分表明，沙皇俄国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所以，对沙俄帝国主义的打击，也就是对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有力打击。

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它“**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 67 页。]。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使沙皇俄国成为当前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俄国不仅是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而且具有用革命方法解决这些矛盾的实际力量，俄国正在孕育着伟大的革命热潮，处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二十世纪初，俄国已拥有一支约三百万人的产业工人，其中约有半数的工人集中在大企业中，他们富有革命的彻底性。在 1900—1903 年经济危机的年代里，大批工人失业，生活处境急剧恶化，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罢工浪潮遍及全国各地。工人们提出了“民主”、“自由”和“打倒沙皇”的革命口号。1901 年彼得堡奥布哈夫兵工厂爆发的“五一”罢工，变成了工人反抗沙皇军队的流血冲突。这表明俄国工人运动已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已经奋起同沙皇政府搏斗了。

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运动也开展起来了。1902 年，仅在俄国欧洲部分发生的农民暴动就有三百四十次，他们焚烧地主房屋，分配地主的土地，杀死罪恶累累的官吏和地主。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农村中的反动势力。农民运动成为无产阶级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强大同盟军。

在工农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学生运动也不断高涨起来。学生运动配合工农革命运动，开展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在 1901 年末和 1902 年初，全国学生实行了总罢课，参加的学生人数达三万人以上。

革命运动的兴起，动摇和打击了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充分表明俄国正处在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说：“**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

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245 页。]俄国无产阶级要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解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俄国的革命形势也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正因为如此，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故乡。

列宁的早期革命活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1924), 1870年4月22日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现为乌里扬诺夫斯克)。列宁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伏尔加河流域度过的。列宁亲眼看到贫苦农民所受沙皇专制制度残酷奴役和剥削的悲惨情景，因此，列宁从小就形成对劳动人民无比同情和对沙皇专制制度深刻憎恶的思想感情。

列宁在十四、五岁时，就开始阅读一些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品，后来，阅读他哥哥亚历山大从彼得堡带回来的马克思著作。1887年是列宁生活中的转折点。此年3月，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恐怖组织去谋刺沙皇而被杀害。亚历山大之死，对列宁矢志走上革命道路，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这时列宁已认识到用这种暗杀手段去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是不行的，他决心走另一种道路去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斗争。1887年8月，列宁进入喀山大学读书。在大学里，他开始了革命的征程。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因而被开除出喀山大学，并被捕入狱，不久即被放逐。在监狱里，警察所长对列宁说：“你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要造反呢？横在你面前的，是一堵墙壁哩！”列宁坚定地回答：“是一堵腐朽的墙壁，只须推撞一下，就会倾覆的。”这就是十七岁的列宁，在与沙皇专制制度斗争中经受了第一次革命洗礼。

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俄国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1888 年，列宁被释放后回到了喀山，并很快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此期间，列宁精心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当时，民粹派的思想还束缚着怀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阻碍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列宁认为，要传播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与民粹主义决裂。

民粹派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流行于俄国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自称“社会主义者”，但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只是一种偶然现象，不可能发展起来。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革命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他们把农民看成最主要的革命力量，认为只要知识分子领导农民起来“骚动”，就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他们自认为是“人民的精粹”，打着“到民间去”的旗号，穿起农民的服装，去向农民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因此被称为“民粹派”。但是农民并没有跟他们走，沙皇警察又到处追捕他们，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不再到农村去了，而采取个人恐怖的斗争策略，去与沙皇政府作斗争。这种理论和斗争策略，当时在青年中有相当的影响。

民粹派的反动观点和有害策略，受到了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的批判。劳动解放社是普列汉诺夫于 1883 年在日内瓦建立的。它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民粹主义思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它没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本身又没有完全摆脱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不可能完成从思想上粉碎民粹派的任务。彻底粉碎民粹主义思想的任务就由列宁来担负了。

1889 年，列宁移居萨马拉城之后，领导建立了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此后，列宁开始批判民粹派的观点，还对居住在附近各县的农民的生活状况作了调查研究。1893 年，他写了《农民生活中的新的经济变动》一文，这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列宁著作。在这一著作中，列宁以充分的事实证明了农村经济的分化和阶级的对立，阐明了农村中资本主义正在不可遏制地发展着，驳斥了民粹派的错误观点。

1893年8月，列宁离开萨马拉城，来到了当时俄国政治活动和工人运动中心彼得堡。这时，列宁已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到彼得堡后，列宁很快就和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并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的活动与工人群众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由于列宁能够结合俄国的实际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快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和工人群众的敬佩和拥护。一位小组成员回忆他们如何充满喜悦的心情欢迎列宁时说：“这才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带路人，我们的理论家呢，跟着他准没错。”民粹派的一些“权威”作家，如米海洛夫斯基之流负隅顽抗，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仅在口头上批判民粹主义已不够了。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粉碎民粹主义。1894年春夏，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揭露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其实是人民的敌人的真面目。列宁指出，九十年代民粹派代表的并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代表富农的利益。民粹派硬说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农村破产，想“把每个农夫都拿到工厂锅炉里去受煎煮”。列宁驳斥道，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望”，而在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客观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必然要增长起来，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同时，列宁还批判了民粹派个人恐怖的斗争策略。列宁在这部著作中热烈号召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统一组织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9页。]。经过列宁及其拥护者的斗争，民粹主义思想在九十年代被彻底粉碎了。

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同路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一些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合法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也反对民粹主义，但他们反对民粹主义是要诱使工人运动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司徒卢威，公然号召人们“承认我们不文明，去向资产阶级请教”。列宁为了粉碎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道路

上的主要障碍民粹派，曾同“合法马克思主义”派别建立了反民粹派的暂时联盟。但列宁从未放弃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895年初，列宁所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判》一书，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对他们美化资产阶级，掩盖阶级矛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作了尖锐的批判。列宁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他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序幕。1895年秋，列宁亲自领导把彼得堡二十来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统一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此，开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新时期，为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奠定了基础。在“斗争协会”的领导下，彼得堡工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斗争，更加迅速开展起来了。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影响下，俄国各地，如莫斯科、基辅等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也相继统一起来，成立“斗争协会”。

列宁在彼得堡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沙皇政府的严密注意。1895年12月9日，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189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在流放期间，列宁加紧进行革命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密切注视着国内、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二国际各国党内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泛滥

正当历史的发展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也即无产阶级革命直接提上日程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逆流。修正主义者打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指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2页。]

第二国际各国党内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泛滥,不是偶然的,它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带有时代的特点。

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从剥削得来的大量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培植一个工人贵族阶层,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很懂得,“**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29页。]。这个工人贵族阶层,就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这种现象最早是在英国出现,以后在德国和欧美其他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中也出现了。同时,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批小生产者被迫破产,他们不断被抛入无产阶级的行列。这些小生产者不可避免地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带入工人运动,给修正主义的滋长造成了有利的土壤。另外,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总是交替使用武力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来对付无产阶级。十九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处在“和平”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在不放弃暴力镇压的情况下,采用一些微小的改良来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合法斗争和议会选举中也取得一定的胜利,于是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就盲目崇拜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他们片面夸大议会斗争的作用,成了“议会迷”。他们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资产阶级在政策上的转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狂起来。

恩格斯在世时,由于对第二国际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这股思潮暂时未能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依然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恩格斯逝世后,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开始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普遍滋长起来。当时,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伯恩斯坦。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头子,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他早年当过银行的练习生,1872年,带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入党后,他并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

并之时，就积极主张同拉萨尔派妥协；1875年以后，他又成为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狂热拥护者；1879年，他和赫希柏格、施拉姆组成“苏黎世三人团”，公开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纲领。从1881年起，他窃取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的职务。恩格斯逝世以后，他撕下伪装，肆无忌惮地向党猖狂进攻，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从1898年10月起，他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崩溃论和殖民政策》等。他胡说时代已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要求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他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只要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一系列的“运动”，用不着暴力革命，用不着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也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公式，这表明他已经完全成为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马前卒和辩护士了。

1890年1月，伯恩施坦的叛卖活动变本加厉，他在考茨基等人的支持和纵容下，出版了《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篡改和“修正”，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他攻击的主要矛盾集中指向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根本问题上。

在哲学方面，他叫嚷“回到康德去！”企图用康德主义来取代战斗的唯物主义。他攻击辩证法是“妨碍对事物的一切合乎逻辑的观察的圈套”；胡说马克思坚持辩证法而犯了错误，以致“把一件需要几个世代才能实现的事……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伯恩施坦恶毒攻击唯物辩证法，正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学说，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竭力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论。他胡说剩余价值论“纯粹是思维的构成物”，是“基于假设的公式”；他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胡说什么社

会主义的斗争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他无耻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否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掩盖帝国主义本质，为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提供经济上的论据。

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伯恩斯坦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竭力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辩护。他大肆颂扬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否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诬蔑暴力革命是“无谓的牺牲”；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恐怖的独裁统治”，不适用于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主张党应当放弃自己的革命纲领，变成“改良的党”。

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修正主义代表作的出笼，标志着德国党内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体系和思潮的最终形成。修正主义从来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在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影响下，修正主义很快就变成了一股国际思潮，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迅速泛滥起来。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入阁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兄弟，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1899年6月，法国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头目米勒兰，公然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一起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戴上了工商部长的乌纱帽。入阁后，他参与了对内镇压工人罢工，对外扩军备战的罪恶勾当，成为出卖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叛徒。米勒兰的这一叛卖行为，把伯恩斯坦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因此列宁称米勒兰事件是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泛滥和米勒兰事件的发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引起了各国党内革命左派的警惕和开展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列宁和各国左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首先是在德国党内展开的。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克拉拉·蔡特金是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著名的革命左派。在 1898 年 9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受到了初步的批判。1899 年 10 月，在德国党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左派再次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展开了斗争。倍倍尔尖锐地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卢森堡要求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可是考茨基在会上作了调和主义的发言，竭力袒护伯恩斯坦。最后，大会通过了表明党不放弃自己基本观点的决议，却没有指名批判伯恩斯坦，也没有指出修正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更没有对伯恩斯坦采取任何组织措施。

针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猖狂进攻，1899 年，卢森堡发表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比较深刻地批判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和政治观点，痛斥了伯恩斯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揭露了伯恩斯坦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叛卖性理论。她严肃指出，与伯恩斯坦斗争，不是斗争的方式和策略之争，而是关系到要不要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第一次明确指出同伯恩斯坦的争论，是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的争论。

在法国，党内革命左派同米勒兰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899 年 12 月和 1900 年秋在巴黎召开了两次法国各派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反入阁派同入阁派围绕米勒兰事件展开了激烈辩论。由于入阁派坚持修正主义立场，反入阁派退出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这种形势下，第二国际于 1900 年 9 月在巴黎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米勒兰入阁事件是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以卢森堡等人代表的左派，坚决反对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反对实行阶级合作，反接受资产阶级政府的“恩赐”，并要求第二国际对米勒兰以严厉制裁。以饶勒斯、伯恩斯坦、福尔马尔为首的右派，极力为米勒兰的变节行为

辩护，胡说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这样可以自上而下地提出措施，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逐渐改变资产阶级政权性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则以维护“国际统一”为名提出了一个对机会主义态度暧昧、折衷调和的决议案，胡说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只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这个决议案被称为“橡皮性”决议案。左派反对考茨基的决议草案，认为考茨基的决议是向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投降，右派则极力拥护它。结果大会以二十九票对九票通过了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这一决议使米勒兰的叛卖行为合法化，并为此后修正主义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从此，第二国际进入一个由机会主义盘踞和蜕化变质的时期。

这一时期，各国左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坚持革命、坚持斗争的原则性。但是，由于当时左派在政治上、理论上的不完全成熟，特别是对帝国主义时代所面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认识不足，因而未能击退修正主义的猖狂进攻。可是，革命左派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精神，却是无产阶级为争取完全胜利而进行的伟大战斗的序幕。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伟大的列宁接过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逆流而英勇奋战。

列宁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密切注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1899年8月，当列宁看到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后，非常气愤。第二天，他在给自己的亲属的信中指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而且是胆小的机会主义”，并断言伯恩斯坦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给玛·亚·乌里扬诺娃》(9月1日)，《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第241—242页。]。列宁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强调指出：“**必须直接展开论战来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乃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给编辑部的信》，《列宁全集》第四卷，第184页]

列宁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反击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领导各国左派向这股修正主义逆流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定不移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辟了道路。

列宁主义在斗争中诞生

列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解决了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帝国主义之间争夺霸权，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无产阶级将冲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使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胜利。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打碎和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就无法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列宁还指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同机会主义彻底决裂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说：“**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63页。]

从列宁主义诞生到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

八、列宁为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斗争

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受到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腐蚀，逐步蜕变为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列宁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创建了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所创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成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榜样。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实践，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列宁反对经济派的斗争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人民革命运动不断兴起，纷纷要求成立一个能领导革命运动的统一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

1898年，俄国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地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作了成立统一社会民主党的初次尝试。它们派代表于3月在明斯克召集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因被流放在西伯利亚，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和宣言中，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可是，在实际上，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代表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各地方组织既没有共同的政治路线，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不久就被沙皇政府全部逮捕了。分散的各地方组织也没有真正联结、统一起来，仍然处于思想上混乱、政治上动摇、组织上涣散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自列宁和他的不少战友被捕后，彼得堡“斗争协会”的领导成员的成分起了变化。一些新的人物出头露面了。他们自称“青年人”，开始推行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他们提出，工人只要进行反对厂主的经济斗争就够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

的政治斗争，让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去搞。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这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组织中最初出现的一个机会主义的集团——经济派。

1899年，普鲁科波维奇、库斯科娃等人公开发表宣言，鼓吹“经济派”的观点和策略。他们在宣言中宣称，工人运动的基本规律就是走“阻力最小的路线”。他们认为，在俄国开展政治斗争是困难的。因而在俄国阻力最小的路线“就是经济斗争”。他们鼓吹要用“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代替“夺取政权的意图”。他们反对在俄国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的主张，胡说这种主张是“照搬”外国的做法，并不符合俄国工人发展的需要。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胡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已经“过时”，对俄国也“不适合”。同时，他们竭力为伯恩斯坦主义辩护，声称伯恩斯坦主义的出现是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最合逻辑的进程”，等等。

列宁非常明白，如果“经济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就会使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遭到损害，就会把社会民主运动拉向倒退。所以，当经济派刚出现的时候，列宁就立即予以迎头痛击。

列宁一看到经济派的宣言，立即就把流放在周围各地的十七位马克思主义者召集来开会，商议对经济派开展斗争。在会上，通过了一个由列宁起草的揭露经济派观点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严厉地痛斥了经济派背弃马克思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建立独立的政党，并把工人政党变为资产阶级附属品的罪恶企图。这一文件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声讨经济派的战斗檄文。

经济派在受到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击之后，不仅没有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更加疯狂地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黑货。马尔丁诺夫等一批经济派分子，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在国内出版的《工人思想报》和在国外出版的《工人事业》杂志等舆论阵地，继续贩卖他们的机会主义观点，放肆地攻击马克思主义。

面对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样着手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呢？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召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来实现。列宁不同意这种意见，他明确指出：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这就是说，首先必须在思想上建党，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划清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经济派的界限。同时，列宁认为，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创办全俄政治报着手。

1900年初，列宁从流放地回来以后，就积极筹备办报。同年12月，列宁主编的《火星报》创刊号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火星报》一问世，就以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气魄和鲜明的立场宣布：“**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列宁在起草《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指出，《火星报》必须“**公开地全面讨论现代‘经济派’、伯恩施坦派和‘批评家’提出的原则上策略上的基本问题**”[《〈火星报〉编辑部声明》，《列宁全集》第四卷，第316页。]。在列宁的编辑下，《火星报》(前五十一期)成为向沙皇专制制度、资本主义、经济主义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开火的阵地。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旗帜，猛烈抨击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列宁通过自己所写的战斗文章和所编辑的《火星报》，教育和引导先进的无产者重视掌握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同一切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作不调和的斗争。这样，《火星报》就成了教育和积蓄党的力量的中心。《火星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26-227页。]。因为通过报纸的代办员和通讯员网，就可以把各个地方组织围绕着《火星报》而联结起来，而这些代办员和通讯员就成为使党统一起来的骨干。所以，《火星报》的创办，为俄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怎么办？》一书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

为了全面清算经济主义的罪行，加速建党的步伐，列宁写了一系列的文章，1902年，又写了《怎么办？》这一本名著。在这一著作中，列宁系统地批判了经济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并提出了建党的基本思想原则和建党的全面计划，奠定了在俄国建立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思想基础。

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才能保证自己的先进性，才能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经济派为了把革命的工人党改变为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首先就向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发起猖狂的进攻，妄图用修正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学着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腔调，打着“反对教条主义”、“批评自由”的旗号，妄图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为其改良主义路线服务。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伯恩斯坦及其在俄国的信徒经济派这股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进行坚决的反击。列宁深刻地揭露了经济派所谓的“批评自由”的实质，指出：“**‘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从何着手？》，《列宁全集》第五卷，第8页。]列宁教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特别认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特殊重要性。这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刚刚在形成，还没有彻底清算掉危害党的机会主义派别；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要学习别国的经验，需要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俄国社会民主党肩负着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队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所以，列宁强调指出：“没

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同上书，第241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同上书，第242页。]。

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担负向工人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任务。

崇拜自发性，是经济派的基本观点之一，也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共同思想根源。经济派从机械唯物论出发，认为工人运动本身就能产生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此，他们否认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还责难马克思主义者“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这些论调的实质，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用和党的领导作用。

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批判了经济派的谬论。列宁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而“**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7页。]。当然，没有工人运动，也不会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为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阶级基础。但是单有阶级基础还不够，因为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是一种科学，它必须凭借人类知识已经积累的先进思想资料为其基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起码条件。因此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只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背叛了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并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去的知识渊博的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创造出来。

既然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因此，列宁提出必须从外部向工人运动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由于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更正确、更深刻地说明了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根源，因而无产阶级最能领会和接受这一理论。这表明无产阶级有自发接受社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同样也不能忘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思想体系，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它的渊源比社会

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全面的加工，拥有政权和众多的宣传工具，而且时时刻刻在侵蚀着无产阶级。因而在工人中也存在着自发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经济派”站出来反对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传播他们的思想影响。列宁写道：“**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56页。]“**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同上书，第254页。]经济派崇拜自发工人运动，否认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就是对工人阶级的欺骗和陷害，意味着使工人变成资产阶级的俘虏。

由谁来担负向工人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任务？列宁指出，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只有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才能使工人运动走上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康庄大道。如果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脱离，那末，社会主义就始终只能是少数人的空谈，而工人运动亦只能始终在工联主义的道路上徘徊。而一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那末，社会主义就有了自己的物质力量，而工人运动就有了自己科学的精神武器，才能在斗争中所向无敌。而党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自发的工人运动引上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经济派崇拜自发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鼓吹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道路。他们提出要“为改良经济状况而斗争”的主张，鼓吹只要经济斗争，不要政治斗争的谬论，胡说“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他们还竭力鼓吹工人阶级“现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可见，在他们的眼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种种谬论只不过是伯恩斯坦所鼓吹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谬论的翻版。列宁在驳斥经济派贬低和摒弃政治斗争时指出：“**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

用的原理中，决不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
‘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
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262 页。]经济派把工人运动局限于经济斗争，妄图用眼前的暂时利益蒙住工人的眼睛，腐蚀工人的
革命斗志，使工人永远安于奴隶的地位，不去扫除沙皇专制制度，不去埋葬资本主义，其罪恶目的是
十分清楚的。

当然，这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不重视经济斗争的意义。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积
极领导经济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可能成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问题在于要把经济斗争
引导到政治斗争上去。只有使经济斗争变为政治斗争，变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改变自己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

因此，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能“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的稀饭喂饱工人阶级，必须利用经济斗争
给予工人初步政治觉悟，把工人提高到社会主义政治觉悟的高度。把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
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

可见，马克思主义者与经济主义者在纲领策略上的分歧，归结起来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切修
正主义者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即要不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四、必须建立一个革命家的组织。

列宁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认为党本身的结构应由两部分所组成：一是人数不多
的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革命家，他们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政治经验，组织技能，善于和沙皇警察作
斗争，另一方面是必须有广泛的地方党组织网，为数甚多而备受千百万劳动群众所拥护的党员群众。
这两部分构成集中统一的工人政党。

经济派崇拜自发性，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赞美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工人政党，尤其反对建立革命家的组织。他们攻击建立革命家组织就是搞“民意主义”、“反民主倾向”等等。他们想把党降低为像罢工基金会、互助会、工人储金会等等的一般工人群众的自发组织。他们反对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胡说党的任务就是尾随工人运动之后，记录工人的自发斗争，经济派的这种尾巴主义观点实质上是取消党，取消革命先锋队的作用。

列宁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俄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严厉地批判了经济派的尾巴主义路线，向社会民主党人指明了摆在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统一的革命家组织。他说：“**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345 页。]。“**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同上书，第 337 页。]。列宁把党的作用提到了应有的高度。

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本著作从思想上理论上粉碎了经济派，使一切先进的革命工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团结到列宁和《火星报》的周围来了。这一著作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为今后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布尔什维克党在斗争中建立

在反对经济派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1903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3 日，先在布鲁塞尔，后移至伦敦，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七卷，第 195 页。]。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成分是复杂的，有坚定的火星派分子，有动摇的火星派分子，也有改头换面的经济派分子和实际上拥护经济派观点的崩得（“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的简称）分子，这就预示着大会必将发生激烈的路线斗争。

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制定党纲、党章，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首先，大会围绕着党纲问题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写上党纲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大会前在起草党纲草案时，列宁就和普列汉诺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普列汉诺夫把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党纲奉为典范，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列入党纲草案，但在列宁的坚持和斗争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要条文还是列进了党纲草案。大会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又都登台表演，以种种借口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崩得分子和经济派分子声称，第二国际各国党的纲领都没有规定这一条文，我们也不能要。马尔丁诺夫等人竭力颂扬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托洛茨基则搬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宣扬的“唯生产力论”的黑货，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占民族人口多数时才能实现。这实际上是否认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俄国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

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坚决驳斥了各种错误观点，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经过激烈的斗争，大会终于通过了把无产阶级专政列入党纲。通过的党纲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掌握足以镇压剥削者任何反抗的政权。”在第二国际各党中，这是唯一列入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革命纲领，是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大会在讨论党章时，斗争也非常尖锐。斗争的焦点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党员的问题。党章第一条上出现了两个根本对立的条文。列宁的条文规定：“**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

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党员。”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七卷，第 280 页。]马尔托夫的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者，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这两个条文虽然只有参加组织和不参加组织之差，却包含了重大的原则分歧。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它除了要有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外，还必须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来约束每一个党员，审查每一个党员，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而不是谁高兴来就来的组织涣散的俱乐部。因此党员参加不参加一个组织是关系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关系到党的战斗性和纯洁性的根本问题。

列宁的条文坚持党的集中统一原则，这就保证了党有坚强的战斗性和严密的组织性，而不让空谈家或投机家混入党内，涣散党的队伍。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担当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重任。马尔托夫的条文则为分裂分子和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算是党员”。显然，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必定是成分复杂、没有定型、缺乏坚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党，这样的党，不但无法领导千千万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而且必然危害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列宁的条文，得到了坚定的火星派分子的一致拥护。但是，由于不坚定的火星派分子、托洛茨基和全部机会主义分子都支持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他们在人数上占了优势，结果，大会表决时通过了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这是大会的一个重大缺陷，它为以后孟什维克搞分裂活动留下可乘之机。

自党章第一条的讨论发生分歧以后，大会的斗争更趋激烈。机会主义者得意忘形，以为他们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的问题上也可以取得胜利了。他们不择手段地对列宁进行污蔑和围攻，妄图利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打击列宁及其拥护者，吹捧自己及其同伙，以便把他们的人推上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把持中央的领导权，推行他们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列宁并没有被这种机会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所吓倒，而是以加倍的火力还击他们。正如列宁在回忆这次大会上的斗争时所说的，

曾不得不把自己的枪枝装上双倍的弹药。在列宁的无情揭露和严厉痛斥下，在讨论党章时所暂时形成的机会主义者的联盟迅速瓦解了。崩得分子在会上提出，要求党承认他们是俄国各地犹太工人唯一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他们退出了大会。这样，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委)成员时，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列宁派的变化。结果，在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委会的委员选举中，列宁派获得了多数，马尔托夫派退居为少数。从此以后，拥护列宁的人就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意思)，反对列宁的人就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的意思)。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孟什维克的观点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主义。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1903 年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181 页。]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不仅保证了俄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胜利道路，而且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以马尔托夫为头子的孟什维克分子，他们不甘心自己在“二大”的失败，掀起了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浪潮，妄图分裂党和篡夺党的领导权。他们猖狂地进行反党活动，拒绝为《火星报》撰稿，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提出如要他们放弃抵制中央，停止分裂活动，就必须调换中央委员，恢复“二大”落选的孟什维克编委。列宁严正拒绝这种违反党章的无理要求。于是，孟什维克就开动他们的宣传机器，对列宁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咒骂列宁是“官僚主义”、“专制君主”，并在暗中策划成立反党的派别组织，妄图分裂党，搞垮党。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普列汉诺夫被机会主义者的攻击浪潮吓倒了。他竟然背弃“二大”决议，企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矛盾，不久就转向孟什维克，成为掩护孟什维克向布尔什维克猖狂进攻的大黑伞。他利用职权，强行把被“二大”否决掉的孟什维克分子拉进《火星报》编辑部。从此，列宁的观点和主张在《火星报》上就得不到反映了。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毅然退

出《火星报》编辑部，以便全力巩固党中央委员会，坚持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行径作斗争。因此，从五十二期起的《火星报》，就成了孟什维克推销机会主义黑货，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工具，被孟什维克篡夺去的《火星报》，称之为新《火星报》。

孟什维克分子霸占《火星报》之后，野心更大，妄图进一步夺取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同时，他们利用新《火星报》这个宣传工具，在党的组织原则的问题上进一步大做文章，宣扬他们的机会主义组织路线，攻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他们污蔑列宁所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什么“布朗基主义”。污蔑列宁所坚持的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党的决议的原则是什么搞“农奴制”等等。列宁为了彻底粉碎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揭露他们的分裂倒退活动。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巩固布尔什维克，于1904年2—5月间，写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

列宁在这本书中指出，孟什维克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反映了大学教授、青年学生中不愿加入党的组织，不愿受纪律约束，只想挂个党员招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孟什维克主张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实质，就是否认组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斗争中的伟大作用。这是为他们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

列宁在这本书中，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阐明了为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列宁再三强调“组织”的作用。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七卷，第410页。]列宁充满必胜的信念说：“**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七卷，第410页。]这本书成了布尔什维克和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斗争的武器。它使布尔什维克更坚

定了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决心，并使大多数的党组织认清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都团结到列宁的周围。

1905 年 4 月，在伦敦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把列宁在二大提出的第一条条文写入党章，最终战胜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组织路线。

列宁为保持布尔什维克党的独立和纯洁而斗争

正当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候，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急忙出来为他们在俄国的同道孟什维克撑腰，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1904 年 5 月，考茨基在孟什维克的报纸上宣布，他赞成马尔托夫，反对列宁。他歪曲事实，责备列宁不应该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把孟什维克“开除出”《火星报》编辑部(实际是落选)。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报纸几乎都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作了种种歪曲的报道，诽谤布尔什维克所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纪律。他们叫喊什么俄国党的任务就是要跟“集中制和极端作斗争”。有些左派也不了解俄国党内斗争的情况，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立即站出来与机会主义污蔑布尔什维克的行径作斗争。

在国际机会主义者掀起的反布尔什维克的鼓噪声中，伟大的列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导布尔什维克英勇奋战。列宁一方面不断写信、著文，揭露和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考茨基之流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向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介绍俄国党内斗争的情况和经验。

1904 年 8 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以独立组织的名义派代表参加国际性会议。当时第二国际的头目考茨基之流妄想利用这个会议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然而机会主义者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的估计革命的力量。在这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变

会场为战场，与机会主义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机会主义者的阴谋没有得逞。布尔什维克代表向大会提出了由列宁亲自参加编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危机的说明材料》，以德国党党章为例，揭露了第二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和所造成的恶果。报告中指出，因为德国党党章的第一条没有要求党员属于党的某一个组织，就被那些捣乱分子所广泛的利用了。

但是，参加阿姆斯特丹大会的第二国际各党的代表，在考茨基之流的指挥下，拒不接受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严正声明。他们不仅在言论上大肆支持孟什维克错误的政治路线，而且还在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妄图迫使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屈服。阿姆斯特丹大会通过了一个要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建立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决议。但是决议却不说明这种统一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1905年2月，第二国际的执行局(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决定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来“调停”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执，求得“统一”。仲裁委员会提出的“调停”条件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停止争论”。这就是要布尔什维克停止揭露孟什维克，取消布尔什维克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接受这种“仲裁”就等于承认第二国际(实际上是德国党)有权干预俄国党的内部事务。列宁坚决拒绝了这种“仲裁”，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争执，应由俄国党的代表大会来解决。他号召布尔什维克向国外人士和国外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党员，大力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由于列宁采取的坚定的原则立场，俄国党终于抵制了第二国际的粗暴干涉，使布尔什维克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纯洁，并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光辉旗帜

列宁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斗争中，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中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9—1953)。斯大林的父亲是个农民出身的鞋匠，母亲是农奴的女儿。1894年进中学读书的时候，斯大林就积极投身于社会革命。他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不仅努力学习马列著作，而且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开展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1898年，斯大林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被学校开除，从此，斯大林成为职业

革命家。《火星报》出版后，斯大林完全拥护列宁的主张，坚决站在列宁一边，为宣传列宁的路线积极工作。在南高加索，他主持创办了第一个用格鲁吉亚文宣传列宁路线的秘密报纸《斗争报》，并通过这个报纸使南高加索的党组织紧密地团结在列宁的《火星报》周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斯大林正在监狱和流放地。但当他获悉党代表大会上斗争的情况后，表示完全赞成列宁的路线，坚决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跟孟什维克开展斗争。1904 年他从流放地逃回南高加索，继续领导该地区布尔什维克开展与孟什维克的斗争，并写了一系列著作抨击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立场，成为列宁路线的坚定拥护者。

九、列宁在俄国 1905 年革命期间和革命低潮时期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正当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拼命鼓吹“社会改良”，赞美“社会和平”的时候，1905 年在俄国爆发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欧亚反动堡垒的沙皇专制制度，震撼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进了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和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觉醒，结束了巴黎公社以来的“和平”发展时期，掀起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风暴。

在俄国 1905 年革命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孟什维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率领无产阶级英勇奋战，创造了总政治罢工、建立苏维埃等新经验。在革命失败后，列宁又及时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坚决反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并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人民坚持斗争，提供了把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紧密结合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

革命的爆发和俄国党内两条对立的路线

俄国 1905 年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首先爆发在政治、经济较为落后的俄国，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首先起来打响向帝国主义冲杀的第一枪。

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焦点。1901-190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俄国，三千多家工厂倒闭，十多万名工人被解雇，占全国百分之六十的农民破产，从而使俄国国内外各种矛盾急剧地激化起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01-1904 年间，俄国爆发了一千多次工人罢工斗争，同时在各地爆发多次农民大起义，斗争锋芒直指沙皇专制制度，使俄国革命走在当时世界革命运动的前列。

危机重重的沙皇政府为了扑灭革命的烈火，乞灵于对外战争冒险。1904 年 4 月，沙俄和日本为争夺东北亚的霸权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却走向沙皇政府愿望的反面。军事上的惨败，经济上的破产，进一步加深了俄国国内的矛盾，革命条件日益成熟。1904 年年底，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巴库等地工人举行罢工示威。革命暴风雨即将来临。

1905 年俄历 1 月 9 日[俄历在二十世纪比通用公历晚十三天。以下俄国发生的事件均为俄历。]，彼得堡发生的流血事件，成了这次革命风暴的开始。

1905 年 1 月 3 日，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因厂方无理开除四名工人而开始罢工，其他工厂的工人也积极响应，到 1 月 8 日发展到全城总罢工。沙皇政府为了破坏这次罢工，策划了一个反革命阴谋。它指使警察局的奸细加邦牧师诱骗工人举行和平游行，向沙皇请愿，以便乘机把工人淹没在血泊中。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彻底揭露加邦牧师的欺骗性，使革命顺利进行，便深入工厂，散发传单，进行宣传，劝阻工人不要进行无益的请愿。指出“用一纸请愿书是买不到自由的，自由是要用血来换取的，自由是要在残酷的战斗中拿起武器来争得的”，并揭露沙皇政府可能制造流血挑衅事件。但当时仍有一大部分工人受了加邦的蒙蔽，对沙皇抱有幻想。1 月 9 日（星期日），工人们扶老携幼，组成约十四万人的一支和平请愿队伍，举着教堂旗帜和沙皇画像，唱着圣歌，拿着陈述本身

疾苦并要求沙皇赐予“恩惠”的请愿书，往冬宫求见沙皇。但是，沙皇并没有对工人讲“仁慈”，而是按照预定计划，用血腥屠杀来回答他们的和平请愿。当手无寸铁的工人游行队伍向市中心集中时，沙皇政府就以“工人想摧毁冬宫，杀害沙皇”为借口，下令开枪射击。接着派骑兵冲击，用马刀砍杀，结果，有一千多人被打死，二千多人受伤。工人的鲜血染遍了彼得堡街头。这一天在历史上称为“流血星期日”。这是自巴黎公社“流血周”以后最严重的反革命屠杀事件。

布尔什维克虽然不赞成这次请愿，但当工人群众自发地行动起来的时候，为了领导、教育和启发他们，仍决定参加工人游行队伍。因此，布尔什维克的许多党员也惨遭枪杀和逮捕。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员站在洒满工人群众鲜血的大街上向工人群众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本质。血的教训使广大群众迅速觉醒，开始认清了沙皇政府的反革命本质，丢掉了对沙皇的幻想。当天下午，工人占领兵工厂、武器库，夺取武器，筑起街垒，奋起反击。工人们说：“沙皇痛打了我们，我们也只好把他痛打一顿。”“流血星期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俄国，激起了各地群众的极大愤慨，卷起了罢工的浪潮。“打倒专制制度”、“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震撼着俄罗斯大地。仅一月份内，罢工人数达四十四万人，超过以往十年的罢工总人数。革命风暴席卷俄国各地，猛烈地冲击着反动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

俄国革命开始了。

革命的迅猛发展，把社会上各阶级、各政党都发动起来了。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沙皇政府深感单靠暴力无法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也不能制止革命。因此，它除了残酷镇压之外，又答应召开咨议性的“国家杜马”（即议会），作为缓兵之计，伺机扑灭革命。

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立宪民主党，为了窃取政权，采取狡猾的两面手法：一方面拿革命来恐吓沙皇，以取得某些改良，捞取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又非常害怕革命，害怕无产阶级“把枪支从右肩移到左肩”，因而极力与沙皇妥协，企图实现君主立宪，使革命半途而废。

敌人已经行动起来了，自由资产阶级也有了自己的策略，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也必须及时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明确规定在这次革命的对象、动力、同盟军以及如何对待这些敌人和同盟军的总的方针和政策，以便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达到真正的彻底胜利。但是，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存在着两派，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它们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机关报。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提出了立刻召开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以便制定统一而周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孟什维克蛮横拒绝。于是，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毅然在 1905 年 4 月间在英国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也单独召开了他们的分裂主义的代表会议。

两个大会，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但却通过了完全不同的、根本对立的 two 条路线。

伦敦代表大会，在列宁亲自主持下，科学地分析了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这条路线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孤立资产阶级，必须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然后再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条发展革命、敢于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日内瓦代表会议却制定了一条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这条路线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能作为资产阶级的尾巴，通过议会斗争，用和平方式改良沙皇制度。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革命应该停顿下来，让资产阶级长期统治下去。这是一条害怕革命、叛卖革命的投降主义路线，是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路线的变种。

大会以后，孟什维克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互相勾结，恶毒攻击列宁领导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掀起了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逆流。

当时，一贯“向修正主义者让步”的普列汉诺夫也跳出来竭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他以“中立者”自居，攻击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合法性，拒绝服从这次大会的决议，却又硬要布尔什维克同意他继续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第二国际执行局的代表，以便利用他在第二国际的地位和影响来干反

布尔什维克的勾当。他向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发出信件，企图诱使各国社会民主党支持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孤立布尔什维克。

在俄国党内斗争的问题上，一贯偏袒孟什维克的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这时又起劲地支持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考茨基公开发表文章，诽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恶意歪曲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分歧，胡说什么“在这种时候争吵是犯罪”。他们又以“调解”为名，对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并妄图利用国际仲裁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原则立场，屈从于孟什维克。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使革命胜利发展，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不断写信给党中央和第二国际执行局，揭穿普列汉诺夫“中立”的假面具，要求撤消他原任驻国际执行局代表的资格，派遣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接替。列宁还写了《给来比锡人民报编辑部的公开信》，揭露考茨基对孟什维克的庇护，抗议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无耻诽谤。列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立场，对于国际仲裁的强制性决定严加拒绝，粉碎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俄国党内斗争的干预。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发表

革命的发展，路线斗争的深入，迫切需要布尔什维克从理论上全面阐明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是把革命引向胜利的必要条件。为此，1905年7月，列宁写了著名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本书中，列宁系统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深刻地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学说，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学说，武装斗争的学说，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学说以及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该书的主要论

述是：

一、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孟什维克抄袭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观点，竭力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因而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充当这个革命的领导者。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应当力争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认为这样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规模缩小”。

列宁批判了这种机会主义谬论，全面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

1905 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西欧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它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革命。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而 1905 年俄国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阶段发生的。认清时代的基本特征，无产阶级在制定自己正确路线和策略时就有了根据。当资产阶级还是一个上升的进步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因此资产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他们利用工农群众的力量，进行了反封建的斗争。但是，即使在当时，他们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也往往是不坚定的，不彻底的，甚至出卖革命。

在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资产阶级已经从原先的革命阶级向反面转化，成为反动阶级，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而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起着历史上的主导作用，成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

1905 年革命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是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同封建、军事专制的沙皇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的反革命性更为突出。在革命中，它表面上偶尔也表示同情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为的是迫使沙皇让它参与政权；实际上它始终支持沙皇，共同扼杀革命。俄国资产阶级这种阶级特性决定了它根本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而深受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俄国无产阶级，最富有革命性，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按其地位来说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以它负有在俄国的一般民主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愿意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因为民主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

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543 页 。]

无产阶级要实现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把农民当作自己可靠的同盟军，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对农民进行领导的问题，离开了对农民的领导，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权，也谈不上什么民主革命的胜利。同时，只有彻底实行民主革命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因此，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同盟军。无产阶级为了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就必须提出和实行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纲领。第二，必须把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自由资产阶级驱逐出领导舞台，并使其孤立。资产阶级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可能领导革命，但它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要采用一切手段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因此，不坚决地排除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不把它彻底孤立起来，就不能把农民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者。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和孤立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实现对革命领导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孤立资产阶级；而只有孤立资产阶级，才能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

这样，列宁不仅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必要性、可能性，并且指出了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途径，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权的一般原则发展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完整的革命路线。

二、人民武装起义是夺取政权的根本道路。

孟什维克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一样，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否认武装起义的必要性，鼓吹可以通过“国家杜马”夺取政权的修正主义谬论。

列宁严厉地驳斥了这种反对武装起义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认为，人民武装起义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手段。**“一切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

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政府就这样作过，而且从 1 月 9 日起就在全全国各地一贯而顽固地继续这样作。”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620 页。]因此，无产阶级应该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这是保证人民对沙皇制度取得完全胜利、保证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610 页。]

为了引导群众去举行起义，列宁提出了一系列革命口号。

例如：举行群众政治罢工，立刻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用革命手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一切民主改革，一直到没收地主土地等等。这些革命口号的精神在于：放手发动群众，使群众毫无顾虑地采取各种手段去瓦解沙皇专制制度，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在号召群众举行武装起义的同时，列宁揭穿了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提出的立宪幻想。指出：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立宪会议的任何决定都是可怜的空话；当国内战争已经开始，武装起义已经刻不容缓的时候，重复议会斗争的说教，就是出卖革命，背叛革命。

列宁又指出，武装起义的胜利不是革命的结束。起义胜利后，必须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临时政府，用革命武装巩固革命成果，镇压反革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总之，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才能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

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孟什维克搬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万里长城论”，胡说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将要出现一个漫长的停顿阶段，即资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时期要让资本主义“和平地”发展。无产阶级在此阶段主要是“积聚力量”，农民因受剥削而分化、破产，参加工人队伍，直到工人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时，社会主义革命才会到来。这样，他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割裂开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资产阶级，使革命半途而废。

列宁指出，俄国革命的两个阶段是必须加以区别的，但又是互相交错的，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列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作第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比作第二步。他说：“**我们必须尽快地走过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击溃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531-532 页。]又说：“**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634 页。]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的，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托洛茨基说什么在帝国主义时代，农民作为私有者已是“落后的一帮”，没有多大的革命作用，无产阶级不能同农民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只能依靠“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取得政权。他主张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一次革命”，以建立不要农民的“工人政府”。这种谬论，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反对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列宁在批判这种反动谬论时明确指出：“**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效劳于反动势力。**”[《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577 页。]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了起来。一方面，要严格区分不同的革命阶段，首先必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绝不可跳过尚未完成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又要不断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的成果，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准备条件，以保证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及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集中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它象一条红线，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无产阶级只有牢牢地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才能领导农民，武

装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实现革命的转变。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列宁的这一著作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争取解放的指南。

革命的高潮和对待武装起义的两种不同态度

第三次党代会以后，在列宁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俄国革命迅猛发展，汹涌澎湃。1905 年“五一”节期间，全俄二百多个城市二十二万工人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举行了政治罢工。5 月 12 日，伊万诺沃-沃涅先斯克的七万工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工人政治罢工的巨大浪潮给农村以深刻的影响。1905 年秋，许多地方爆发了农业工人大罢工。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影响了沙皇的军队。军队中不断发生革命的骚动和武装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起义。6 月 14 日，起义水兵处决了反动军官，升起了红旗，并选出了三十人组成的军舰委员会来领导起义。第二天，“波将金号”开往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由于孟什维克的破坏，水兵们未能上岸同工人一起战斗，丧失了夺取政权的良好时机。沙皇政府对“波将金号”起义惊恐万状，立即调集全部黑海舰队前去镇压，起义士兵英勇斗争，奋战一周，最后因煤尽粮绝而失败。“波将金号”起义标志着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第一次有沙皇制度的一支巨大军事力量——一艘装甲舰——公开转向革命”** [《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选集》第八卷，第 527 页。]，这表明革命洪流已经冲到沙皇专制制度最后的反动支柱——军队中去了。

沙皇政府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在运用暴力镇压的同时，又玩弄立宪骗局，企图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8 月 6 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列宁认为，在当时革命高涨的形势下，参加杜马，只会在群众中制造混乱，帮助沙皇政府欺骗人民，使人民离开革命斗争的道路。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抵制杜马的策略。由于实行这一正确的策略，沙皇政府的骗局破产了。

1905 年秋，俄国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0 月上旬，在莫斯科首先爆发了政治总罢工，铁路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几天内，全国四万公里的十四条铁路线上七十五万职工宣布总罢工，接着彼得堡工人也宣布政治总罢工。政治总罢工的浪潮迅速地扩展到全国所有的工业中心和城市，甚至发展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明斯克到海参威，从伏尔加河流域到西伯利亚地区，一个一个工厂相继卷入了罢工，总计共有二千五百多个大工厂，二百多万人。十月全俄政治总罢工就这样开始了。在十月政治总罢工的日子里，无产阶级发挥了非凡的首创精神，创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士兵苏维埃和工农代表苏维埃。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由各工厂代表组成的无产阶级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它不仅是罢工的领导机关，而且发挥了临时革命政权的作用。它冲破沙皇政府的“法治”，自行颁布法令，推行革命措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公开出版革命报纸，积极武装群众，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苏维埃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罢工运动，而全俄政治总罢工就成为武装起义的前奏。

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魂不附体的沙皇，大要反革命两手：一方面下令军队“决不要放空枪，也不要吝惜子弹”，进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又制造新的政治骗局。10 月 17 日，沙皇颁布了一个“宣言”，假惺惺地宣布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等自由，答应扩大选举权，成立具有立法权的杜马，妄图转移人民视线，阻止起义爆发。

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认为沙皇的“宣言”已实现了让他们参加政权的愿望，于是同沙皇政府一唱一和，大肆叫嚷革命已经结束。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组成了“十月十七日同盟”，称为十月党人。一部分自由派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建立了“立宪民主党”。他们鼓吹同沙皇合作，妄图用君主立宪的形式，捞取一官半职，保存沙皇专制制度，制止革命。

孟什维克跟在资产阶级屁股后面，为沙皇“宣言”大唱赞歌。他们胡说什么专制制度的旧枷锁已一去不复返，革命已经胜利，从此可以用立法、杜马和平地实现人民的要求。完全是一副“议会迷”的丑态。

布尔什维克及时发表了告人民书，彻底揭露沙皇政府的阴谋和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的谎言。告人民书指出沙皇颁布“宣言”是无产阶级进行英勇斗争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但是专制制度远没有崩溃，沙皇还掌握着政权。沙皇政府的“宣言”只不过是“假让步”，是丑恶的“滑稽剧”，它企图用一纸空文来麻痹工农的革命意志，以便赢得时间，聚集力量，伺机反扑。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发动群众，进入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

列宁为了发展革命形势，直接领导武装起义，于是在1905年11月从日内瓦秘密回国。列宁一回到彼得堡，就立即亲自领导党中央委员会工作，出席党的各种会议，写了十几篇关于武装起义的文章，要求全党认真研究军事，号召无产阶级积极投入战斗。在起义前，列宁派了布尔什维克小组到莫斯科去领导起义。莫斯科苏维埃遵照列宁的指示，进行了争取士兵、武装工人、捐款购置武器、制定作战计划和加强对战斗队的领导和训练等工作。12月，莫斯科工人首先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工人迅速筑起街垒，同反动军队进行英勇搏斗。广大劳动妇女同男子并肩战斗。哪里街垒遭到破坏，哪里就建立起新的街垒；哪里有战士阵亡，哪里就有成批的新战士投入战斗，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但是，在起义的紧要关头，由于叛徒的出卖，党的莫斯科委员会被破坏，大多数成员被捕，使起义失去了领导核心；同时由于彼得堡苏维埃已被孟什维克所把持，他们反对武装起义，使莫斯科起义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在孟什维克的控制下照常工作，就使沙皇政府有可能把大批大批的军队调到莫斯科来镇压起义。这样，莫斯科起义工人经过九天殊死奋战，最后终于失败了。

除莫斯科外，其他各地区也相继爆发武装起义，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到处开展武装斗争。但所有这些起义都先后被沙皇军队所镇压。

对于十二月武装起义，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孟什维克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以老爷式的态度指责布尔什维克和群众，埋怨政治罢工“不合时宜”，又胡说什么起义的失败是不难预料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等等。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

1870 年也曾阻止过巴黎工人起义。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666 页。]列宁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在 1870 年 9 月即巴黎公社成立半年以前，曾经警告过法国工人，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是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当群众已经起义了的时候，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训诫他们，向他们打官腔。**”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690 页。]马克思对待决心冲天的无产阶级，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仍然热情洋溢地歌颂公社的业绩。而普列汉诺夫之流在俄国工人十二月武装起义以前，并没有发出过任何警告；当起义失败时，却又嘀咕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指责革命群众。列宁说，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怎么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相比呢？真是有天渊之别！

为了回击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对武装起义的污蔑攻击，列宁还指出：“**为了使动摇不定和意志消沉的人取得教训，为了使背叛和脱离社会主义的人感到耻辱，我们要公开声明：工人政党认为，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1905 年十月斗争和十二月斗争是巴黎公社以后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发展这种形式的斗争，才能保证未来革命取得胜利**”。 [《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列宁选集》第十五卷，第 43 页。]

1905 年俄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在俄国国内，它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锻炼和教育了革命人民，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无产阶级也在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 1905 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184 页。]在国外，“**它唤起了整个亚洲的运动**”，并“**间接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关于 1905 年

革命的报告》，《列宁选集》第二十三卷，第 258 页。]。在这次革命的影响下，伊朗、土耳其、中国等都先后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1905 年俄国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新时期的到来。

革命低潮时期列宁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的斗争

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由高潮逐步进入了退却时期。工人们且战且退，并多次从掩护战转入新的进攻。沙皇政府为了缓和尚在继续战斗的工人反抗，于 1905 年 12 月颁布了关于召开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法令，并于 1906 年 4 月正式开幕。杜马中讨论的主要是土地问题。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议案，要求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沙皇感到这届杜马很不驯服，强行把它解散，同时改组政府，任命斯托雷平为总理大臣。

沙皇政府虽然解散了第一届杜马，但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在 1907 年 1 月又召开了第二届杜马。布尔什维克抵制了第一届杜马，但参加了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列宁教导布尔什维克要善于根据客观形势来规定自己的策略。当革命处在高潮时，要善于进攻；当革命处在低潮时，要善于退却。由于当时革命已明显走向低潮，不存在抵制杜马的客观条件，所以，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参加杜马选举，以利用杜马这个讲坛，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争取广大群众。在杜马中，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根据列宁的指示，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彻底改革的土地纲领，捍卫农民群众的利益。

由于布尔什维克参加了第二届杜马，使左派力量不断壮大。沙皇政府看到第二届杜马比第一届更不驯服，便捏造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策划“叛国政变”的罪名，非法逮捕了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六十五人，并在 6 月 3 日宣布解散第二届杜马。同时，它颁布了更加反动的选举法，以保证在第三届杜马

中大量增加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这在历史上称为“六三政变”，标志着俄国 1905 — 1907 年革命已告结束。

“六三政变”后，俄国历史进入了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

沙皇政府同所有反动党派结成了反革命的神圣同盟，疯狂对革命势力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用绞架、监狱、流放所，残酷镇压革命党和革命势力，实行白色恐怖。在经济上，资产阶级采用同盟歇业，集体解雇，降低工资，延长工时等方法肆无忌惮地剥削和奴役工人。在农村，他们培植富农经济，迫使广大农民破产和流浪。在思想上，疯狂地“围剿”马克思主义，咒骂革命，赞美叛变革命行为。总之，反动派运用各种手段，妄图扑灭革命运动。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在反革命势力猖狂进攻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大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或被枪杀，许多党的组织被破坏，党员人数急速下降。在革命高潮时期混进党内的“同路人”，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表现消沉、颓废、动摇，有的脱党，有的当了叛徒、特务。

在革命转折关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充满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革命斗争。列宁深刻地总结了 1905 年革命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俄国革命形势，确定了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的路线和策略。列宁认为，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新的革命高潮必将还会到来，因为引起 1905 年革命的那些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因素还在继续发生作用。所以，党必须坚持第三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但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党必须采取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这就是说，必须从进攻转为防守，实行正确的退却，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新的革命聚集力量。同时党又要善于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通过一切合法组织中的公开工作，来揭穿沙皇政府的实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为武装起义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因此，只要还有可能，社会民主党就要争取参加国家杜马，参加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这个反动议会，更不是幻想通过议会来取得政权，而是为了利用杜马讲坛来揭穿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揭穿自由资产阶级同

沙皇的勾结，争取劳动农民的支持。当然，在反动统治加强的情况下，秘密斗争是基本的，醉心于合法斗争是错误的。这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

革命失败后，孟什维克被反革命暴力所吓倒。他们根本不相信革命会重新高涨起来，他们要求取消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取消革命。他们一心想要建立沙皇政府允许的、公开的、合法的“工人党”，并提出建立“公开的工人党”和“为公开党而斗争”等口号，主张只搞合法斗争，甚至不惜牺牲党的纲领、策略去换取合法地位，实行投降主义。这些人被称为取消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马尔托夫、唐恩等人。

列宁深刻地揭露了取消派背弃党的机会主义行径。列宁指出，取消派提出的口号，“**按其阶级根源说来，是反革命的自由派的口号。这里面除了改良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70页。]。因此，党如果“**不坚决反对那些要取消它，消灭它，否认它，背弃它的人，那它就会不能生存**”。[同上书，459页。]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波格丹诺夫之流的召回派。他们否认革命已经转入低潮的事实，反对党利用一切合法组织进行斗争，主张召回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召回在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工作的党员，所以被称为“召回派”。

列宁把召回派称为来自左的方面的取消主义，是变相的取消派。因为召回派不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他们反对利用一切合法组织、合法机会进行革命活动，就会使党脱离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实际上是取消党领导和教育人民群众的任务，因而就是取消革命，取消党。

当时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小最所谓非派别分子，则伪装“超党派”，贩卖同机会主义和平相处的谬论，来为取消派、召回派效劳。1912年，托洛茨基拼凑了“八月联盟”，纠合取消派、召回派和其他反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和派别，疯狂地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托洛茨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丑恶历史，指出他一贯在各派之间任意飞来飞去。忽而是激烈的孟什维克，忽而是个“左”的“不断革命”论者；昨天同经济派合

作，今天又同取消派结成联盟。托洛茨基自命超出一切党派之上，其实比公开的取消派更卑劣，是一个“**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486 页。]。列宁把他比作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轻蔑地称他为“**厚颜无耻的犹大什克·托洛茨基**”[《厚颜无耻的犹大什克·托洛茨基》，《列宁选集》第十七卷，第 28 页。]。

为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和策略，列宁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写了《几个争论问题》、《取消取消主义》等一系列著作，揭露和批判了这些机会主义的反动实质。

政治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总是和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密切相联的。取消派和召回派要取消党，背叛革命，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必然要把唯心主义作为掩盖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思想武器，必然要从根本上否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此，当时俄国的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尤什凯维奇等人联合起来，结成一条哲学上的反动的“联合阵线”，同国际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哲学家一起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波格丹诺夫等人于 1908 年连续地抛出了一系列的反动哲学著作，集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企图以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哲学来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为他们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马赫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俄国修正主义者之所以用马赫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是因为马赫主义有两块骗人的招牌。一块叫“科学的哲学”，就是披着科学的外衣，用一些空洞、含糊不清的名词术语把它的唯心主义实质掩盖起来，侈谈自己的哲学是最新自然科学的哲学。第二块叫“超党派”，标榜他们的哲学既反对唯物论，又反对唯心论，是超出两者之间没有党性的“中派”性质。马赫主义的这些特点，正适合俄国修正主义波格丹诺夫之流“跪着造反”的需要。这些家伙要背叛马克思主义，但又不敢直截了当地讲出自己的观点；他们进行反党活动，又要装出一副“公正”面孔。所以他们用马赫主义为自己的叛党行为辩护，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修正主义者在思想战线上的猖狂进攻，使得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成为党的迫切的首要任务。为了彻底批判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反动哲学基础，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俄国的党和无产阶级，列宁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1908年列宁发表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哲学名著。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和科学发展成果，深刻地剖析了马赫主义的反动哲学体系，给当时流行的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哲学思潮以毁灭性的打击，粉碎了修正主义的猖狂进攻。列宁在清算马赫、波格丹诺夫等反动哲学的同时，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马赫主义认为，世界是“感觉的复合”，人们不能知道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存在。列宁尖锐地指出，这种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是主观唯心主义，它必然导致荒谬的唯我论。列宁明确地提出了两条对立的哲学路线。他说：“**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6页。]并且得出结论说：“**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同上书，100页。]这就告诉我们，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首先要承认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认识必须从客观存在出发，这是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础。

马赫主义认为，客观规律是主观自生的，是不可知的。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时指出：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的。在物质的现象和本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承认这个重要结论，不弄清这个重要结论，把现象和本质割裂开来或等同起来，看不到物质运动的规律就会陷入唯心论的不可知论。“**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同上书，100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

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的反动谬论时，科学地阐明了认识论中的辩证法。它告诉我们，物质是运动的，人的认识也要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把事物看成是静止的，把认识看成是一成不变的，那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

列宁还揭穿了马赫主义“无党性”的画皮，明确指出，哲学上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同上书，365页。]。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它用共产主义世界观进一步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使无产阶级坚定必胜信念，战胜各种困难，把革命进行到底。

列宁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不仅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把召回派开除出党。1912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上，又通过了将取消派孟什维克开除出党的决议。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随后，托洛茨基的“八月联盟”也很快瓦解了。

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尖锐、复杂、艰苦的斗争，终于经受了反动时期的严峻考验，锻炼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了，领导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去迎接新的革命风暴。

十、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先后被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西方殖民者野蛮的侵略和疯狂的掠夺，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也引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强烈的反抗，在亚、非、拉一系列国家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革命风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又有新的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认识和对待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民族解放运动？无产阶级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民族纲领？在这

些问题上，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列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引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胜利前进。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形成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是帝国主义所统治、控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总称，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殖民政策，掠夺殖民地，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沦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资本输出场所、商品销售市场的作用更加重要了，殖民地已成为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帝国主义各国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日益激烈，它们疯狂扩军备战，推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准备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进入了“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97页。]。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占有相当规模的殖民地。英国是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号称“日不落国”。它侵占的殖民地遍布全球，殖民地面积相等于本国领土的一百倍。法国侵占了非洲的许多地方以及亚洲的印度支那半岛，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也占有不少殖民地。沙皇俄国的侵略魔爪伸向欧洲及亚洲广大地区。

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从来都是以分割者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为根据的。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实力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从而引起它们之间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霸权的斗争。老牌殖民帝国英、俄、法等继续加紧掠夺，新的殖民强盗德、日、美也陆续加入抢占殖民地的行列。在亚、非、拉广阔的土地上，殖民强盗为争夺殖民地吵闹不休，甚至大动干戈。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世界已被帝国主义列强基本上瓜分完毕。1900年，最大的殖民帝国

英国侵占了三千二百七十一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沙皇俄国则吞并了别国领土一千七百二十八万平方公里，它拥有的殖民地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二位，成为一个横跨欧亚的殖民大帝国。与此同时，非洲的百分之九十的地区，亚洲的百分之五十六的地区，美洲的百分之二十七的地区，以及澳洲的全部，都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同时不少国家被沦为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这样，整个世界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占世界居民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营垒，帝国主义使民族压迫成为世界的普遍现象，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最终形成。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形成的过程，是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对被压迫民族全面控制和疯狂掠夺的过程。列宁指出：“**殖民地是用火和剑夺取来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672 页。]。殖民主义者向外扩张的过程，是充满着侵略和掠夺、杀戮和奴役的血腥历史。在美洲，殖民者屠杀数百万印第安人，抢走了无数黄金和白银，在非洲，他们进行罪恶的奴隶贩卖，在亚洲，他们从事鸦片贸易等罪恶勾当。帝国主义强盗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胡作非为，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长期处于停滞和极度贫困的根本原因。

列宁对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批判

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激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着怎样认识和对待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他们完全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充当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他们宣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是“进步”的、“文明”的，鼓吹殖民扩张是“社会进步的最有力杠杆之一”。他们竭力支持本国政府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夺，叫嚷“为了文明的利益，大的强国

应该占统治地位”，“阻碍世界文明的小国，应该消灭”。他们还胡说什么“工人阶级也需要殖民地”，甚至说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必须实行殖民政策，如果取消殖民地，就“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这些谬论概括起来就是说：侵略有理，剥削有功。这充分暴露了修正主义分子维护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反动嘴脸。

正当这种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涂脂抹粉的修正主义思潮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同这股修正主义思潮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突出地表现在1907年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除讨论如何对待战争和军国主义问题外，民族殖民地问题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斗争，是在修正主义分子占多数、气焰十分嚣张的情况下进行的。修正主义者企图凭借多数，以势压人，迫使一些小国和遭受殖民政策迫害的国家代表俯首听命，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效劳。在大会上，列宁挺身而出，团结革命左派，尖锐地揭露和批驳了美化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修正主义谬论。

开始，右派把持了大会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荷兰的机会主义者万·科尔抛出了一个“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决议草案。他公开叫嚷：“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的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列宁未能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但在列宁领导下，革命左派在委员会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坚决驳斥了万·科尔的草案，提出了谴责殖民主义的提案。由于右派操纵，委员会强行通过了以万·科尔草案为基础的决议，完全肯定了“社会主义殖民政策”。但是，委员会也不得不把革命派的提案一并提交大会讨论。革命左派的提案谴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指出殖民扩张“必然导致奴役、强制劳动以至屠杀殖民地居民”，所谓传播文明“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借口，目的只是为掩饰进行掠夺和剥削的贪欲”。革命左派明确宣布，“只有社

会主义社会才能使一切民族可能达到高度的文化水平”。左派的提案在修正主义草案面前树立了鲜明的对立面。

在大会全体会议上，斗争更为激烈。会议期间，各国修正主义分子聚集在万·科尔周围，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大唱赞歌，向列宁为首的革命派发动猖狂进攻。万·科尔再次为他的草案进行辩护，胡说什么“只要人类存在一天，殖民地便存在一天”，“殖民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并进而攻击革命左派的提案。接着，伯恩斯坦跳上讲台，大发谬论，无耻吹捧“社会主义殖民政策”。以中派面目出现的考茨基，表面上反对“社会主义殖民政策”，但建议把这个“新思想”留待以后再详细讨论，以折衷主义来掩盖右派提案的机会主义本质，从而助长了右派的嚣张气焰。

在大会全体会议前夕，列宁就主持召开了布尔什维克、波兰和德国党内左派的联席会议，制定正确的路线。在大会过程中，列宁又进行了大量工作，组织左派队伍，团结许多小国和受殖民压迫国家的代表，争取中间派，对修正主义的恶意挑战进行了全面反击。由于列宁和各国革命派的坚决斗争，大会在一百二十七票对一百零八票、十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革命左派谴责殖民主义的提案，否决了修正主义的决议案。

“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虽然遭到大会否决，但它影响恶劣，危害极大。所以，大会以后，列宁又多次发表文章，继续进行揭露和批判。

列宁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45页。]鼓吹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仍需要对被压迫民族进行殖民统治，这就从根本上抹煞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为帝国主义疯狂向外扩张的殖民政策制造理论根据。所以，列宁指出，“**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

退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 [同上书，第 744 页。]列宁的批判，击中了“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要害，揭穿了这伙叛徒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

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为什么西欧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的代表都赞成“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提案，而许多小国和深受殖民政策迫害的国家代表都同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派一道，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决议案呢？列宁深刻地指出：“**广泛实行殖民政策的结果，使欧洲无产者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养活全社会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几乎是被掠夺的殖民地人民的劳动。例如，英国资产阶级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千百万人民那里榨取来的收入，比从英国工人那里榨取来的收入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些国家里，形成了使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 81 页。]

列宁的这段话，不仅透彻地分析了产生“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社会根源，而且明确地告诉我们，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同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只有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才能摧毁机会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促进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化。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必须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束缚，争取革命的胜利。

在这场围绕“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然而，只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斗争就不会完结。我们要牢记历史经验，学习列宁的斗争精神，不断揭露社会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罪恶阴谋。

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两种不同态度

帝国主义野蛮的殖民统治，不断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形成，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不断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特别是在亚洲，帝国主义同亚洲各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使亚洲各国

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继 1905 年俄国革命以后，伊朗、土耳其、南亚次大陆、印度尼西亚、越南、朝鲜、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接二连三地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掀起了被压迫民族伟大的革命风暴。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接连不断。亚洲大陆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广阔战场。其中 1905 年伊朗的资产阶级革命，1908 年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1911 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辛亥革命，以及 1905—1908 年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列宁满腔热情地称颂这是“**亚洲的觉醒**”。他说，“**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448 页。]

面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风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恶毒咒骂“糟得很”！全世界革命人民则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好得很”！如何估计这场革命风暴的意义和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竭力贬低和否定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和作用，胡说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伯恩斯坦竟然恶毒诬蔑被压迫民族革命是“野蛮人反对扩张文明的起义”，因而“带有反动的性质”，妄图从根本上取消民族解放运动。

当时，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热烈关心和大力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热情欢呼亚洲的觉醒。这一时期，列宁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和文章，论述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修正主义者的无耻嘴脸，解决了当时提出的有关民族解放运动的许多重大问题。

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贬低、诬蔑民族解放运动的谬论，列宁高度评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他明确指出：“**当机会主义者刚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

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马克思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9页。]列宁还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9页。]的英明论断。

为什么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必将“反转来影响”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亚洲必将“反转来影响”欧洲呢？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上的事情已经联成一气，民族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总是互相影响，互相鼓舞，互相促进的。同时，东方被压迫民族和西方无产阶级的共同敌人都是帝国主义。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将削弱帝国主义的势力，从而有力地支援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列宁强调指出，帝国主义广泛实行殖民政策的结果，有可能从榨取殖民地获得的巨额利润中分出一小部分去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培植机会主义，腐蚀、毒害无产阶级，殖民扩张成了帝国主义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代理人的物质经济基础。因此，只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来革命，才能摧毁这个物质基础，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化，推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的这些著名论断和科学预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总是宣扬欧洲的“文明”和“先进”，东方则一直被污蔑为“野蛮”、“落后”的民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充当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他们也总是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横加污蔑和攻击。而革命队伍里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也常常以欧洲革命为转移，根本不重视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只有伟大的列宁，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他满腔热情地歌颂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高度评价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为无产阶级埋葬帝国主义，进行世界革命找到一支最可靠的同盟军，并给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汇成巨大的世界革命洪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斗争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进一步指出,殖民地国家的广大人民“**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下一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69页。]。今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列宁的预言,已经成为光辉的现实。

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纲领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爆发后,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写了一系列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重要著作。列宁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论民族自决权》等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批判了修正主义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谬论,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纲领和政策。

首先,列宁提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已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观点,这是列宁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党纲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20页。]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为了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竭力抹杀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他们用所谓**“一般民族”**、**“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等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区分,还散布什么被压迫民族可以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可以建立**“民族平等同盟”**的幻想。针对修正主义者的这些谬论,列宁明确指出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极端重要性。他说,**“这种区分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的,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从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或小市民的空想主义(即认为各独立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和平竞争)的观点看来,这种区分是无关重要的,但是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观点看来,它却是非**

常紧要的。”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 388 页。]列宁关于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是被压迫民族最凶恶的敌人，指出了被压迫民族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从而分清了敌友，为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纲领指明了方向。

第二，列宁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兼并和民族压迫提出来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一种彻底表现。列宁指出：“**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719 页。]同时，列宁指出，坚持民族自决权，“**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719 页。]。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决不能口头上空谈反对兼并和赞成民族平等，而应当明确支持被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从本民族的压迫下有政治分离的自由。只有这样，才坚持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民族自决权，目的在于消灭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在打破帝国主义压迫之后，各民族才可能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原则实行平等的联合。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因此，民族自决的要求，应该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总利益，要根据具体的国际条件和革命利益来决定，必须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民族分离肢解独立国家和挑起民族纠纷，防止将争取民族自由、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被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利用来达到它的同样的帝国主义目的。

第三，列宁强调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列宁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从帝国主义后方打击帝国主义、动摇帝国主义基础的伟大力量，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

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才能打败共同的敌人，取得斗争的胜利。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鼓吹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叛徒立场，列宁强调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对待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社会沙文主义的重要标志。他说，“**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有机会的时候，也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24页。]列宁在对待俄国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问题上的态度，为各国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废除沙俄强迫邻国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把沙俄兼并的领土归还邻国，只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才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对殖民地人民“**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75页。]。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列宁指出：“**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同上书，第274页。]列宁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同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第四，列宁论述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竭力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恶毒攻击民族解放战争；而在革命左派队伍里，有的人也错误地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有民族战争”，爆发民族战争会很快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在回击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攻的同时，对某些革命左派的错误观点也进行了批判。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53页。]。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夺，总是以它的反革命暴力为后盾的。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刺刀进行残暴统治的情况下，

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只有拿起武器，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才是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列宁进一步指出：“**任何战争都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这种政治的继续。**”[同上书，第851页。]

列宁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坚决支持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一切修正主义者总是打着反对一切战争的幌子，抹煞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区别，抹煞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列宁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十一、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

列宁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列宁选集》第二十一卷，第324页。]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次战争爆发前，被修正主义腐蚀的第二国际各国党，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而当战争爆发之后，又都纷纷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者。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大旗，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展开了尖锐、剧烈的斗争。在斗争中，列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一系列理论和策略，从思想上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革命左派，指引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胜利前进。

战争危机年代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更趋尖锐。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有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跳跃式地向前发展，迅速赶上和超过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德国在工业生产方面迅速超过了老牌的英帝国

主义而跃居欧洲第一位，它要求按“资本”和“实力”重新瓜分世界，而英、法等国则想继续扩大殖民范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为争夺市场和领土而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同时，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以后，各国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也大大加剧了帝国主义的矛盾。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摆脱危机，为了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加紧进行扩军备战。在欧洲，最后形成了两个互相敌对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即由英、法、俄三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和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其中，英、德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成为当时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酝酿中。

帝国主义列强在疯狂进行扩军备战的同时，不断施放“和平”及“裁军”的烟幕，以麻痹广大劳动人民，迷惑竞争对手。1899年，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策划下，帝国主义列强在海牙召开了第一次“和平会议”，1907年又召开了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与会的各帝国主义列强大唱“和平经”，挥舞“裁军”的破旗。但是，它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局部战争连年发生，帝国主义大战的乌云，笼罩着整个欧洲。

在战争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如何对待军国主义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激烈进行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直为帝国主义高唱赞歌，他们鼓吹帝国主义是什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较长时期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散布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的幻想。当世界大战的乌云越来越密集的时候，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家”考茨基却大念“和平经”，胡说什么“托拉斯的倾向为持久和平创造条件”。这种“持久和平”的幻想，在各国革命左派队伍中也有所反映。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这股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这种斗争首先是在1907年召开的斯图加特大会上展开的。

1907年，第二国际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是列宁第一次亲自参加的国际会议。参加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力图控制大会，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列宁在处于少数的情况下，团结各国左派，与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

通过了基本正确的决议。大会除了讨论民族殖民地问题外，集中讨论了如何对待战争及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列宁参加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当时提交委员会讨论的有四个反对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些草案都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列宁着重分析了爱尔威（法国社会党代表）和倍倍尔（德国社会党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

爱尔威的草案，从半无政府主义出发，认为“所有战争都是符合资本家利益的”，应当反对任何战争。列宁指出，爱尔威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十三卷，第63页。]。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应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无产阶级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对正义的战争，不但不反对，而且要积极地参加。无产阶级正是要通过革命战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列宁指出，爱尔威为了反对军国主义，竟连社会主义也忘记了。

倍倍尔在他的草案中虽然正确地指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战争才能消除。但他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区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而是错误地用“防御”和“进攻”的概念来区分战争的性质。由于害怕德国党的合法地位受到威胁，他不敢提出反对军国主义的具体任务，实际上只承认议会斗争的形式，因此连福尔马尔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也表示赞成倍倍尔的草案。所以，列宁指出，倍倍尔的草案是接近机会主义的。

鉴于倍倍尔的草案中包含有正确的部分，列宁决定以倍倍尔草案为基础，加以改造。列宁同卢森堡、蔡特金等人一起研究了倍倍尔的草案，并由他和卢森堡提出修正草案。修正案删掉了倍倍尔草案中有关“防御”和“进攻”的段落，对草案的最后两段话作了原则性的修改。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仅要反对发动战争和尽速结束已经发生的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十三卷，第64页。]。为了使倍倍尔接

受这些修改意见，列宁同倍倍尔进行反复协商。经过列宁修改后的倍倍尔决议草案，在大会上被一致通过。列宁的修正案成了指导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策略文献。

斯图加特大会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已，战争危机日益加剧。第二国际于 1910 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代表大会，大会再次讨论了反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问题。列宁出席了这次大会。由于列宁坚持原则，争取多数，使大会通过了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的革命精神。

哥本哈根大会以后，国际形势更加恶化。1911 年，法、德为了争夺摩洛哥几乎发生战争；同年，意大利和土耳其为争夺的黎波里爆发了战争；1912 年又爆发了巴尔干战争。修正主义分子的叛卖行为，助长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备战活动。

鉴于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第二国际于 1912 年 11 月在巴塞尔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大会专门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问题。由于群众的反战情绪十分高涨，机会主义者不敢在会上公开阻挠，因而使大会通过了《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的宣言，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宣言重申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有关决议中的基本原则，号召各国人民用一切手段来反对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一旦爆发，就利用它来加速帝国主义的崩溃。宣言指出：正在酝酿的战争，具有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和奴役的性质，这种战争将造成经济和政治的危机。宣言向帝国主义分子提出警告，如果他们敢于把战争的恶魔纵放出来，人民就会用革命来回答他们，普法战争引起了巴黎公社革命，日俄战争唤起了俄国人民的 1905 年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巴塞尔宣言》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著名文献。

列宁很重视这个宣言，认为它“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615 页。]。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迫于群众高涨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情绪的压力，表面上不得不表示赞成宣言，以便继续欺骗人民。但是，在会后，他们完全违背宣言的原则和精神，继续散布“保卫祖国”

等沙文主义口号，讨好资产阶级政府并支持其扩军备战活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这种反动立场和两面派行为，在《巴塞尔宣言》通过不到两年就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地暴露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4年7月，帝国主义之间酝酿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1914年6月，奥国皇太子斐迪南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死。这一事件立刻被两个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利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德皇威廉二世闻讯后疯狂叫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德皇极力怂恿下，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沙皇俄国害怕德、奥帝国主义集团控制了巴尔干半岛，会严重损害俄国向地中海地区的扩张，于是，沙皇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扬言要支持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法国借口其盟国——俄国受到德国侵犯，也于8月3日对德宣战。8月4日，英国借口德国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也向德国宣战。这样，一场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开始了。以后，战争逐渐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到1918年，卷入这次战争的共有三十多个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列宁指出：“**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垮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使劳动群众不去注意俄、德、英等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现时战争的唯一真实内容和意义。**”[《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68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一响，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完全背叛了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和《巴塞尔宣言》，公开投入本国资产阶级的怀抱，成了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和资产阶级的奴仆，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即社会帝国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二十九卷，

第 458 页。]他们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狂热地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驱使各国工人阶级互相厮杀。

第二国际最大、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充当了这次投敌叛变的带头羊。他们在德国向俄国宣战的那一天，就急忙以党的名义发表了无耻的声明，说什么“敌人入侵的恐怖威胁着我们”，宣称“在危险的时刻我们不会抛弃祖国”。他们叫嚷战争对德国来说是“防御”性的，因此应该“保卫祖国”。右派头目还号召二百五十万有组织的工会会员开赴前线，为保卫“德国”充当炮灰。8 月 4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帝国议会中一致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更可耻的是，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竟在国会里高呼德皇“万岁”，恭恭敬敬地接受德皇的谢意。

法国社会党也采取了背叛无产阶级的立场，发表了“效忠”政府、抗击德国侵略的声明，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法国社会党领袖茹尔·盖德等人还直接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以保证战争时期和资产阶级的合作。

在英国，工党头目韩德逊也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先后担任教育大臣和不管大臣，成为资产阶级的正式代理人。

此外，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领袖，俄国孟什维克等等都公开背叛了社会主义，支持帝国主义的战争，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这些社会党的头子不仅在国内充当本国政府的走狗，而且在国外也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到处游说，鼓动战争，鼓动各国工人阶级互相厮杀，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修正主义者把从前自豪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在战场上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

第二国际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所谓“中派”，在大战期间又以新的欺骗手法来愚弄工人阶级。他们一方面乔装成战争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为右派“保卫祖国”的立场辩护，说什么真正的国

际主义应该承认大家都有这种“保卫祖国”的“权利”。列宁揭露考茨基是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更加危险的敌人。

第二国际各国党内只有少数革命左派，如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他们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斗争。威·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是德国杰出的工人领袖。大战刚爆发时，他还没有摆脱修正主义党纪的束缚，被迫在国会里投票赞成军事预算。但他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同年9月，他在国外和一些战友发表声明，斥责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沙文主义政策。1914年12月2日，当德国议会进行第二次战争拨款表决时，他不顾国会党团的强制和阻挠，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毅然采取革命行动，独自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因此，他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但是，他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扬。列宁指出：“**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6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历史紧要关头，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大多数领袖都纷纷倒向帝国主义政府一边，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标志着第二国际的破产。

为了总结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教训，教育国际无产阶级并进一步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列宁在1915年专门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等文章。他指出第二国际的破产是机会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指出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窃据第二国际领导岗位的修正主义头目们，竭力鼓吹阶级合作，胡说“在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长期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他们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在“和平”时期，躲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地干着资产阶级的勾当；而当大战一爆发，就原形毕露，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公开同盟者和无产阶级的公开

敌人。列宁说：“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熟到使这个资产阶级的脓疮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650 页。]

第二国际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坚持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总是首先把攻击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从伯恩斯坦到考茨基，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或是公开打起“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或者采取两面派手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从而导致各国党的蜕化变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与修正主义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因而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前进，夺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就告诉我们，理论是路线的基础。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制定和坚持正确的路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戳穿假马克思主义的谣言和诡辩，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不断前进。

第二国际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上必须同修正主义彻底决裂，同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叫喊“统一”“团结”，但是，实际上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阴谋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可是，在第二国际内部的左派，由于受伪善的中派头目考茨基的调和主义的影响，他们迷恋形式上的统一，害怕同修正主义决裂。结果，修正主义分子在第二国际内部步步得势，使第二国际被机会主义思想所腐蚀，最后终于把自己葬送了，从而使工人运动遭受严重的挫折。唯有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始终坚持着与一切机会主义的表现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并及时的把那些顽固坚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子清除出去。所以，布尔什维克党就能在战争的严峻年代里经受住考验。在第二国际的领袖、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领导集团纷纷叛变、社会沙文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势下，只有列宁

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能够顶住这股逆流，高高举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从而保证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这就说明，只有坚持同修正主义者彻底决裂，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战斗团结，才能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列宁团结各国左派为建立新的国际而斗争

战争爆发后不久，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列宁从奥地利移居到瑞士的伯尔尼。在那里，列宁写了《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以后又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宣言形式发表，这是一篇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的战斗纲领。它无情地揭露了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叛徒行径。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明确提出了“**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74页。]这一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一口号，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必须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国际破产后，把各国左派队伍团结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国际修正主义的泛滥，为建立无产阶级新的国际联合而斗争的任务，光荣地落到了伟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肩上。

当时，建立新的国际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为各国党内的左派人数很少，在国际范围内还没有团结成一支有组织的力量，而且由于交战关系，通讯联络十分困难，活动经费也相当贫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列宁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并通过各种途径同各国革命左派建立了联系。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倡议下，1915年3月，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伯尔尼召开。同年4月，又在伯尔尼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列宁都派了代表参加，在会上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的叛卖行径，宣传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主张，鼓舞和提高了各国左派的斗志。

1915年9月，在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个村庄齐美尔瓦尔得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由于列宁和左派坚持不懈的斗争，会议所通过的宣言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谴责了修正主义分子践踏战前第二国际历次大会决议的行为。但宣言没有指出第二国际各国党的背叛，也没有采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这一重要论点，因此，这个宣言是妥协的、不彻底的。但是考虑到它在同机会主义实行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所以在表决时，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了宣言的缺点，同时在宣言上签了字。在这次会议上，列宁把左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为建立第三国际创造了良好的前提。会后，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成立了自己的常务局，并出版了德文杂志《先驱》。

1916年4月，在伯尔尼附近另一个村庄昆塔尔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又称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派力量已进一步增长。在列宁和左派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谴责第二国际执行局机会主义立场的决议，但仍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党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决议案。尽管昆塔尔会议还有缺陷，但它已表明，建立第三国际的时机进一步成熟了。

列宁在回顾这两次会议的斗争时指出：“**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反对‘考茨基派’、反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斗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27页。]。

由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各国左派力量的增长。虽然，当时的左派还处于少数地位，但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政党和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的，但最有前途的就是他们**”[转引自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正是这些左派力量成为各国革命群众的真正领袖，成为未来新的国际的骨干。

列宁对社会和平主义和“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

大战爆发后，列宁在一系列重要著作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的社会沙文主义谬论。

当战争进行了两年之后，即到了 1916 年的下半年和 1917 年初，交战国双方都已疲惫不堪，谁也没有在战争中取得优势，而各国的后备却已枯竭，人民的不满和愤恨愈来愈强烈，革命时机日益成熟。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防止心脏爆炸，后院起火，开始酝酿签订和约，以便“和平地”分赃，“和平地”解除千百万无产者的武装，于是就卖力地叫喊要“和平”了。随着帝国主义政策的这种转变，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社会和平主义也相应地流行起来。

社会和平主义是用社会主义词句掩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时，考茨基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和平主义的主要吹鼓手。他宣扬和平是社会主义者的最高理想，散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裁军、签订贸易协定、建立国际仲裁法庭等，就可以消除战争，实现持久和平。以考茨基为头子掀起的这股社会和平主义思潮，对于日益高涨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成为当时革命运动的主要危险。

列宁奋起痛击了这股社会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和平问题的观点和策略。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并不需要笼统的、抽象的、一般的和平，因为不同具体条件联系起来的毫无内容的“和平”口号，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连沙皇尼古拉也可以接受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和平，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要实现这样的和平，就必须号召群众起来革命。考茨基之流侈谈和平，绝口不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工人的极大愚弄。

列宁指出，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情况下，期待资产阶级通过签订不割地的和约，达成裁减军备的协议，建立自由贸易的关系，成立国际仲裁法庭等等的所谓“民主的”和平，也不过是愚蠢的幻想。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根本就不会这样做，它们所需要的是掠夺和称霸。社会和平主义者根本不能理解战争与和平是帝国主义推行压迫政策的两种互相交替的形式。帝国主义所能实

现的和平，只能是继续准备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和平。这就是说，帝国主义的和平，只能是前后两次帝国主义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社会主义者要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巩固的和平，只有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最后铲除战争根源。

在帝国主义战争灾难深重，群众普遍厌战的气氛中，有些社会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口号，他们认为，只要废除了武装，就可以消灭一切战争，实现持久和平。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论“废除武装”的口号》等著作中批判了这种主张。列宁指出，要求帝国主义废除武装，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帝国主义是靠武装维护统治的，同时也是靠武装来实现它的掠夺目的的，它是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要求无产阶级不要武装，那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思想”** [《论“废除武装”的口号》，《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 94 页。]。

总之，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着战争的策源地。他们常常要掀起“缓和”、“裁军”的破旗来欺骗人民，以掩盖他们之间的争夺和扩军。所以，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揭穿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罪恶阴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的中派头目考茨基扮演了一个伪善的角色。他在议会投票表决军事预算时，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而是采取了弃权的虚伪手法，暗中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在对待交战双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互相责骂时，他似乎既不是偏袒“同盟国”一方，也不偏袒“协约国”一方，说什么“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当左派揭露交战双方进行的都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时，他又企图把左派的正确立场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卫祖国”的立场调和起来，说什么战争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战争具有民族因素。他在对待交战双方的资产阶级鼓吹“和谈”时，又胡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争取和平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竟把无产阶级的和平要求和资产阶级的

和平骗局扯在一起。总之，考茨基处处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不偏不倚”的“正人君子”，借以欺骗群众。

为了抹煞和掩盖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考茨基还精心炮制了一个“超帝国主义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究竟是什么货色呢？考茨基胡说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而是金融资本“心甘情愿”所采取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使资本主义可能进入一个“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因此，只要国际金融资本组织成为世界统一的托拉斯，就能“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实现“持久的和平”。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实质就是宣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否认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反对无产阶级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彻底戳穿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本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从1914年开始，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1916年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考茨基的所谓“超帝国主义论”在理论上是极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反动的。

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在于产业资本的统治，而在于金融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要吞并农业国，而且还要吞并一切国家。因为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就必然要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侵略和掠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只要帝国主义经济基础不改变，这种本性就永远不会改变。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垄断资产阶级“情愿采取”的政策，故意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它的经济基础分开，这是赤裸裸地鼓吹帝国主义本性可以改变的反动谬论。

列宁指出，“超帝国主义论”是力图掩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为帝国主义和平辩护的反动理论。在考茨基看来，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能达成协议，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资本垄断同盟，这样，就可以使各国财政资本间的相互斗争为联合起来的国际财政

资本对全世界的共同剥削所代替。他认为到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就不会再发生战争，世界持久和平就有了保障。列宁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在分割世界的斗争中，尽管几个甚至全部帝国主义强国可能形成一个联盟，但这种联盟只能是暂时的，它并不能消除各种摩擦、冲突和斗争。因为“**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更的；要了解当前的事件，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的解决是取决于实力的变更，至于这些变更究竟是‘纯粹’经济的变更，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更，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也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95-796页。]因而，同考茨基所捏造的“新纪元”相反，“超帝国主义”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的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

列宁指出，“超帝国主义论”是力图掩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的反革命理论。在考茨基看来，如果“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社会阶级矛盾就不会尖锐化；如果超帝国主义这种时代到来，那末，至少资本主义道义的破产的趋势就可能暂时缓和下来。这样，战前曾使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日益衰落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列宁指出，这种说教实际上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齷齪的僧侣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38页。]。

列宁指出，“超帝国主义论”就是力图掩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并且为帝国主义安稳地统治殖民地人民出谋献策的叛徒理论。因为考茨基劝说帝国主义对“最重要的农业地区最好不用帝国主义的暴力办法，而用和平民主的办法”来实现资本主义的扩张。所谓“和平民主的办法”，

就是裁减军备，同殖民地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减低关税壁垒，帮助它们铺设铁路，兴建水利工程，提高农业生产等等。在考茨基看来，采取这样的办法，压迫殖民地的现象就可以消除，世界各民族和平联盟就会出现。列宁对考茨基这种谬论痛斥道：“**当争夺强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就来劝导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说，战争是可怕的东西，裁军才是好事**”等等，“**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为非作歹的劝告**”[《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635-636 页。]。

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其“**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836 页。]

列宁在揭露和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过程中，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律和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分析。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不仅宣告了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彻底破产，从根本上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给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新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列宁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得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重要的结论。1915 年 8 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这篇著名论文中，阐明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论

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709 页。]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情况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获得胜利，它只能在大多数国家，至少在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这一论断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那时资本主义处在自由竞争的上升阶段，世界殖民地还未瓜分完毕，资本还可以向空白地区扩张，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这样激化的程度。因而，单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发动革命，就会被国际联合的资本力量所击破。

但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根本改变了。这时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表现得很突出。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阵线互相分裂，必然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暴露帝国主义战线中最薄弱的环节，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就有可能从这个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帝国主义阵线，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成熟的差异。有些国家由于阶级矛盾特别尖锐，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较高，无产阶级的政党又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再加上帝国主义的统治比较薄弱或发生了严重的危机，革命成熟的时机就可能早一些。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也不一定首先在那些最发达的、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而是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阶级矛盾最集中、最尖锐、帝国主义的统治最薄弱、最腐败的国家内获得胜利。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新原理，它不仅武装了俄国无产阶级，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极大地鼓舞着国际无产阶级为突破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胜利而斗争。

十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取得了震撼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28页。],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和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沙皇俄国参加英、法帝国主义“协约国”一方,对德、奥帝国主义“同盟国”作战。沙皇政府参加战争的目的是想对外侵略和扩张,对内更加穷凶极恶地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1912年以来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但是,与沙皇政府的愿望相反,战争引起了革命,帝国主义战争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大大加速了革命时机的成熟。帝国主义战争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时俄国有百分之四十的男子被征入伍,大批土地荒芜,工厂倒闭,粮价飞涨,物资奇缺,数百万人被战争夺去了生命。沙皇制度下腐败的俄国军队在战争中屡遭失败,德军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和白俄罗斯一部分地区,大批居民背井离乡,生活困苦不堪。广大人民群众对沙皇统治深恶痛绝,义愤填膺。整个俄国犹如一堆干柴,只要哪里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燎原的革命烈火。

1917年1月9日(指俄历,下同),彼得格勒工人为纪念1905年1月9日“流血星期日”十二周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莫斯科、巴库等地也都爆发了反战的游行示威。有些地区的人民群众自发起来没收粮店和面包房。面对革命迅速发展的趋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吓破了胆,妄图把革命纳入自由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范围之内。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不断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罢工,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反对沙皇制度。2月25日,彼得格勒爆发了二十万工人参加的政治总罢工。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发出号召,号召工人把政治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

2月27日，武装起义开始，工人群众解除宪警武装，夺取武器，士兵拒绝向工人开枪，并转到革命方面来。一天之内，六万多名驻守彼得格勒的士兵举行起义，起义的工人和士兵逮捕了沙皇政府的大臣和将军，释放了政治犯。当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其他城市和前线时，各地工人和士兵纷纷起义响应。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拿起武器，造了沙皇的反，骑在俄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长达三百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被人民推翻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

二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沙皇和一切反动势力一样，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那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1091页。]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拥有大量群众武装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为什么会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呢？

二月革命的武装起义过程中，产生了工兵苏维埃。在革命最初几天内，工兵苏维埃是国内的唯一政权。它是工农武装起义的机关，也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然而，这时在苏维埃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了多数，窃取了苏维埃的领导权。在他们控制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竟选举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去谒见国会主席罗将科，建议他组织临时政府。罗将科说：“你们不是要把我抬到刺刀上去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奴颜婢膝地对他说，苏维埃将以全部威信为他效劳。结果，在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三天傍晚，临时政府就组成了。工农武装夺取的国家政权，就这样被机会主义政党把它拱手送给了资产阶级。为什么起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得了多数呢？为什么获得胜利的工人和农民又允许机会主义政党把政权送给资产阶级呢？列宁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

首先，这是因为当时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的是千百万缺乏政治经验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小私有者、农民和不久前还是农民的工人，即介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人们。当时俄国在欧洲的大国中，是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

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是说，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感染了和俘虏了非常广大的工人群众”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40 页。]。

这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浪潮，便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浮到表面上来了。

其次，无产阶级的阶级成分在大战时期起了变化。原有的工人中占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被派到军队里去了，很多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他们为了逃避当兵而涌进工人的队伍，使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都受到很大影响。工人中间增加的这些小资产阶级阶层，也就成了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暂时得势的条件。

另外，布尔什维克的很多优秀党员和革命领袖，由于受到沙皇政府的镇压，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流放到俄国的边远地区，列宁被迫侨居国外，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1885 — 1919）等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大战期间，由于采取了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动立场，而得到了沙皇政府的保护，拥有许多合法组织和刊物来进行活动。当布尔什维克在街头领导群众直接斗争的时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乘机在苏维埃中夺取了多数位置。

掌握了苏维埃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出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不仅不敢掌握国家政权，还说什么“很快就会有立宪会议来把一切安排妥贴”的，用小资产阶级幻想去欺骗群众。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头子是臭名昭著的大地主李沃夫。在部长中，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只有一个是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正如列宁一针见血指出的：这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组成的反革命专政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这样，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形成了性质根本对立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但这种并存的局面，必然是过渡的、临时性的，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正如列宁所指出：“**一国之内决不能有两**

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39 页。]在这个关系着俄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不同的阶级和政党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路线。

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工农的根本利益，坚持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坚持要将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将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立宪民主党坚决反对革命，要把工农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将政权完全夺到自己手中；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追随资产阶级，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把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暗藏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则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实际上是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样，执行一条叛卖革命的路线。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焦点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还是集中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问题。

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布尔什维克党需要制定新的革命路线和策略。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列宁正在国外。斯大林说：“处处感觉到党的领袖列宁不在。”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5 月第一版），第 204 页。]

列宁的《四月提纲》

列宁在瑞士得悉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立即准备回国。4 月 3 日夜，列宁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重重阻挠，终于回到了俄国。彼得格勒车站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集合起来欢迎列宁。列宁站在铁甲车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号召群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最后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第二天，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大纲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这个提纲回答了俄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给党和无产阶级制定了一条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明确的革命路线和具体计划。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根据二月革命后的时局特点，具体论述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必然性。列宁指出：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国家政权已经转到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就这一点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6页。]从此，无产阶级革命便提上了实践日程。当然，解决和平、土地、面包问题也是当时群众的迫切要求，特别是三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使广大人民疲惫不堪，生产急剧下降，群众迫切要求和平。但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最终解决和平、土地和面包问题，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要求。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主要政治要求。列宁指出：“**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4页。]列宁还主张以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经济方面，“提纲”提出在没收地主土地的条件下实行全国一切土地国有，把所有一切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并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加以监督。

在《四月提纲》中，列宁分析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特殊情况，当时所以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主要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背叛。而他们的叛卖活动所以能够得逞，是由于当时广大群众受了他们的欺骗，没有认清他们的真面目。武装掌握在苏维埃手里，而苏维埃又支持着临时政府，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正因为这样，列宁没有号召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来推翻临时政府，因为当时广大群众还对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本质认识不清，党如果提出这一口号，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同时，列宁明确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5页。]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最近任务。列宁指出：“要

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当这个政府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经常地、坚持不懈地、特别是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发错误，同时宣传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说，要从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着手，群众觉悟提高了，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妥协面貌认清了，就可以逐步改变苏维埃中的领导成分，使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据多数。苏维埃一旦掌握在布尔什维克里，就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临时政府就会垮台，这就是当时列宁提出的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提出这个方针的立足点，正如列宁所说：“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论口号》，《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07页。]”列宁还指出，出现这种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是“革命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革命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02页。]，是“一种例外”[《论妥协》，《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300页。]。后来，事变的进程证明，资产阶级和历史上一切反动势力一样，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当革命群众运动威胁到他们的反动统治时，他们总是首先把刺刀提到日程上，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因此，列宁在预计到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的同时，丝毫也没有放松对资产阶级用反革命暴力镇压革命运动的警惕性。列宁教导布尔什维克党要充分认识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在争取实现和平发展时，要牢牢掌握革命武装。列宁在为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起草的决议中写道：“无产阶级的党应当用全副精力向人民说明：必须组织和武装无产阶级，使它同革命军队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必须抛弃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以防止类似1848年6月巴黎的大规模枪杀无产阶级的惨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45页。]。可见，列宁关于革命和平发展的设想是立足于无产阶级掌握武装，并随时准备以革命暴力还击反革命暴力这个基点上的。

列宁的《四月提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典范。这个提纲公布后，受到全党和觉悟工人的热烈拥护，同时也遭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党内机会主义者的疯狂攻击。叛徒普列

汉诺夫之流重复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滥调，从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出发，认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只能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没有能力管理国家，让资本主义发展，等工人阶级占了人口的多数，有了“文化教养”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叫嚷革命转变的条件还不存在，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到无限遥远的未来，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混入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之流充当孟什维克的应声虫，攻击列宁的《四月提纲》只代表“个人意见”，声称革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无产阶级还“不能开动国家机器”，认为俄国只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十分清楚，党内外机会主义分子的共同目的，都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保全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列宁痛斥了机会主义者反对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谬论。列宁指出，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和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可能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如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夺得了政权，就能保证获得胜利，因为他们能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有力量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至于无产阶级能否开动国家机器的问题，列宁指出，只有在掌握了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才有条件去学习管理国家的本领，他们也一定会通过实践学会管理国家。

布尔什维克党确立武装起义的方针

4月24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举行了第七次代表会议。会上讨论了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批判了加米涅夫等人的机会主义路线，通过了列宁关于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方针，并把列宁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当作党的最近任务。会议认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广大群众进行耐心持久的宣传教育，揭露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本质，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推行的妥协政策，使广大群众摆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欺骗，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来。

5-6 月间，列宁亲自参加了彼得格勒许多大工厂的工人集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向成千上万的工人阐述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列宁还把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发表，在群众中广为传播。在列宁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开展了争取群众，用战斗精神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到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中去，宣传党的路线，揭露临时政府的反动本质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政策，不断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以便逐步争取苏维埃中的多数。

党特别重视掌握武装和瓦解旧军队的工作。二月革命后，党中央就设立了专门负责军事工作的军事局，6 月，又成立了全俄军事组织中央局，统一领导和组织全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党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乌拉尔和顿巴斯等地区，积极建立和发展工人赤卫队，这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的骨干队伍。党派出许多优秀党员到前线部队和卫戍部队去，建立党的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并出版了《士兵真理报》、《战壕真理报》等报刊，向士兵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

正当布尔什维克党领导革命运动不断推向高涨的时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加紧进行反革命勾当。他们继续执行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拒绝人民群众提出的结束战争、获得土地等要求。资产阶级为了欺骗群众和维持它的反动统治，别有用心地任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各派出两名代表参加临时政府。

6 月 3 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布尔什维克虽然还占少数，但他们利用了大会的讲坛，进一步揭露了当时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妥协路线的危险性，指出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解决土地、面包与和平问题。

6 月 18 日，彼得格勒四十万工人和士兵举行示威游行，示威群众不断高呼“打倒战争！”“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而没有人理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信任临时政府”的口号。这次示威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它表明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更加高涨，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日益增强，也表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遭到了极大的失败。

布尔什维克党威信的不断增长，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使反动派十分惊慌。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镇压革命，从4月起不断拼凑名目繁多的反革命武装，并从前线调回了最反动的反革命军队，首先把刺刀提到日程上。7月3日，临时政府出动大批反动武装，血腥镇压了彼得格勒有五十万工人、士兵和水兵参加的和平示威，四万多人伤亡，使彼得格勒街头洒遍了革命工人和士兵的鲜血。这就是“七月流血事件”。接着，资产阶级开始了全面进攻。他们封闭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报纸，捣毁《真理报》编辑部，对布尔什维克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强行解除广大群众的武装，并悍然下令通缉列宁。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7月14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竟通过决议，吹捧这个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自愿将政权全部交给它。

“七月流血事件”表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结束，全部政权已转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 [《政治形势》，《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167页。]。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参与了反革命的屠杀，成了反革命的帮凶，而他们所把持的苏维埃已成了临时政府的附属品。

面对着反革命的猖狂进攻，7月26日至8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秘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宁因为受到警察的追踪，未能出席大会。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指示，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提出了经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会上，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极力反对党关于武装起义的方针，并居心险恶地提出要列宁到反革命法庭受审，妄图借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屠刀来杀害列宁。他们宣称只有当西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时，俄国才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布哈林说，农民正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不会跟无产阶级走，从而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斯大林坚决驳斥了这些投降主义观点，特别强调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用武装夺取政权以及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的原理，捍卫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学说。大会根据列宁的指

示，决定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通过了经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辉文献

当时，除了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外，其他许多国家也由于连绵不断的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从而加速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化，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好形势。这样，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其他许多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提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为了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武装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然而，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制造种种谣言和诡辩，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歪曲得面目全非。他们百般美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鼓吹用“取得议会中的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反对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172 页。]为了批判机会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谬论，捍卫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1917 年 8、9 月间，列宁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写下了《国家与革命》这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深刻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谬论。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列宁既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否定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又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权威，反对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列宁坚持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考茨基鼓吹议会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夺取政权后，列宁坚持认

为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强调在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了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谬论。

列宁首先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了国家的产生、特征及其作用，论述了国家的本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基本观点。列宁认为国家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构成国家机器的是常备军、警察等特殊武装队伍，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和阶级斗争的加剧，统治阶级总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加紧对劳动群众的压迫。资产阶级国家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镇压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88页。]

列宁详尽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深刻地论证了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同上书，200页。]。这就是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级消灭了，国家才能消亡。

列宁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同上书，256页。]。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和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战胜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发展共产主义因素，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列宁集中地揭露和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考茨基一贯背叛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罪恶行径。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199 页。]这样，一切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都在这块试金石前显露了他们的丑恶原形。

《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纲领，是系统的完整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文献。这部伟大著作的发表，指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纲领，也是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布尔什维克党根据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武装起义夺取国家政权的方针，积极进行了准备工作。资产阶级在镇压了七月示威，篡夺全部政权后，就准备消灭苏维埃，建立赤裸裸的反革命专政。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杀气腾腾地叫嚣要用“铁和血”来镇压革命。8 月 25 日，前线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用大量的武器和金钱的支持下，率领军队向彼得格勒进发，发动武装叛乱，妄图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政府。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和士兵同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斗争，对反革命叛乱实行武装抵抗。工人和革命士兵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彼得格勒的工人拿起了武器，建立一支又一支新的工人赤卫队，工人们昼夜不停地制造枪炮和弹药，在彼得格勒周围挖掘战壕和架设铁丝网。在西部战线，革命士兵控制了重要的铁路枢纽站和通往基辅和彼得格勒的公路，铁路员工拆毁铁轨，破坏桥梁，卸掉火车机车，阻止了科尔尼洛夫军队的前进。首都卫戍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革命士兵也积极参加了战斗，党还派

出数百名布尔什维克宣传员深入到叛乱军队中，向受骗的士兵揭露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反革命阴谋，使受骗的士兵转到革命方面来，拒绝执行科尔尼洛夫的命令。

在粉碎叛乱的过程中，广大群众从切身体验中进一步认清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政策的叛卖性，纷纷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来。工人和士兵在苏维埃中实行了改选，把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选进苏维埃，代替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党依靠了广大武装起来的群众，迅速平息了反革命叛乱。这一事实表明革命和反革命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威信空前提高，广大群众逐步摆脱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各地的苏维埃开始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

8、9月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大城市的苏维埃的领导权先后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并分别通过了工农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决议。党根据新的革命形势又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现在的这个口号意味着为建立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举行武装起义。

列宁科学地分析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9月间，他向党中央写了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信中明确指出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党必须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列宁指出，起义是艺术，是在一定条件下依靠先进阶级进行的，在俄国起义条件已经具备，胜利是有保证的。同时，只有武装起义才能打破国内资产阶级企图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的阴谋，才能避免国际帝国主义靠牺牲俄国来单独端和的危险。列宁反复强调，等待就是断送革命。

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彼得格勒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司令部。莫斯科和其他各地的工人也纷纷武装起来。起义的时机迫近了，为了便于领导革命，10月7日，列宁从芬兰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10日，列宁主持召开了党中央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上，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并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决议指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45页。]会议还决定成立以列宁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负责起义的政治领导。10月16日，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武装起义的问题，并成立了由斯大林、

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人组成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这个总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核心。

在 10 月 10 日和 16 日两次党中央会议上，机会主义分子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公开反对列宁关于武装起义夺取国家政权的方针，胡说起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因而起义一定会失败。托洛茨基则别有用心地提议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要举行武装起义，妄图以延缓起义来使起义遭受失败。他们的这种主张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斥责。然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竟于 10 月 18 日在孟什维克《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说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武装起义，并诽谤说：“把一切放在日内一次进攻上作孤注一掷，乃是冒险绝望的行动。”这两个叛徒的声明，实际上把党关于起义的决定，向敌人告了密。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中愤怒地谴责了他们的叛卖行动，称他们是“工贼”、“革命的叛徒”，并要求开除他们出党。托洛茨基也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向敌人泄露了起义的具体时间。

临时政府得到叛徒的告密后，马上调动大量反革命军队，占领要地，并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增加岗哨，巡逻队满城奔驰，肆意逮捕，还打算占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妄图镇压革命。可是，资产阶级政权的末日已经到了，任何反动力量都阻止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前进！

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根据列宁的指示，党中央立即决定提前举行武装起义。列宁在 10 月 24 日写给中央委员的信中指出：“**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人员，解除士官生等等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消灭他们）。**”“**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给中央委员的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350 页。]当天晚上，列宁从秘密住所来到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亲自担负起领导起义的任务。

革命军队和赤卫队从彼得格勒的各个区域，很快地赶到斯莫尔尼宫，他们在这里接受了战斗任务，又重新出发去执行战斗任务。党中央同时把首都起义的消息电告全国，领导全国千千万万群众去进行

战斗。斯莫尔尼宫内灯火通明，整个首都通宵达旦都处在沸腾的战斗中。整个晚上到第二天清晨，赤卫队、革命士兵和水兵共约二十万人按照列宁的战略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坚决迅速地占领了主要桥梁，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局，国家银行，政府机关等战略要地。只有临时政府仍龟缩在冬宫，组织士官生和反动军队负隅顽抗。为了攻下冬宫，布尔什维克调动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喀琅施塔得派出了军舰和水兵。下午六时，革命军队全部包围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当临时政府拒绝革命军事委员会限令投降的最后通牒后，列宁就下令进攻部队攻占冬宫。“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始轰击冬宫，涅瓦河上军舰的探照灯光直射冬宫，照亮了进攻部队的道路。起义的革命士兵和群众在冬宫一千零五十间房间和大厅内同负隅顽抗的反革命武装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终于在深夜二点钟全部占领了冬宫，解除了士官生武装。除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外，临时政府的成员统统被捕。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冬宫的炮声，报道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作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光辉节日而永垂史册。

在攻打冬宫的隆隆炮声中，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宣布开幕。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农民书》，正式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光荣诞生了！大会还一致通过了列宁向大会宣读的“和平方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方令”是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第一个法令，它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建议立即停战，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土地法令”规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劳动农民使用。最后，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伟大导师列宁被选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是十月革命的开端。接着莫斯科开始武装起义，经过一周的英勇战斗，11月2日，工人赤卫队终于攻占了克里姆林宫，取得了胜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主要城市起义的胜利

对全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工农都相继举行了武装起义，经过激烈的武装斗争，粉碎了反革命势力的顽抗，夺取了各地的政权。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到 1918 年 2-3 月间，社会主义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国发展，各地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列宁称这是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列宁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紧紧掌握枪杆子，进行暴力革命，才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充分发扬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变为现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十月革命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278 页。]。过去的革命，其结局都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伟大导师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推翻了剥削者，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就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开辟了从资本主义旧世界进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在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里，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当了国家的主人，为各国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后方，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觉醒，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斯大林指出：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149页。]。从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此，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苏维埃俄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地和后方，推动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十月革命后，不但欧洲许多国家掀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而且中国、朝鲜、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也风起云涌，汇成一股强大的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向旧世界猛烈冲击。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在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下，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全球，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胜利前进。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极其宝贵、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

十月革命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领导。

毛主席在阐述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曾深刻地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塞维克领导十月革命……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 1249 页。]十月革命后，以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欧美各国建立起了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亚洲许多国家也相继建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面目，新的高潮。

十月革命的历史证明，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 39 页。]。

毛主席说：“**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512 页。]苏修叛徒集团公然无耻歪曲历史，胡说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这十足暴露了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可耻叛徒。

十月革命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列宁在缔造和巩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斗争中，总结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宝贵经验。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预见到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和反复辟斗争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 [《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 151 页。]。因此，十月革命后，列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提到一切工作的首位。

十月革命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为了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而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总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否认或抹煞劳动农民的革命作用，从而达到其孤立无产阶级、投降资产阶级的目的。列宁明确指出，没有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和巩固政权。他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各先进国家的被剥削的劳动农民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 303 页。] 布尔什维克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正确地制定和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和土地纲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保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十月革命的历史还证明，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同国际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无产阶级为争取彻底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事业是国际的事业，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保证。列宁深刻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必要性。他指出：**“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势力。要战胜这种势力，需要有工人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147 页。]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实现了俄国各民族的团结，取得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将俄国革命引向胜利。因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国际无产阶级共同斗争的结果。

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毛主席说：**“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第 5 页。]

但是，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了，国家改变了颜色，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蜕变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出现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只不过是一股逆流，绝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具有十月

革命光荣传统的苏联广大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他们一定会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坚持长期斗争,冲破重重黑暗,使十月革命的红星,在苏联重新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真理是不可抗拒的。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总是要革命的。人民群众总是要胜利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一定会以更加雄伟的步伐向前迈进,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赢得最后胜利。

列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引起了帝国主义和俄国国内阶级敌人的极端仇恨和恐惧,他们里应外合,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党内机会主义分子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推行了一条分裂党和叛卖苏维埃政权的反动路线。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俄国都十分激烈。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43页。]为了保卫和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打击了阶级敌人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后的第三天,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头子克伦斯基纠集了一批反革命军队,向彼得格勒猖狂进攻。与此同时,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要求成立有他们参加的所谓“社会主义政府”,并以罢工相威胁,要挟苏维埃政府同它进行谈判。这些反革命势力妄图用武力和谈判的两手来扼杀苏维埃政权。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一面号召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开赴前线,同克伦斯基的反革命军队进行殊死战斗,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另一方面,为了赢得时间组织革命力量,粉碎反革命军队的武

装进攻，列宁同意与全俄铁路总工会执委会谈判，但明确指出，谈判的条件是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承认和服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谈判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气焰十分嚣张，提出篡夺苏维埃政府最高权力的要求，而代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参加谈判的加米涅夫（当时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竟不加任何反对，全部接受，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作了叛卖性的让步。加米涅夫这一投降主义行径的实质，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权，拱手交给已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反革命政党，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列宁获悉加米涅夫这一叛卖行径后，十分气愤，立即要求停止谈判。列宁指出：“**任何强使我党放弃政权的企图都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261页。]“**加米涅夫的政策应当立即停止执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256页。]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决议，否决了加米涅夫的叛卖主张，拒绝同这些反革命政党达成协议，并撤销了加米涅夫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改由斯维尔德洛夫接任，并选拔一批坚定执行列宁革命路线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参加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俄国还与德、奥同盟国处于交战状态，这种战争状态对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是极为不利的。当时俄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旧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德军的进攻，而新的革命军队又未建立起来。情况十分明显，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暂息时间，以整顿国家经济，建立革命军队，这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条件。为此，苏维埃政府曾向各交战国提议和平谈判，但帝国主义国家根本不承认苏维埃政权，拒绝谈判。于是，苏维埃政府决定与德国进行谈判，单独缔结和约，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革命策略。

1917年12月3日，苏、德双方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德方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要求将德军占领的全部俄国土地划归德国所有，并赔款近三十亿卢布。这时，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接受苛刻的条件，与德帝国主义媾和以取得暂息时机，保住社会主

义火炬；一种是继续进行战争，把苏维埃政权作孤注一掷。一切反革命分子，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到白卫分子，都疯狂地进行煽动，反对签订和约，他们企图借德军的进攻来扼杀苏维埃国家。布哈林、拉狄克一伙组成所谓“左派共产主义”集团，他们在“左”的词句掩盖下进行叛卖活动，反对列宁正确的革命策略，要求继续战争。

2月10日，托洛茨基利用他担任的同德国和平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公然违背列宁和党中央的指令，别有用心地向德方发表书面声明，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又向德方声明，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俄国士兵全面复员，退出战争。谈判因此中断。德国军队乘机在2月18日发动全线进攻，又占领了苏维埃国家许多领土，并威胁着彼得格勒，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在苏维埃国家面临存亡的严重关头，列宁和党中央发出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警号，号召苏维埃人民奋起保卫祖国，组织革命军队，抗击德军的进攻。2月23日，年轻的革命红军英勇地击退了向彼得格勒推进的德军。后来，这个日子就成了红军的誕生日。

在党内，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机会主义分子别有用心地散布什么签订和约是“叛卖”、“投降”，甚至胡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这种奇谈怪论，明确指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吧，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5页。]并指出：“**从保卫祖国的观点看来，我们必须签订最苛刻、最屈辱、最野蛮、最可耻的和约，但这不是为了向帝国主义投降，而是为了学习和准备同它进行严肃认真的战斗。**”[《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50页。]正因为如此，这种让步、退却、妥协是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出发的，是对革命有利的，是一种革命的妥协，是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

列宁坚持了革命斗争不可动摇的原则性，又坚持了革命斗争所必需的灵活性，说服了中央多数同志，通过了与德国单独缔结和约的决定，并于3月3日在布列斯特签订了和约。由于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干扰和破坏，使苏维埃国家受到更严重的损失，和约的条件比原来更加苛刻了。但是，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国家赢得了时间，从而为后来粉碎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干涉和武装叛乱积聚了力量。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列宁运用革命策略的一个典范。列宁在1920年回忆这个问题时指出：“**布列斯特和约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第一次大规模地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终于占了便宜。**”又指出：“**我们交出了许多空间，但是赢得了足以巩固自己的时间。……我们没有牺牲根本的利益，我们交出了次要的利益而保存了根本的利益。**”[《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00、401页。]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列宁的革命路线和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在1918年紧张战斗的日子里，国际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者们的需要，积极参与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大合唱。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臭名昭著的思想领袖考茨基，充当了围攻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急先锋。8月，考茨基抛出了一本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竭尽攻击、诬蔑之能事。在这个小册子中，考茨基打着“纯粹民主”的旗号，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滥调，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专制”、“独裁”、“毁灭民主”，咒骂布尔什维主义是“拿破仑主义”，诽谤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自由”、“普遍贫困”，叫嚷苏维埃政权是“没有生命力的孩子”，等等。列宁尖锐指出：“**如果要名副其实，考茨基的书就不应该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叫做《附和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79页。]

为了粉碎考茨基的猖狂进攻，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列宁抱病于1918年10-11月间写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这是继《国家与革命》之后，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里，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十月革命后俄

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新鲜经验，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路线。同时，列宁对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谬论进行了深刻透彻的批判，对他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丑恶面貌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使俄国人民认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从而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装出一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面孔，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偶然使用过的一个“词儿”，而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这个“词儿”，并把它运用于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因而这个政权就“消灭了民主”，是“独裁”的，“专横”的。接着，考茨基侈谈什么“纯粹的民主”，说什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当实行“多数决定，少数服从”的“民主”原则，不需要用暴力去镇压“少数”剥削者的反抗，等等。列宁——驳斥了考茨基的无耻谰言。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马克思偶然说过的一个“词儿”，而是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著名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熟读马克思著作的考茨基肆意歪曲和阉割马克思学说的革命内容，这只能说明，考茨基已经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列宁总结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被推翻的剥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仍然在许多方面保持事实上的优势，同时，还有大量小生产者存在，随时都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剥削者必然利用这些条件，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所以，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640 页。]为了粉碎剥削者的反抗，就必须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镇压，使反动派恐惧。针对考茨基玩弄多数、少数的算术游戏，列宁明确指出：**“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同上书，639 页。]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是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同上书，637 页。]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列宁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许多重要原理，对于我们今天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布尔什维克党争得了巩固政权的暂息时机。社会主义火炬不但没有熄灭，而是越烧越旺了。对此，国际帝国主义者惊恐万状，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扼杀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拼凑反革命力量，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为了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白匪迅速勾结起来，1918年上半年，苏维埃历史上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就这样开始了，苏维埃国家又面临一场新的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在这种严重的形势面前，列宁领导全党和全国军民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拿起枪杆子保卫苏维埃政权。英雄的十月革命儿女，响应列宁的号召，几十万工人、农民纷纷加入红军，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带头奔赴前线，站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最前列。

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维埃人民和红军经过三年的革命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粉碎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和以美、英、法为首的十四国武装干涉，取得了国内战争的伟大胜利，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国内战争期间，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由于富农大量囤积粮食和大搞投机倒把，全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为了动员国内一切资源，适应打退国内外敌人武装进攻的需要，苏维埃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规定国家不仅对大工业，同时也对中小工业实行监督，保证国家积蓄大量日用品，供给军队和农村。除实行粮食贸易垄断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外，实行余粮征集制，国家向农民收购一切剩余粮食。此外，还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资产阶级在劳动中改造，不劳动者不得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战争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实行的，是为了动员一切力量拯救革命和争取战争胜利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它保证了前线和后方的供应，为粉碎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提供了条件。

1920 年，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的枪声逐渐停了下来，苏维埃国家进入了恢复国民经济时期。长期的战争，已经把国家弄得穷困不堪。1920 年，农业总产值只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半左右，工业总产值只有战前的七分之一，生活必需品如面包、衣服、燃料等都极端缺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当时，苏维埃政权必须调动和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医治战争创伤，在战争的废墟上进行建设。由于条件的变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适应了。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最阶级敌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列宁作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英明决策。1921 年 3 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农民生产的粮食，除一部分以实物形式向国家缴纳粮食税外，剩余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可以在市场上进行贸易，换取工业品。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苏维埃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在革命的转折关头，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又一次跳出来，向列宁和党发动新的进攻。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竭力把这个政策歪曲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泛滥，妄图把它当做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列宁驳斥了这种机会主义谬论，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为了恢复资本主义，而是为了限制并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列宁清醒地估计到，实行商品交换和自由贸易，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的阶级分化，但是，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贸易自由，而不至于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列宁肯定地回答说：“**能够，因为问题只是在于分寸。**”[《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 207 页。]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但必须加以限制，这样，就“**不仅不会破坏，而且会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同上书，208 页。]。正因为这样，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实行商品交换和自由贸易的新经济政策，表面上是让步和退却，实际上是积蓄和扩展力量，对资本主义进行迂回包围，以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列宁指出，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企图利用新经济政策向资产阶级投降，说明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保护者。

同时，托洛茨基又挑起了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争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工人阶级及其群众组织——职工会应在恢复工业和克服经济破坏的工作中，发挥重大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坚持民主说服的方法。在 1920 年 11 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别有用心地提出“把螺丝钉拧紧一下”和“把职工会刷新一下”的口号，要求实行“职工会国家化”。他们主张把军事工作方法搬到职工会里去，并由职工会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妄图把职工会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挑拨党和工人群众的关系，达到取消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托洛茨基的进攻，遭到了出席会议代表的一致反击。然而，托洛茨基并不甘心，又进一步把职工会问题拿到党内进行辩论，妄图在党内组织派别活动，制造思想混乱，破坏党的统一。跟着托洛茨基一起反对党的还有所谓“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布哈林的所谓“缓冲集团”等。这样，这次争论远远超出了职工会作用问题的范围，实质上是一场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依靠工人群众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列宁领导全党迎头痛击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分子的无耻挑衅，号召全党批判和粉碎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等一系列著作中，深刻阐明了这场党内斗争的意义，彻底揭露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分子派别活动的反党本质，并在理论上清算了他们的错误。

1921 年 3 月，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鉴于反对派集团事实上帮助了无产阶级的敌人，决议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党内禁止任何派别活动，违反者开除出党。在同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全党紧紧地团结在列宁的周围，党的各级组织一致拥护列宁和党中央的决议，从而大大增强了党的团结，提高了党的威望，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国开创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列宁指出：“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84 页。]。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前进，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扶植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的措施。例如，列宁坚持实行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把苏维埃官员的薪金降低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1917 年 11 月 23 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规定人民委员月薪最高标准为五百卢布。一次，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擅自把列宁的薪金提高了三百卢布，列宁知道后立即严厉指出，这是公然的违法行为，并宣布给总务处长以严重警告处分。又如，1919 年 5 月 10 日，莫斯科一喀山铁路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举行了第一次群众性的义务劳动。列宁发现这一活生生的共产主义幼芽后，立即予以热情地支持。列宁指出：“**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143 页。]。1920 年，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日子，列宁亲自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性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革命人民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正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托洛茨基一伙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刻，1924 年 1 月 21 日，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与世长辞了。

继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 63 页。]。列宁亲自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列宁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给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贡献，都是非常巨大的。列宁逝世后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列宁学说的正确，证明了列宁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列宁的名字成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最爱慕的名字”[《悼列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 44 页。]，将永远铭刻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心中。

伟大的列宁永垂不朽！

后记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部分教师、工农兵学员和上海市长宁区工会读书班部分同志。由于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并限于水平，书中定有缺点和错误，请批评指正。

编者于 1975 年 12 月